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4期 2021年12月

一般論文

- 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一個數位人文取徑的研究
-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 (2012-2019 年)
- 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 2003~2018 趨勢分析

研究誌要

- 檔案與再檔案之間

歷史與現場

- 新聞自由還是專業倫理？
中天新聞的書面鑑定與親身體驗

書評

- 評析《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1年12月 第十四期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一般論文

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

一個數位人文取徑的研究.....陳百齡/1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年).....張依萍/39

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2003~2018趨勢分析.....王教安、王嵩音/87

研究誌要

檔案與再檔案之間.....井迎瑞/115

歷史與現場

新聞自由還是專業倫理？

中天新聞的書面鑑定與親身體驗.....陳順孝/133

書評書介

評析《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胡逢瑛/151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編輯室報告：

1987年7月15日，台灣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解嚴後的34年間，台灣歷經三次政黨輪替，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的發展，讓台灣人自擁為台灣的價值與驕傲。

在民主社會中，「反抗」對結構中的行動者，是體現個體自由，團結不同個體，對抗共同命運，解構與重構的社會發展的動力。檢視民主政治的發展脈絡，不難發現，擁有權力的一方，為保衛權力，無限上綱害怕「反抗」的虛假幻影，窮盡其對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可能破壞後，歷史難免會反撲。不同歷史脈絡下，解構與重構可能性與樣貌，考驗著不同時代中的人民的集體意識與行動。

本期一般論文中第一篇，是由陳百齡所撰寫的〈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政府檔案初探研究〉，該文讓我們穿越時空，再現史料的輪廓與意義。值得一提的是該文運用了文字探勘技術和人工檢視等多重方法，來建構當事人清單，以徵集目標檔案。運用軟體工具進行分類、清洗、結構化後，再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在方法與研究題材上，具創新性，十分難得。其研究成果，除描繪了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集體的輪廓與樣貌外，對權力擁有者加害言論自由所造成的社會傷害與影響，也提供了一些反思。

有趣的由張依萍所撰述的〈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年）〉乙文，我們卻發現，在科技、資本與市場交互引動下，當代的民主參與，已變成可以透過「消費」實踐完成。該文檢視了2012-2019年間公民募資平台專案。發現當倡議行動包裝成專案，進行募資時，捐獻者以金錢在募資平台上資助，募資發起方，成為代理行動者來執行倡議，此時政治參與便透過這種商品化歷程，達成實踐。此外，也發現有關公民募資倡議，善於使用「吸納」、「排斥」的策略，製造出衝突的共鳴。募資發起方會大量使用「我們」、「年輕人」、「草根」的字眼建構了發起方身份，象徵這群人與捐獻者共同擁有相對弱勢的身份。透過該策略召喚並轉換成屬於他們的「台灣認同」。值得討論的是當公民募資，成為日常，「愛台灣」的政治消費，成為當代政治

參與的一種形式時，其收編並合理化這種由新媒體所架構下的資本與市場的商業本質，已能瓦解原公民倡議應有的真正的集體行動，對民主政制的良性發展，或恐也是隱憂。

而在台灣，民眾的媒體信任與政治信任是否有關係？民眾的媒體信任是否會影響其政治信任？本期由王教安、王嵩音所發表的〈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2003~2018 趨勢分析〉乙文中可以發現，無論報紙、電視、雜誌、廣播與網路媒體，民眾對各媒體的可信度，皆逐年下滑，且都僅在及格邊緣，而且民眾對於政治信任的態度傾向不信任。各媒體中，電視媒體長期以來與政治信任的關聯較其他媒體密切。是以，捍衛電視媒體的專業自主，使其能對政治體系，進行理性評價，是台灣民主政治健全與良性循環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本期的研究誌要〈檔案與再檔案之間〉，作者井迎瑞以電影蒐藏家博物館的電影器材、戲服、文獻等三個檔案（資料庫）為例，說明檔案的發現、轉移、入藏等再檔案的過程，不是價值的逃逸路線，而是再脈絡化的過程，藉此歷程，能建立新的話語系統，激活想像，擴大影響。

該文引介了傳播學門較少研究的館藏文物檔案研究法。作者認為，檔案是一個封閉的空間，是一個自我完成的話語系統與表述。這種話語系統，能依靠著檔案內部的物件與物件；藏品與藏品間某種生動的內在連結，來建構其意義。當整個話語系統被建立之後，檔案的邊界就可以被打破，能產生檔案外意義的擴延力量，而這也就是檔案研究的價值所在，十分具啟發性。

本期的歷史與現場—作者陳順孝—以第一人稱的親身體會，重現中天新聞台換照聽證會的場景。透過新聞台運用媒體資源對不同意見的鑑定人，進行形象與人格撻伐的種種樣態。新聞台換照之聽證會，本該是一場理性資料的檢核與討論。透過聽證參與者親身的遭遇，卻驚見，過程中新聞台為捍衛其證照，不惜運用媒體資源，對鑑定人漫罵、惡意貼標與偏狹的意義論述等等，與其所主張之新聞自由，呈現了唐突、背離與矛盾的自我毀損，卻無任何的反觀與自覺。是以，咸盼該歷史與現場的記實，對新聞自由與專業倫理的討論，除了反思，也應有一套規範的法理機制。

當然本期最幸運的是能邀請胡逢瑛老師幫我們撰寫 2021 年由 Katerina Tsetsura & Dean Kruckeberg 主編的《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一書的書評。

胡老師是兩岸少數取得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MGIMO）國際新聞學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在兩岸傳播學者群中，其對俄羅斯傳播的熟悉與學養，足為翹楚。

該書匯聚了二十一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對於了解認識當代俄羅斯戰略傳播的主流思維與在地特點，是一本很具代表性著作。而透過胡老師的理論文獻的梳理與對話，對於習慣以歐美西方典範出發，理解俄羅斯戰略傳播的學術社群，該書對於如何立基於俄羅斯歷史、文化與意識形態來理解俄羅斯戰略傳播，多所論述。文章內容，提供了跨文化傳播研究，另一寬廣而多元的研究情懷，十分精彩。值得讀者尋幽探勝，享受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樂趣，與細思不同國別研究應有的宏觀與多元包容的研究視角。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1 年 12 月 17 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 政府檔案初探研究

陳百齡*

本文引用格式

陳百齡 (2021)。〈尋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身影：一個數位人文取徑的研究〉，《傳播、文化與政治》，14:1-37。

投稿日期：2020 年 11 月 24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6 月 25 日。

* 作者陳百齡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pailinch@nccu.edu.tw。本研究為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9 年「戒嚴時期涉及言論自由政治案件之研究暨展示腳本計畫案」（10823）委託專題研究成果之一部份。本文初稿曾於 2020 年 6 月在中華傳播學會年會研討會中宣讀，作者感謝評論人已故倪炎元教授針對本文所提供之卓見。

《摘要》

本研究是一個初探研究，指向戒嚴時期的「言論獲罪」案件。在 1949 年至 1992 年的威權統治期間，許多人因為言論被執政當局逮捕，遭指控「為匪宣傳」或「傳播謠言」等罪名，而受到軍事法庭定罪。

政治檔案是探索上述議題的重要史料管道，儘管台灣已經解嚴多年，但政治檔案開放步調卻相當緩慢，政治案件徵集和典藏工作仍在持續進行當中，學界仍處於探索階段。這個研究主題文獻鮮少，因此有探索之必要。

本研究將聚焦討論史料蒐集方法。研究人員藉由多重資料蒐集史料；先以文字探勘技術和人工檢視的多重方法，建構初步當事人清單，然後徵集目標檔案，然後運用軟體工具進行分類和清洗，並使之結構化，最後進行描述性統計。研究成果展現言論獲罪者集體樣貌的輪廓。

關鍵詞：言論獲罪、政治案件、檔案研究、數位人文取徑、傳播史

壹、緣起

楊田郎，1939 年出生於新竹。1954 年他 15 歲，在《新生報》新竹分社當送報生。警方發現新竹市一家戲院廁所牆上被人寫了「打倒蔣介石」、「消滅中華民國」、「消滅國民黨」等語句。辦案人員認為楊田郎涉嫌，指控他因為圖報復洩憤、因此書寫反動標語。偵訊後移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認定楊田郎「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4 年。¹

陳培達，以替人理髮維生。1972 年間在永和理髮店內向顧客說「大陸建設比台灣好，中國退出聯合國是被趕出來的」，同年又在八里另一理髮店向顧客說「毛澤東最偉大，是世界救星」。辦案人員認定他「連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4 年。²

吉天才，江蘇南京人，空軍作戰司令部汽車大隊駕駛中士。1962 年 12 月間，軍方發現軍營內遺有士官政治課本一冊，封面上寫有「王八蛋放狗屁」、「為何不以貪官為故事題材？」內頁空白眉首處，則書寫「解放台灣」、「同志們要想回大陸，就要起來革命解放你還等到何時」等文字，以叛亂罪嫌移送空軍總部，軍事法庭認定「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4 年。³

盧樟宏，早年投身軍旅，1955 年因病申請退伍，和朋友在桃園縣大溪鎮合開油漆廣告行。同年 10 月下旬，適逢蔣介石總統生日，當地民眾服務社委託繪製總統華誕慶祝看板八幅。其中一幅「北伐成功受全國民眾歡迎」圖，在民眾歡迎行列圖畫下方書寫「王八蛋隊」、「便所人」等字樣。軍事法庭認

¹ 楊田郎案，參見：(44)審特字第 0058 號判決書，國防部，〈許約民等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43/1571/0864-2）。

² 陳培達案，參見：(63)初特字第 0056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陳培達叛亂〉，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63/1571/208）

³ 吉天才案，參見：(54)宗效判字第 0033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吉天才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55/1571/029）。以及國防部，〈吉天才違法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54/1571/4060）。

定「以文字圖畫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4 年。

4

上面列舉的楊田郎、吉天才、陳培達、盧樟宏等四人，雖然出身不同地域、從事各行各業，但卻有共同遭遇；他們都因言論而獲罪。更確切的說，他們都在台灣實施動員戡亂法制期間發表演論涉及叛亂罪名，因而遭受特別刑法判處重刑。若用解嚴後台灣的各種言論尺度衡量、這四人言論的內容，難以想像會使人獲罪。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言論確實足以讓當事人喪失自由、甚至因此魂斷刑場。

上述四個案件並非少數個案，在戒嚴時期，類似上述的言論獲罪案件數量相當多，初步估計在戒嚴期間累計超過千件，僅次於左翼案件的數量，佔政治案件總數第二位。然而先前文獻鮮少觸及這個主題。因此學術界有必要有系統地進行探索。

往昔在戒嚴期間，官方將政治案件檔案長期閉鎖於石室金匱，數十年未曾對外界公開。但即便在兩度政權交替之後，檔案解密的腳步也仍然遲緩。政治案件檔案開放時程和內容複雜程度，使得我們對於這一群「言論獲罪者」所知仍然有限。本研究指向兩個目的：（一）如何建構一套方法蒐集言論獲罪者檔案史料？（二）根據這套方法，描繪言論獲罪者的整體樣貌為何？

本研究不僅將可應用於各種類型的政治檔案資料蒐集的參考，這些言論獲罪者的史，展現戒嚴時期言論自由歷史發展的曲折途徑，或可增加我們對於台灣傳播史的理解。

貳、言論獲罪案件

人民發表演論的權利受到憲法保障。但往昔台灣在戒嚴的非常狀態下，人們發表和執政者立場相左的言論、可能被冠以「叛亂行為」之名，這些發表演論卻被當作叛亂者的人們，動輒遭到執政當局援引動員戡亂時期體制、

⁴ 盧樟宏案，參見：(44)審特 0113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法局，〈盧樟宏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347701/0044/3132433/433）。

課以嚴苛刑責。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時任台灣省主席陳誠宣告實施戒嚴令，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解除金門馬祖地區的臨時戒嚴令為止⁵，在這段長達 43 年的期間裡，執政當局以實施戒嚴為由，實施特別法制凍結人民憲法權利。在這段期間，執政者以臨時條款取代憲法若干規定，並制訂「動員戡亂時期」特別法，將原本憲法明文保障的言論自由權、集會結社權、人身自由權、法院提審權等憲法權利，加以凍結。原本憲法規定「非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但在戒嚴時期，即使非現役軍人的一般平民，一旦涉及叛亂案件則被視為匪諜、而遭交付軍事審判。

在動員戡亂時期特別法制中，和言論自由最相關的法律規定，以《刑法》第一百條、《懲治叛亂條例》第六、七條，以及《檢肅匪諜條例》第八條為主。1939 年制訂的《刑法》第一百條內亂罪，在 1949 年隨國民政府遷台而適用於台灣，該法條主要規範內亂罪構成要件。通常現代法治國家對於內亂罪的規範，以「暴力脅迫行為」為對象，但在 1992 年立法院修正此一條款之前，思想和言論均可視為叛亂，因此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中，許多案件均因當事人發表言論遭被認定為叛亂案件。該法條僅列舉四項主觀要件（不法意圖），卻未明訂客觀要件，違反罪刑法定主義所主張的刑法明確性。因此，在政治案件審判中，罪刑類型和輕重往往受偵查、起訴和審判人員心證之左右。

《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源訓政時期以來處置叛亂行為的一項特別法。⁶ 該法除規定平民身涉及叛亂由軍事機關審判外，也條列叛亂類型和刑度。《懲治叛亂條例》言論獲罪最相關的條文有二，都是以言論內容為核心形成構成要件。

⁵ 所謂「解除戒嚴令」，一般文獻所指解嚴，是指總統蔣經國 1987 年 7 月 15 日針對當時台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臨時戒嚴令而言，但是金門和馬祖等所謂「戰地政務區」的臨時戒嚴令，則要一直等到 1992 年 11 月 7 日才告解除。

⁶ 《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最早是 1929 年《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31 年《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法》頒佈後廢止前法，1948 年再修法頒佈《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194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於 6 月 21 日實施。參見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2015，頁 58-64）。

第六條「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假消息／不實訊息自古已然，但若在戒嚴時空下傳佈不實訊息，則會被課以重罪。但問題是：訊息內容確實與否，以執政者版本為準。懲治叛亂條例對於不實訊息傳佈行為課以重責，基本上反映執政者對共產主義的想像和心態。⁷ 因此，凡是傳佈與當局口徑不一致的訊息，即有涉及叛亂罪嫌之風險。例如 1959 年間，陸軍少尉郭振邦向同事說道「假若胡適能任總統，有青年黨來領導，中華民國就健全了」，又說「關於台灣選舉，根本不是老百姓的意思，真正百姓擁護的人，沒有選出來，因為國民黨用槍用生命來威脅」又以筆名投書《自由中國》雜誌，提及「今天部隊基層士氣低落，排長級有三分之一公開宣佈不幹，工作消極者無法統計，班長消極者百分之五」等語，軍事法庭認定為「不實消息，足以動搖台灣民心」，判處有期徒刑 7 年。⁸

第七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一條文通稱為「為匪宣傳」。這則條文中的「叛徒」定義相當廣泛，除當時主要敵人中國共產黨外，也指當局所認定之敵對勢力；因此定義範圍相當廣泛。「有利於宣傳」則未有客觀要件。例如，1968 年間，台南二中教員王伯涵，在課堂上對學發表「共匪兵力強大、反攻大陸無望」等言論，被指「為匪宣傳」，遭判有期徒刑 7 年。⁹

和言論獲罪有關的另一特別法，則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這項法律將「匪諜」界定為「懲治叛亂條例所稱之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擴張解釋匪諜的定義範疇。此外，該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被告「情節輕微而有感化必要者，交付感化」。許多言論獲罪者因無法。例如，1966 年間桃園一家製衣公司出納彭利宏，因為被發現在日記裡蔣介石剪報尚

⁷ 誠如學者 Foucault（轉引自劉北成譯，1992）指出，中世紀歐洲執政者對抗瘟疫時，經常採取防堵和隔離策略，藉以瘟疫阻絕在特定空間。近代執政者將犯罪行為視同瘟疫，而將犯罪者或嫌疑人視同染有瘟疫者，將犯罪者隔離在監獄和感化院等矯治機構中。

⁸ 郭振邦案，參見：（47）岡字第 0259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務局，〈張景海等叛亂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187701/0045/1571/11236038/157/012）。

⁹ 王伯涵案，參見：（60）初特字第 0049 號判決書，國防部後備司令部，〈王伯涵叛亂減刑〉，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440000C/0064/1571.62/117）。

像旁書寫「混蛋們的狗嘴」等字樣，被認定侮辱文字、思想偏頗，裁定交付感化。¹⁰ 又如，1969年間空軍通航聯隊士官白光雲將部隊閱覽室《中國空軍》雜誌封面上蔣介石總統肖像，以藍色原子筆塗劃圈叉（○×），並書寫穢語，軍事法庭認為「以有利叛徒宣傳」而判處感化教育。¹¹ 感化為保安處分，屬不定期刑，因此當事人釋放日期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傅正因不服生教所管教措施，遭延長管訓處分時間。

人們以語言、文字、圖像表達個人思想和情緒，屬於基本人權一環，受憲法保障。但戰後在台灣執政的國民政府當局，為對抗共產主義者所採取的策略正如中世紀防阻瘟疫。當局為阻止極其意識形態在台灣島內蔓延，除了大舉消滅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人，同時也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視為「病菌」，嚴密監控、逮捕、處置言行任何可能涉嫌和官方不同意識形態者，猶如為防止瘟疫而將「可能帶原者」隔離。這個時期的防堵採取「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政策，原本表達個人思想意念的言論，被當成叛亂行為；只因和當局口徑不同，便被當局視為等同於叛亂罪責（藍博洲，2003）。如此不僅產生許多「思想犯」或「良心犯」，更在軍事審判制度扭曲之下，造成許多冤、假、錯案（蘇瑞鏘，2011；蘇慶軒、王奕婷、劉昊，2021）。以「言論獲罪」為對象的研究，指向台灣戒嚴時期以特別法管制下的言論案件，這些案件所衍生的政治檔案，是學者探索當代台灣傳播歷史和傳播法規的重要研究素材。

一、言論獲罪研究

過去關於戒嚴時期言論獲罪的研究，多側重在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範疇（如王天濱，2005；呂東熹，2000），這類研究，經常針對新聞從業人員個案為研究場域，號稱為言論自由之研究。似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這類

¹⁰ 彭利宏案，參見：（44）審聲字第0145號裁定書，國防部，〈馬興生等感化犯結訓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48/1537.3/7132）。

¹¹ 白光雲案，參見：國防部，〈空軍防諜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A305000000C/0059/1352/3010）。

研究將「當局對於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打壓」，等同於「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實際上言論自由為基本人權，但新聞自由則為維護民主體制之機構權利，二者概念內涵實不相同（林子儀，1999）。

新聞工作者是社會菁英，教育程度高，社會資源具較豐富，一旦被捕則人人側目。這群人佔社會整體人口比例很小。其實，戒嚴時期一般民眾的日常語話、文字書寫、郵電通訊，都因為遭受到情治單位監控，因此每天都生活在不確定的風險當中。例如，老百姓在茶餘飯後對國事現狀發發牢騷、或者寫信給朋友陳述困境的文字，都會成為懲治叛亂條例「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或「傳佈不實訊息」等罪名追訴處罰的對象。古籍中所謂「文字獄」、「偶語棄市」，並非戒嚴時期升斗小民的歷史想像，而是生活的日常。先前研究以新聞工作者獲罪經驗當成言論獲罪做研究，不僅混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分野，同時把社會菁英經驗放大成為社會整體經驗，取樣似有偏頗。

先前研究多以個案研究為主，因政府檔案史料一直未公開，先前學者常取材自前人筆記或當事人口頭陳述，在有限素材下從事研究，不啻以管窺天。即便近年來史料次第解密，各種檔案公開速度仍然有限。綜上所述，言論獲罪案件屬政治案件中的大宗，但先前學者著墨有限，並未能建立這類案件的整體形貌。

二、言論獲罪研究的挑戰

言論獲罪研究是政治案件研究的一環。1990 年以後，許多學者投入政治案件的研究，這個領域匯集歷史、法律、政治、社會等學門的學者，各自依照其研究興趣而取所需要的議題。例如，在法律和政策研究領域，裘佩恩（1997）剖析政治案件的法律類型的演變，以及不同時期法律角色的演變。劉熙明（1999）則探討兩蔣父子不當介入政治審判的角色。蔡墩銘（2004）則聚焦探討白色恐怖時期等「惡法」的立法和審判問題。江如蓉、翁大鈞（2006）以死亡個案為例，探討戒嚴時期國家的權力濫用行為。蘇慶軒（2008）則探討 1950 年代政治案件和國家建置的關係。蘇瑞鏘（2010）則利用大量案件分析政治案件處置各個重要環節。

此外，有些學者則聚焦於具體案件或特定族群進行研究，是以人物身份或組織屬性為研究的核心關注。例如，林正慧（2009）、梁正杰（2007）、王漢威（2011）等人針對中共台省工委會案進行研究；曾培強（2009）探討台灣民主自治聯盟案等。也有學者從族群角度進行個案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從族裔屬性或職業角色進行探討。例如，藍博洲（2003）、邱榮裕（2006）、陳建傑（2011）針對客家族群的政治案件進行研究；汪明輝（2006）針對鄒族事件討論；楊翠（2006）針對女性叛亂犯在白色政治事件中的角色；以及陳君愷、蘇瑞鏘（2006）關於威權時代校園政治事件的探討等，呂東熹（2000）針對新聞機構受壓迫案件。

本研究擬聚焦於「言論獲罪」案件。在各種政治案件研究中，「言論獲罪」案件有其顯著性。首先，言論獲罪案件涉及基言論自由侵害，整個社會更因此付出代價，誠如英國阿克頓爵士指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在臺灣政權轉換過程中，執政者若因權力魔戒之惑而重演前朝憾事，並非全民之福。學者經由研究解讀並分析言論獲罪案件，讓史料建構為人權教育的反思素材，做為後事之師，避免台灣公民社會重蹈覆轍，建立史料是上述想法的起點（陳翠蓮，2021）。

這個研究最大挑戰之一是獲取資料母體規模，也就是到底有多少政治案件是因言論而獲罪？根據 2021 年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報告（葉虹靈，2021，頁 6），戒嚴期間受裁判人數為 13268 人。¹² 可惜的是，除左翼案件之外，先前研究鮮少針對特定類型進行探索。在數量上萬的政治案件中，若以依照《懲治叛亂條例》罪責類型區分，則政治案件問罪類型可區分為非法顛覆、為匪宣傳、參與共黨組織、包庇叛徒等，「言論獲罪」既是顯著類型，則應可經由統計獲知比例，但先前文獻並未針對類型進行統計，因此目前尚無從得知「言論獲罪」數量比例。然而，經由初步觀察可知，「言論獲罪」案件特色在於規模通常較小、但數量多。被告人數通常只有一至二人，案件年份分佈相當平均。由於當局和社會大眾歧視政治案件當事人，因

¹² 這項研究報告指出，截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為止，受裁判人數計為 13268 人，但因有一人多案情況，若將受裁判人不同案件分開，則為 13683 筆（人/次）。參見葉虹靈（2021，頁 6-15）

此從公開資料中要獲取當事人線索並不容易。因此本研究應採何種取徑進行探索，值得商榷。

本研究將言論獲罪者視為一個群體，進行史料研究。群像研究取徑（Prosopography）是歷史學門中的一個流派，英國學者 Stone 是最早倡議群像研究的學者。他定義為「對一個特定歷史群體的共同特徵之考察」（Stone, 1971）；史家蒐集某一群歷史人物生平事蹟、統合這些個別人物故事、再轉換成具有一般性意義的歷史敘事。歷史學者根據研究議題，蒐集目標場域的人物史料，並根據研究提問，將傳記內容進行排列、統整和呈現，從結構化資料中找出具有顯著意義的變項，進行統計分析，藉以瞭解人物群體生活樣態或彼此之間的關係連結，從而再現傳主們的整體社會樣貌（Mathisen, 2007）。由於史料處理曠日廢時，史家在 1990 年代以後借用資料庫、內容標記、文本探勘、網絡分析等資訊科學技術，讓資料處理更有效率（翁稷安，2016；劉昭麟，2018）。

本研究擬運用上述數位人文研究取徑，蒐集言論獲罪檔案，以再現言論獲罪者的整體形貌。這個研究將使用政治檔案，並因此面對面臨政治檔案研究的若干挑戰。

所謂「政治檔案」，是指由政府機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蘇瑞鏘，2010，頁 28）。一般是指由政府機構所徵集和典藏、因政治案件所產生的審判、罪刑宣告以及執行等過程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紀錄（陳進金、陳翠蓮、蘇慶軒、吳俊瑩、林正慧，2021）。「言論獲罪」案件的線索，有極大部分存在政治檔案之中。台灣兩度政權交替，政治檔案逐漸解禁（陳翠蓮，2021，頁 18-19）。自 2001 年迄今，政治檔案陸續公開提供研究人員使用，但迄今仍未完全解密。¹³

¹³ 檔管局徵集檔案迄今共七波，主要是從國防部、軍法局、軍務局、警備司令部，以及調查局等政府機構所管轄的訊問審判發監開釋等檔案史料。其中第一波主要為二二八事件相關，2002 年的第二波開始，主要為戒嚴時期政治檔案，目前處理中的是第六波和第七波徵集的檔案，則主要是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向國家安全局徵集戒嚴時期監控人身的檔案。

目前政治檔案主要來自四個管道，亦即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管局」）、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以下簡稱「補基會」）、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以下簡稱「人權館」）。這四個機構組織各自有其使命，處理有關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檔管局職司國家檔案典藏，因此後設資料以檔案和產生機關為主。補基會旨在受理政治受難者補償申請，經認定事實後決定賠償對象和金額。促轉會主要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在過去三年中陸續頒佈有罪判決公告。最後，人權館則因委託、出版和展示相關研究，典藏先前文獻資料成果。除了上述三個官方機構來源，還有一個民間打造的資料來源，即「台灣浩劫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數位資料庫」，補充上述官方資料來源之不足。¹⁴ 雖然上述公私機構都和政治檔案有關，但由於各機構角色互異、檔案運用目的不同，機構分類編碼邏輯也不同，每一套資料各自有流水編號和後設資料，不僅建構資料庫經費重複，也無法發揮多重機構綜效（*synergy*），從而先前成果不容積累。

綜上所述，政治檔案採集面對重大挑戰，因此必須建構一套系統化的操作模式，以下陳述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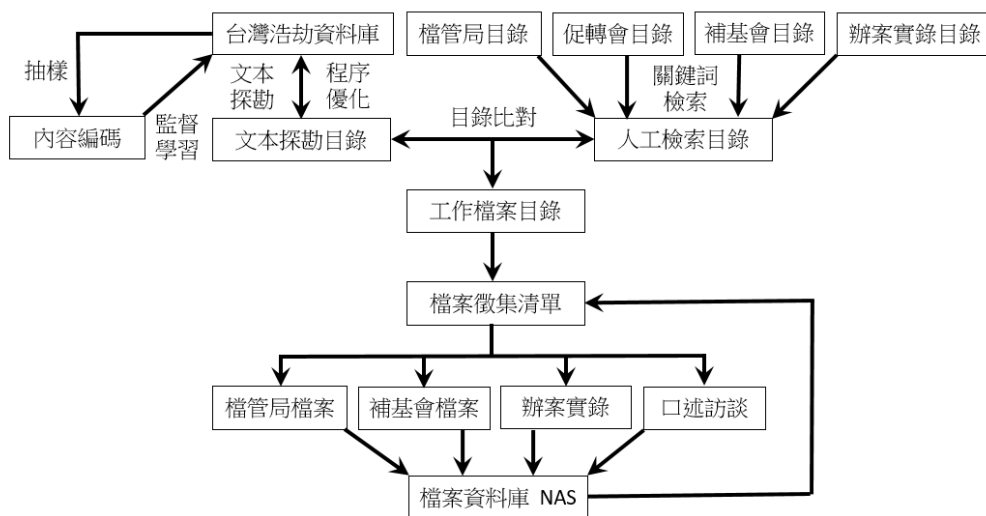
參、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進行期間為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研究人員所建構一套史料處理模式，研究始於目錄清單建構，根據清單蒐集人物檔案，進行資料清理和結構化，最後則建立資料庫，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資料蒐集分成三個主要階段：目錄蒐集、目錄比對，以及檔案徵集。步驟如下圖所示：

¹⁴ 該資料庫為政治受難者張茂雄所創，蒐集政治案件 3250 案，收錄受難者 12541 人（但由於有少數受難者係一人數案，因此實際檔案數量為 13020 筆）。由於該資料庫系個人獨力完成，部分內容仍有缺漏和錯誤。不同案件的案情略述內容品質也有落差。但該資料庫放置於網際網路供公眾查詢，未設取用限制。

圖一：資料蒐集流程示意圖



一、建構目錄清單

由於本研究以書寫文字政治案件當事人為分析單位，「浩劫資料庫」所提供之流水編號和後設資料，遠比官方資料來源豐富而完整，縱使其內容可能存在若干瑕疵，如上所述，本研究仍選擇為目錄蒐集階段從事文本探勘的對象。目錄蒐集的目的再建立一個清單，以掌握潛在的資料範圍。由於言論獲罪案件大多是一人一案，因此本研究目錄是以個別受難者為分析單位（而非以案件為單位）。

研究人員一方面運用文本探勘技術，透過「浩劫資料庫」案情略要欄位記載，辨識出符合「言論獲罪」特徵的受難者記錄。本研究係採用監督式機器學習，進行文本探勘。所以要先以隨機抽樣取出樣本，經由編碼員進行人工檢視，區分出「符合特徵」（正向樣本）和「不符特徵」（負向樣本）的樣本，仍後交由電腦進行機器學習。

(一) 人工編碼：研究人員先自「浩劫資料庫」隨機取出 700 筆政治受難者記錄，其中 100 則為訓練用，600 則用於正式編碼。編碼員經訓練後，先試做 100 則，核對編碼結果後修正有出入個案，然後以三天時間針對 600 筆資料進行正式編碼。正式編碼結果，從分辨出 69 筆正向樣本（符合「言論獲罪」特徵），以及 531 筆負向樣本（不符「言論獲罪」特徵）。兩位編碼員編碼的結果，根據信度公式進行核算，編碼員之間相互同意度為 95%。

(二) 監督式機器學習：正式機器學習共計進行三回合。工程師針對 600 筆已標記完成的檔案區分為六組，每次以 100 筆進行學習和測試。研究人員使用 Jieba 初始字典進行斷詞，使用 TF-IDF，將詞彙轉換為向量，再以線性 SVM 做為分類器。正向樣本 68 筆，負向樣本 531 筆，未知樣本 1 筆。

第一回合機器學習的結果，總共跑出 419 筆正向判斷。由於這個結果不如預期，因此研究人員重新檢視樣本之後，進行第二次學習。第二次回合機器學習的前置作業程序同於第一回合，但新增 3 筆正向樣本，減少 2 筆負向樣本。亦即 600 筆資料中，包含正向樣本 71 筆，負向樣本 529 筆，結果共跑出 461 筆正向判斷。雖然符合特徵樣本數目稍微增加，但結果仍和研究人員對於資料規模的估計有出入，因此研究人員進行學習優化程序。

(三) 機器學習優化——斷詞工具的優化：研究人員首先挑出最高的 10-fold cross-validation F1 數值進行以下優化處理：(1) 置換斷詞工具，原先斷詞使用簡體版的斷詞詞典，在此換成支持繁體文本的詞典版本。第三，根據本研究的需求，將詞典客製化。(2) 修正斷詞方式：研究人員取出權重最高的 200 個詞彙，進行人工檢視，並逐一修正錯誤詞彙，例如：有利、結識、日記、荒謬言論、演說、辯證法、三七五減租、經常、收聽、不滿、辦公室、閱讀、匪書等。(3) 設定文本轉換向量門檻：研究人員移除單一字詞彙（亦即必須含兩個字或以上的詞彙方得轉換為向量），該詞彙至少必須出現在三篇文章中，並且最多不能出現在 7 成以上文章中，始得轉換。最後，限制權重分數最高的 5000 個詞彙，方得轉換為向量。(4) 學習模型也更換為神經網絡。¹⁵ 第三回合：正負向樣本和第二次學習相同，經過優化之後，總共跑出 861 筆正向判斷，資料筆數較先前大幅增加。在機器學習結束後，進行檔案目錄校正。之所以需要檔案目錄校正，是因為原先文本探勘的對象為「台

¹⁵ 上述優化調整策略，以 (1) 和 (2) 影響較大，(3) 和 (4) 則是因應 (3) 和 (4) 進行調整後的數值。

灣浩劫資料庫」中的案情略要欄位，因該欄位內容來自判決書，判決書本多羅織，加以前人轉錄品質參差不齊，因此必須交叉比對，以避免誤判。

除了使用資訊技術進行文本探勘，研究人員也使用同一套關鍵詞，在其官方資料來源進行檢索，以擷取言論獲罪者的相關記錄，以補文本探勘之不足。此處所謂「官方資料來源」，主要指的是檔管局網頁、促轉會撤銷有罪處分公告，補基會檔案目錄，以及情治單位辦案實錄要案紀實等四個來源，研究人員以關鍵詞組「有利*叛徒*宣傳」、「散*謠言」以及「傳播不實*消息」進行資料檢索。研究人員以關鍵詞「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以及「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鍵入查詢欄位，或以正規表達式進行檢索。

二、目錄清單查核和結構化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為止，本研究共獲取檔案目錄 1078 筆，其中共有 823 筆目錄來自於研究人員探勘「台灣浩劫資料庫」，佔檔案目錄總數 76 %。另一方面，研究人員透過關鍵詞進行人工檢索，也獲得 255 筆檔案目錄，約佔總量 24%。人工檢索經扣除重複之後，檢索自檔管局網頁的目錄有 110 筆（10%）、檢索自促轉會撤銷公告的目錄有 66 筆（6%）、檢索自調查局出版之五冊辦案實錄《要案紀實》的目錄，共有 66 筆（6%）。此外，研究人員處理數位檔案內容時，從這些檔案中也發現 63 筆目錄。獲取結果如下：

表一：檔案目錄獲取結果

取得方式	資料來源	個別數量	個別比例	小計	合計
文本探勘	第一次探勘	405	38%	823	1078
	第二次探勘	418	39%		
人工檢索	檔管局目錄	110	10%	255	
	促轉會撤銷公告	65	6%		
	實體數位檔案	63	6%		
	辦案實錄	17	2%		
總計		1078	100%	1078	100%

研究人員建立目錄之後，首先針對言論獲罪者進行確認，透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資料庫、台灣浩劫受難者資料庫，進行盤點，確認當事人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事件年份、出生地、學歷、職業身份等，如下圖所示：

圖二：言論獲罪者之年籍資料

編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齡	地區	縣市	畢業學校	職業
00065	黃金煌/	男	1928/7/9	33	臺灣	澎湖縣		軍監受刑人
00103	黃鴻基	男	1910/9/10	39	福建	福州市	大學	無業
00130	劉建修	男	1928/11/29	49	臺灣	新竹縣	遞信講習所	商人
00214	陳木金	男	1930/5/10	42	臺灣	新竹縣		商/書攤商
00226	楊達	男	1906/10/18	45	臺灣	臺中市	大學	力行報副刊編輯/作家
00383	謝克倫	男	1922/10/14	35	江蘇	江陰縣		軍監受刑人
00519	葉貽恆/	男	1922/10/28	28	福建	安溪縣		台北女師附小學教員
00586	宋孟韶	男	1926/5/16	25	河北	北平市		受刑人
00592	黃祖權	男	1924/1/21	33	江蘇	上海市		受刑人
00839	張木生	男	1910/4/10	41	臺灣	臺北縣	大學	汐止鎮副鎮長
00912	王士彥	男	1927/9/10	26	浙江	奉化縣		獸醫血清製造所技術員
00947	柯傳松	男	1909/6/8	43	臺灣	南投縣		教員
01006	黃達開	男	1926/10/29	27	臺灣	苗栗縣	小學	農
01038	洪養	男	1919	33	臺灣	嘉義縣		商
01042	陳森沂	男	1929/11/15	24	臺灣	嘉義縣		軍監受刑人
01088	劉雨雲	男	1925/9/24	30	臺灣	苗栗縣	中學肄業	中油苗栗探勘處事務生
01234	劉效桓	男	1920/6/29	35	山西	祁縣		海軍要港管理處下士
01245	王泛洋	男	1924/9/27	30	湖北	黃崗縣	臺灣大學法律系	台灣新生報南版校對
01295	曹思義	男	1919/3/10	36	安徽	青陽縣	西南聯大肄	台灣大學註冊組職員
01306	王東山	男	1925/11/21	31	江西	九江縣	臺灣大學	基隆港務局課員
01338	徐剛	男	1929/3/23	25	湖北	武昌縣	初中	陸軍19師少尉幹事
01411	張瑞風	男	1926/3/25	29	臺灣	臺北縣		土城鄉公所幹事
01472	雷震	男	1897/5/26	54	浙江	長興縣		自由中國發行人
01574	孫以蒼	男	1928/12/13	22	安徽	宿縣		不詳
01579	趙元林	男	1914/9/19	41	遼寧	旅順縣		台鐵局科員

本研究所徵集的檔案主要指向四種資料：(一) 政治檔案：係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向各機關徵集、處理、並典藏之政治案件檔案；(二) 補償文件：係政治案件當事人或其家屬在 2001 年前後，向財團法人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之文件，其中部分已經當事人同意公開，係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保管，並已轉化為數位檔案格式典藏；(三) 辦案實錄：係戒嚴期間司法行政部（今法務部）調查局根據偵辦案件所撰寫之內部參考書籍，其中部分內容為言論相關之政治案件，共計八冊，目前以已為數位檔案形式保存；(四) 口述訪談：解嚴以後迄今，由公私立機構委託學者專家向政治案件當事人或其家屬做的口述歷史訪談，其中部分當事人係言論獲罪，部分口述訪談為結

案報告，另有若干則已正式出版，國家人權博物館典藏之目錄，西對較為完整，並典藏上述口述談之紙本或電子檔案。

研究團隊人員經比對目錄之後，為每一當事人建立資源清單。關於本研究建立之清單，該清單係以言論獲罪者為軸，在試算表上建立表單。如下圖所示。所有進一步的資料細節，參見以下圖示：

圖三：檔案目錄中的資料來源

編號	姓名	性別	蒐集管道	核對	政治檔案	補償文件	辦案實錄	口述訪談	資料來源
00065	黃金煌/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00103	黃鴻基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0130	劉建修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1		1	2
00214	陳木金	男	文本探訪/第一次	確認					0
00226	楊達	男	文本探訪/第一次	確認	1			1	2
00383	謝克倫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1				1
00519	葉貽恆/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2
00586	宋孟韶	男	文本探訪/第一次	確認					0
00592	黃祖權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00839	張木生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錯誤					0
00912	王士彥	男	文本探訪/第一次	錯誤					0
00947	柯傳松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偽陰性	1				1
01006	黃達開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錯誤		1		1	2
01038	洪養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錯誤					0
01042	陳森沂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01088	劉雨雲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1234	劉效桓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01245	王泛洋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01295	曹思義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1	1		1	3
01306	王東山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1				1
01338	徐剛	男	人工檢索/檔管局	確認	1				1
01411	張瑞風	男	文本探訪/第一次	確認	1				1
01472	雷震	男	人工檢索/促轉會	確認	1				1
01574	孫以蒼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01579	趙元林	男	文本探訪/第二次	確認					0

此外，從官方與民間資料庫均提供了當事人當時所述處置，包括類型和判決書編號，可做為交叉比對的資料。

圖四：檔案目錄中的判決書類

編號	姓名	初審字號	覆判字號
00065	黃金煌	47, 審聲, 0001 / 48, 警審更, 0007	47, 普抗映, 0062 / 47, 覆普抗晶, 0062
00103	黃鴻基	39, 安澄, 1260	
00130	劉建修	65, 諫判, 0078	65, 曉陽覆普, 0100 / 66, 曉陽, 0522
00214	陳木金	61, 初特, 0053 / 61, 秤理, 3980	
00226	楊達	39, 安潔, 0666	
00383	謝克倫	49, 警審聲, 0005	
00519	葉貽恆	39, 安潔, 2598	39, 勁勃, 1057
00586	宋孟韶	43, 審三, 0052	44, 理琦, 1357
00592	黃祖權	39, 安潔, 3152	39, 勁勃, 1231
00839	張木生	39, 安澄, 3426	61, 覆普教丙, 0043
00912	王士彥	42, 台高訴, 0007	
00947	柯傳松	41, 安潔, 3189 / 42, 安度, 0634	42, 廉靡, 0001
01006	黃達開	41, 安潔, 1730	
01038	洪養	41, 安潔, 3148 / 42, 安度, 0170	41, 防隆, 2440 / 42, 廉靡, 0159
01042	陳森沂	46, 安訴, 2778	43, 審復, 0061
01088	劉雨雲	43, 審三, 0115 / 43, 審復, 0041	43, 清澈, 1461 / 43, 清澈, 2645
01234	劉效桓	43, 觀瞻, 0441	
01245	王泛洋	42, 廉度, 0089	
01295	曹思義	43, 審聲, 0029	43, 清澈, 1122 / 43, 清澈, 1817
01306	王東山	45, 典兼, 0666	
01338	徐剛	42, 廉度, 0155	
01411	張瑞風	43, 審三, 0092	44, 理琦, 0034 / 44, 理琦, 1211
01472	雷震	49, 警審特, 0035	49, 覆高淦, 0068 / 49, 澈淦, 0563
01574	孫以蒼		
01579	趙元林		

三、檔案史料調閱

本研究之檔案徵集係透過人權館協助，其中政治檔案係向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發文申請數位檔案。其餘三種檔案，則皆向人權館調閱。由於本研究共涉及上千名政治案件當事人，徵集政治檔案的數量非常龐大、程序也較為複雜，也是本研究最花時間的過程。政治檔案可分為專案型卷宗和彙編型卷宗兩大類型。

專案型卷宗是針對特定人物（被告）或案件所建立的檔案。專案型的卷宗以當事人為單位所產生的資料。例如，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檔案稱為〈郭衣洞叛亂案〉。當一個案件涉及多人時，則用第一位當事人姓名來命名，例如〈陳軍叛亂案〉是以陳軍命名的案卷，這個案卷中包含 15 位當事人的檔案。專案型檔案通常是偵查／起訴／審判階段產生的文件。專案型檔案政治檔案中僅有少數案件為個人從偵訊至刑滿開釋的全宗檔案，檔案大多數內

容集中在偵訊和審判階段，因此當事人發監執行以後的紀錄，就要仰賴彙編型卷宗。

彙編型檔案卷宗，則是將同時期內容相似的檔案為單位，打包為一個大型檔案。這類檔案共同特色，是匯集多數案件而非單一案件，每個彙編型檔案裡都包含眾多當事人檔案，並以第一位當事人姓名替檔案命名。例如，例如，〈蔣文正等叛亂案判決書〉一案涵蓋 1969 年至 1971 年間 50 位「為匪宣傳」案件當事人向國防部軍法局申請覆判的判決書。彙編型檔案的卷宗類型區分四類：程序、書類、機構，以及案件類型。程序類卷宗是以同一程序為主的彙整檔案。例如「發監執行」或「結訓開釋」；書狀類卷宗則是同一種法律書類集合，例如某段期間的判決書；機構類卷宗則是將某段期間同一機構（如陸海空軍總部）卷宗加以匯集；最後，彙整檔案卷宗，則是將同一類型的多數檔案，彙整在同一批卷宗內，例如〈非法顛覆案〉、〈違法案〉、〈叛亂案〉、〈沒收財產案〉等。

表二：政治檔案典藏方式列表

類型	分類方式	卷宗內容	案件舉例
專案	人物	單一案件，以當事人命名的所有卷宗	廉亞東案
	事件	單一案件，以事件命名的所有卷宗	鹿窟案
彙編	程序	多數案件，彙整同一程序的卷宗	王士珍等感化結訓案
	書類	多數案件，彙整同一書類的卷宗	蔣文正等叛亂案判決書
	機構	多數案件，彙整同一機構的卷宗組合	56年度空軍防諜案
	案件類型	多數案件，彙整同一類型的卷宗	39年非法顛覆案

根據政治檔案典藏的分散特性，研究人員在徵集檔案時，必須考量下列因素：

(一) 同一當事人檔案須多次徵集：由於檔管局資料係以卷或案為單位，這些卷或案分由不同單位提供，因此研究人員徵集某一特定當事人檔案時，可能需要發出二至四則徵集需求，以涵蓋案主不同階段文件。例如，以陳永川為例，偵查到起訴階段的檔案，在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的〈陳永川叛亂嫌疑〉，初審至覆判的檔案，則在國防部軍法局〈陳永川叛亂案〉，此外減刑相關檔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陳永川叛亂減刑案〉。陳永川案例並非少數個案，類似例子所在多有。因此當研究人員向檔管局申請調閱，有時未必一步到位，而需要嘗試錯誤、反覆申請，至檔案全部到齊。

(二) 調閱成功的檔案史料需要過濾、歸類和登錄：研究團隊人員所取得檔案都是以頁為單位的數位化低解析度掃描影像檔，以光碟或雲端存取方式傳遞。多以檔號為檔案命名，置放在多個檔案夾中。研究人員通常重新為檔案命名，並檢視檔案是否為徵集對象。由於政治案件中有許多當事人為同名同姓、或一人多次遭問罪，因此必須由研究人員逐筆檢視，確認徵集對象無誤，才能列為可用檔案。

(三) 經過過濾、歸類和登錄之後的檔案必須再經過研究人員判讀，以確認是否言論獲罪案件：文本探勘獲取的目錄清單，未必能保證檔案性質確實屬於「言論獲罪」，必需再經過人工檢視檔案內容，才能判定。資料集可能出現種種錯誤，原因不一。有可能出於原始文本品質瑕疵、有可能是因為加權係數使用不當、也有可能來自於當年法官判決缺乏一定標準，影響文本探勘效果。以下圖五，自左方起算第四欄的「核對」欄位，即是研究人員經核對之後，標示核對結果正確或錯誤，用來計算文本探勘錯誤的比例。

圖五：檔案目錄中的核對

編號	姓名	性別	核對	行為事實	法條	主刑	從刑1
00065	黃金煌/	男	確認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103	黃鴻基	男	確認	先後借覽禁書	懲叛，7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5年
00130	劉建修	男	確認	購買借覽禁書	肅匪，8-1-2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4年
00214	陳木金	男	確認	書攤販賣照片	肅匪，8-1-3	交付感化，3年	
00226	楊達	男	確認	報紙刊登宣言	懲叛，7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10年
00383	謝克倫	男	確認	課堂演唱歌曲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519	葉貽恆/	男	確認		懲叛，7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10年
00586	宋孟韶	男	確認	服刑監所書寫字條	肅匪，8-1-1	交付感化，3年	
00592	黃祖權	男	確認	服刑監所書寫字條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0839	張木生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0912	王士彥	男	錯誤		刑法，100-2	有期徒刑，1.5年	褫奪公權，2年
00947	柯傳松	男	偽陰性	幫助印製書籍文件	懲叛，2-1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6年
01006	黃達開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1038	洪養	男	錯誤		懲叛，2-1	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01042	陳森沂	男	確認	抄錄匪酋語錄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088	劉雨雲	男	確認	礦場發表演論	懲叛，7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3年
01234	劉效桓	男	確認	軍營散佈謠言	懲叛，6	有期徒刑，12年	褫奪公權，3年
01245	王泛洋	男	確認	閒暇發表演論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295	曹思義	男	確認	詩文評政	肅匪，8-1-2	交付感化，3年	
01306	王東山	男	確認	反動言論	肅匪，8-1-1	交付感化，不定期	
01338	徐剛	男	確認	撰寫煽惑文字	肅匪，8-1-2	交付感化，不定期	
01411	張瑞風	男	確認	幫助印製書籍文件	懲叛，7 / 肅匪，9	有期徒刑，7年	褫奪公權，3年
01472	雷農	男	確認	出版自由中國	懲叛，7 / 懲叛，9	有期徒刑，10年	褫奪公權，7年
01574	孫以蒼	男	確認	發表荒謬言論	肅匪，8-1-2	交付感化，1年	
01579	趙元林	男	確認	閱讀反動書刊	肅匪，8-1-2	交付感化，0.5年	

四、資料結構化和典藏

此處所謂「結構化」，是指研究人員使用軟體工具將每一個別檔案中相同的資料加以歸整，形成一個資料表單，以便能夠進行對比或運算。本研究使用試算表軟體（如 Microsoft Excel 或 Google Spreadsheet）進行結構化。研究人員先根據研究目的設定欄位（如姓名／生年／卒年／處置類型等），再根據欄位順序，將每一筆當事人資料填入表單。如此一來，經由試算表軟體機制，將所有當事人資料變成具有固定欄位、固定格式與順序的資料集。這種已經結構化的資料，方便檢視、清理、除錯、運算以及連結，因而可以用於未來的「知識再生產」用途。

資料結構化之後，需要有機制可以加以管理和典藏。數位典藏機制包括使用雲端和行動儲存載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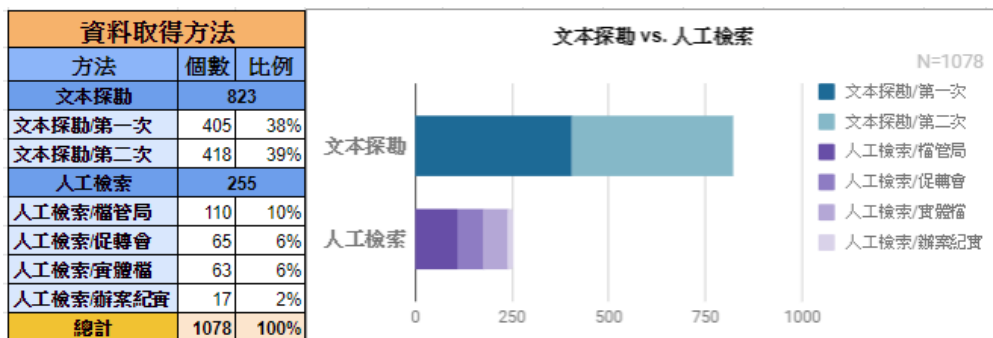
（一）原始資料的倉儲：本研究獲取的大量數位化檔案，均儲藏在雲端硬碟。所有檔案經過命名之後儲存於雲端檔案夾。所有檔案夾命名需依循共

同規則，命名的一致性可確保研究人員能夠即時辨識檔案層級和位置。檔案夾名稱包括個人編號、當事人姓名、資料來源，以及案名，例如，檔名〈06405_宗坤福_檔管局_宗坤福叛亂〉指向 PRID 編號 06405 的當事人宗坤福，自檔管局調閱之檔案名為「宗坤福叛亂」。

原始資料的倉儲區分為兩種類型：(1)「主要檔」是以當事人姓名編號命名、用於檢查查詢的檔案；(2)「分類檔」則是以來源管道類型分類、用於儲存/備份的檔案，類型包括：政治檔案、補償文件、口述訪談、辦案實錄等。此外，(3) 上述檔案經複製為備份，置於另外檔案夾和行動硬碟。

(二) 後設資料：本研究人員將所有當事人資料納入一張目錄表單，建置在網路試算表 Google Spreadsheet 環境。這個環境具有多重機制：(1) 盤點：每一筆資料目錄的檔案完成收錄時，均在試算表上確認，以確保檔案不會重複或缺漏；(2) 防漏：本研究每一筆資料均有多項資料，但原始資料未必完整，為防止資料缺漏，必須有辨識缺漏機制，試算表由欄和列構成資料矩陣，一旦資料有缺漏，使用者很容易辨識；(3) 補白：由於有些資料不完整（例如出生年份），為儘可能讓資料能夠齊全，因此部分資料係經試算表的函數公式進行推估（例如，以事件年份減去出生年份，可推估出生年份）；(4) 偵錯：由於部分資料係人工查核後手動輸入，為防止產生錯誤（防呆），可設定資料範圍以偵測錯誤，例如事件年應該大於 1949 年，小於 1990 年，倘若輸入數字大於或小於上述範圍，則表單自動以紅字標示可能發生問題的欄位；(5) 即時統計／視覺化：試算表上每一欄位資料均經過規格化處理，每輸入一筆資料，函數公式即改變圖表數值。如圖六所示：

圖六：即時統計與視覺化



(三) 即時查詢：研究人員將試算表產出的數據轉換為視覺化的即時報表，這個報表顯示研究人員在查詢當下所擁有的資料數量和類型，並連結 NAS 資料庫中的檔案。研究人員可以經由報表產出的統計結果，獲知當事人整體樣貌。以下說明初步的資料分析結果。

肆、資料分析

誠如前述，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言論獲罪者的群像研究，亦即以檔案史料為對象，透過軟體工具進行結構化，建構一個言論獲罪者的資料庫，透過史料累積和統計，試圖描繪言論獲罪者樣貌的輪廓。研究人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間，經過將近一年努力產出若干初步成果。以下資料分析將分為兩個面向，先陳述言論獲罪者的整體形貌，再陳述本研究所獲得的洞見。

一、言論獲罪者的整體形貌

首先，在目前已獲取的 1078 筆檔案目錄當中，以當事人出生年資料最完整，透過事件年分推估後全部欄位均已填滿。其次是當事人出生地，共獲取有 1076 筆；位居第三的是職業身份，共獲取 1075 筆目錄。其中出生年份、出生地點、事件年份、職業角色等資料大都已經將近完備。但則是教育程度資料登錄比例最低，僅獲取 202 筆，佔整體資料 18.7%。如下表所示：

表二：當事人年籍資料獲取數量

基本資料	已登錄資料	缺漏資料
出生年份	1078	0
出生地	1076	2
事件年份	1073	5
職業角色	1075	3
教育程度	202	876

根據目前所獲取的 1078 筆資料，言論獲罪者當中，出生地點在台灣者 365 人（34%），出生於中國大陸者 711 人（66%）。根據葉虹靈（2021）使用促轉會資料庫所做的分析，發現整體資料庫出生地在台灣者佔 55%，出生於中國大陸者 45%。從這項比對可知，出生於中國大陸者，言論獲罪比例大於整體受裁判者比例。這或許和當時中國大陸來台者的職業有關，後面交叉分析再做討論。

其次，出生年度分析，擬探究言論獲罪者的世代，以及獲罪年度。¹⁶ 關於第一個問題，當事人出生年度的分析，在 1078 筆資料當中，當事人出生年份從 1895 年到 1960 年，其中 1920 年代出生的當事人比例最高，共 477 人（44%）；其次是出生於 1930 年代者共 269 人（25%）；第三為 1940 年代出生者，計 113 人（11%）。如下表所示：

表三：當事人出生年份分佈

年代	人數	百分比
<1900s	8	1%
1900s	27	3%
1910s	106	10%
1920s	477	44%
1930s	269	25%
1940s	113	11%
1950s	73	7%
1960s	1	0%
合計	1074	100%

¹⁶ 研究人員紀錄當事人出生年度，若無出生年度，則以發監執行書類內「發監執行年度」減去「當事人當年年齡」，推算出當事人出生年度。有些當事人被判刑兩次以上，倘若罪名不同時，則以言論獲罪案件發生時的年齡為準。倘若多次都是言論獲罪案件，則以第一次獲罪年度為準。

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特徵，是當事人獲罪年紀。研究人員將每十歲歸為一群組，統計年齡分佈狀態。結果發現，21 至 30 歲這個群組人數最多，總共有 401 人，佔總數 37%；31 至 40 歲群組次之，共 304 人（28%）；41 至 50 歲的群組居第三共 204 人（約 19%）。小於 20 歲的群組共有 84 人（8%），大於 60 歲的當事人有 7 人。若把 21 歲至 40 歲這兩個群組人數相加，則佔 65%。葉虹靈（2021）的年齡分佈統計結果則為 19-29 歲佔 42.53%，30-39 歲佔 29.54%。二者互相對照，大致符合，也就是說，言論獲罪者以年輕人為多。資料如下所示：

表四：當事人年齡

年齡	人數	比例
< 21	84	8%
21~30	401	37%
31~40	304	28%
41~50	204	19%
51~60	73	7%
61~70	5	0%
> 70	2	0%
合計	1073	100%

由於言論獲罪的特別法適用長達四十年，研究人員分析言論獲罪的時間配置。也就是說，到底「言論獲罪」案件時間分佈是否集中少數年份？抑或分散在各年份？研究人員以當事人宣判年為對象，以每十年為一群組加總後進行統計。結果發現，案件發生在 1950 年代為最多，共 295 筆（42%），1960 年代共 225 筆（29%），1970 年代為 237 筆（22%），甚至一直到 1980 年代，還有 59 筆（6%）。根據葉虹靈（2021）使用促轉會資料庫所做的分析，發現 1950 年代案件為最高峰，案件比例佔整體 50.7%，言論獲罪案件雖也是以 1950 年代為最多，但數量落差相對較為緩和。如下表所示：

表五：言論獲罪事件發生的年代

年代	人數	比例
1940s	13	1%
1950s	454	42%
1960s	307	29%
1970s	237	22%
1980s	59	6%
合計	1070	100%

本研究共獲取職業類型資料 1075 筆，其中軍人、警察和祭民身份當事的人數最多，計 354 人（33%），約佔 1/3。其次是公教人員，計 188 人（17%）；接下來則是工人和商人，二者合計 227 人（21%）。往昔人們可能存在刻板印象，認為媒體從業人員以筆耕為業，因此因言論獲罪的風險，應該很高，事實卻不然。在當事人當職業分佈的統計中，從事媒體行業者僅 28 人（3%），數量低於研究人員的預期，不但少於軍警、公教人員、工商人士，甚至更低於學生、受刑人、交通運輸或農林漁牧等行業人士。

表六：言論獲罪者的職業身份

職業身份	人數	比例
軍警祭民	354	33%
公教人員	188	17%
工	127	12%
商	100	9%
學生	62	6%
不詳	50	5%
受刑人	44	4%
農林漁牧	41	4%
交通	32	3%
媒體	28	3%
無業遊民	25	2%
服務業	10	1%
其他	14	1%
合計	1075	100%

除了一般基本資料統計，本研究也做了資料來源的分析，這個分析主要為協助研究者瞭解並調整檔案蒐集策略。言論獲罪檔案總共來自四種管道：檔管局典藏數位檔案、口述歷史訪談紀錄、情治單位辦案實錄，以及補償基金會申請文件。其中來自檔管局的數位檔案數量最多，已獲取 304 件(71%)，其次口述訪談紀錄共 48 筆(11%)，情治辦案實錄有 41 件(10%)，最後是補基會申請文件，共 38 筆(9%)。如下表所示：

表七：資料管道分佈

資料管道	檔案數	比例
政治檔案	439	73%
口述訪談	76	13%
辦案實錄	53	9%
補償文件	37	6%
合計	605	100%

由於政治檔案是官方立場，因此研究人員解讀檔案料時，希望能有不同來源進行交叉比對，這也就是「孤證不立」原則。目前言論獲罪者的四種主要管道當中，政治檔案和辦案實錄主要呈現官方立場，而補償文件和口述訪談則反應當事人意見，但是若要交叉比對，研究人員至少必須有兩種以上的不同資料來源，因此研究團隊也有必要針對資料管道進行盤點。

在 1078 筆目錄中，共有 569 筆(53%)尚未取得檔案，亦即本研究已經取得的檔案佔 47%。其中共有 430 筆目錄有單一來源的檔案(40%)，62 位當事人目錄擁有兩種資料來源(6%)，17 位當事人目錄有三種資料來源(2%)；當事人擁有四種資料管道的數量是 0。其中擁有第二類和第三類資料的筆數共 79 件。從這個數字可知，目前言論獲罪者檔案仍以政治檔案為主，缺乏當事人或其家屬的自我陳述，因此如下表所示：

表八：言論獲罪案件的資料來源

來源數量	案件數	比例
一種	430	40%
兩種	62	6%
三種	17	2%
四種	0	0%
無	569	53%
合計	1048	100%

許多言論獲罪者曾在 1999 年間曾向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文件內容有部分為當事人事後自我陳述，應該可以補強此一空白，但目前尚未完全開放研究使用。

在本研究剛開始之時，研究人員預設因言論而獲罪者，應該都是以〈懲治叛亂條例〉第 7 條「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懲叛 7) 和第六條「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懲叛 6)。但經過統計以後，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根據目前已經蒐集到的 616 個案之中，以懲叛 7(為匪宣傳)論罪者有 397 人(64%)；以懲叛 6(傳佈謠言)論罪者有 24 人(7%)。另一方面，以檢肅匪諜條例第八條一項二款「情節輕微有感化之必要」論罪者有 166 人(27%)，以〈懲治叛亂條例〉第 2 條(包括 2 條 1 和 2 條 3)論罪者有 44 人(7%)，適用其它法條者有 15 人(2%)。這些統計數字說明「言論獲罪」處置的複雜性，當情節嚴重時，案件被認定為「非法顛覆」，當事人遭判死刑等重刑；而當情節輕微時，當事人則交付感化。言論獲罪者適用法條的初步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九：適用法條類型

適用法條	案件數	比例
懲叛 7	397	64%
懲叛 6	24	4%
懲叛 2	44	7%
肅匪 8-1-2	166	27%
其它	15	2%
合計	616	100%

進一步分析，在 446 件被認定為言論獲罪且判刑的案件中，一般案件佔 215 件(48%)。被認定為連續犯的案件，則有 183 件(44%)，也就是說，書寫兩則「反動文字」或先後向人發表兩次「反動言論」，就可能會被認定為「連續犯罪」而加重罪刑。在言論獲罪案件中，連續犯的認定，顯然相當寬鬆，遂使連續案件數量，幾已接近一般案件的數量。另一種常見的類型是競合案件，計 36 件(27%)，所謂競合，是指數種罪名同時成立，例如，同時宣告當事人「知匪不告」和「為匪宣傳」罪責，而可能使得刑罰加重。最後，還有一些其它類型，例如，共同、幫助、教唆等，計有 12 件(7%)。

表十：當事人遭受處置之類型

適用法條	數量	比例
一般	215	48%
連續	183	4%
競合	36	27%
其它（共同/幫助/教唆）	12	7%
合計	446	100%

本研究也登錄當事人遭受處置之類型，在 571 件已登錄的處置中，判處有期徒刑的案件為 280 件（49%）；交付感化案件，計 261 件（46%）；死刑 17 件（3%）；無期徒刑 5 件（1%）；其它 8 件（1%）。這些數字包括認為錯誤和偽陰性的案件。

表十一：當事人遭受處置之類型

適用法條	數量	比例
有期徒刑	280	49%
交付感化	261	46%
死刑	17	3%
無期徒刑	5	1%
其它	8	1%
合計	571	100%

研究人員也針對「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所示用之媒材進行分析。在已登錄的 571 個案件中，文字獲罪者居冠，數量為 307 件（54%）；語言獲罪者次之，204 件（42%）；同時涉及兩種媒材者，17 件（3%）；圖書 4 件（1%），圖像 3 件（1%）。

表十二：當事人言論獲罪使用之媒材

適用法條	數量	比例
文字	307	54%
語言	240	42%
複合媒材	17	3%
圖書	4	1%
圖像	3	1%
合計	571	100%

在檢視言論獲罪的情境時，研究人員發現，許多案件發生空間和獲罪媒材型態似乎有一定關連，因此研究人員進一步分析言論獲罪的處所。因此我們試圖從案情的文字敘述中，萃取出空間相關的詞彙，然後再和媒材作交叉分析。

根據初步統計，總共找出 157 則案件在案情陳述中使用空間相關的詞彙。其中以因文字獲罪者發生頻率最高的在軍營，共 34 件。校園次之，14 件；監所第三，8 件。再針對語言獲罪分析，發生頻率最高的空間是校園（40 件），軍營次之（11 件），監所第三（10 件）。軍營、學校和監所都是高度集體生活的情境；高度集體生活也正是有利於實施高度監控的環境，從而也容易因為言論獲罪。

表十三：言論獲罪的空間情境

媒材類型	校園	軍營	監所	工作處	街頭	住宅
文字	14	34	8	2	7	0
語言	40	11	10	13	2	9
圖書	0	1	0	0	0	0
圖像	1	0	1	0	0	0
多重媒材	1	1	2	0	0	0
總計	56	47	21	15	9	9

然而，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便在高度監控下，人們還是會透過言論表達不滿。在以人工檢視文字獲罪案件時，我們發現許多文字獲罪案例和「廁所」有關（例如，在廁所裡書寫「反動標語」）。因此研究人員統計文字獲罪案例中廁所書寫數量，其中軍營最多（18 件），校園次之（6 件），其它廁所則位於戲院、廠區和眷村。

表十四：廁所裡的言論獲罪案件

案發地點	數量	比例
軍營	18	62%
校園	6	21%
戲院	2	7%
廠區	2	7%
眷村	1	3%
合計	29	100%

由於檔案徵集步調緩慢，本研究目前尚未完成所有資料的徵集，因此上述各項統計均屬「不完整統計」。儘管如此，上述統計展現一個可能性，就是研究者透過數位工具，建置模組化的統計機制，因此研究人員可以隨著資料徵集進程，看到當下資料分佈態樣。

二、目前研究的啟示

雖然本研究是一個初探研究，但從為期一年的工作過程中，體會檔案史料蒐集不易一些心得。以下從三個面向進行敘述。

（一）「言論獲罪」檔案／案件界定的不確定性：本研究資料處理流程的重點之一，是檔案的結構化，這項涉及分類和編碼。但在文本探勘階段，即已發現機器學習結果不如預期，經過人工調整後產出資料稍佳。¹⁷ 其後研

¹⁷ 事後推測，造成機器學習效果不佳，可能有兩個原因：（1）用於探勘的文本，品質良窳不齊：本研究擷取台灣浩劫資料庫「案情略要」欄位。這個欄位當初是由志

究人員閱讀多筆資料以後，發現文字探勘效能未如理想，可能和源自判決本身標準不一致。也就是說，同樣屬「發表演論」判決結果卻未必相同。茲舉一例，1955年台北工專學生宋錫璋為台鋅公司工務員，被指控先前任職高雄廠時曾與同事和合唱農民分田歌，又向該廠工人職員等宣稱「將共產主義像宗教家傳播福音一樣傳播出去」，以及在宿舍中歌唱中共國歌。軍事法庭最初以他「發表不滿現實言論、但情節輕微」，裁定交付感化，但核覆時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認為應再飭詳加偵查，以昭慎重。法庭援引「連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改判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10年。再次核覆時，蔣介石總統認應從重量刑，二度退回原判決之後，法庭改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判處死刑定讞。經過數次核覆之後，刑度從「交付感化」演變為「連續為叛徒有利之宣傳」，再演變為「非法顛覆」。這種判決標準的不穩定（也就是冤、假、錯案）使得無論是探勘或分類增加困難。

進一步看，言論獲罪案件存在「偽陰性」和「偽陽性」的錯誤。「偽陰性」和「偽陽性」本是生化檢測語彙，原用於檢測錯誤的不同態樣。此處則用來指涉政治案件是否為言論獲罪案件、推斷未合致的兩種類型。

所謂「偽陰性」錯誤，是指法律事實符合言論獲罪構成要件者，但判決結果卻以其他罪名相繩。偽陰性錯誤可能是重判，例如以上述案例中宋錫璋原為言論獲罪，卻遭以「非法顛覆」罪名判處死刑。偽陰性錯誤也可能是輕判，例如宜蘭礁溪國校教員張佛樹，因在當地青年節慶祝大會發表「國父推翻滿清」演講，事後被指控演講內容有問題，因此被捕。但最後以他辦公室發表「反共義士攜械投誠，係怕死，沒有國家民族觀念」等言論交付感化。辦案人員改變法條和處置刑度，恐和言論內容涉及國父個人事物難以公開討論，故改以輕罪相繩。

工輸入資料，但由於輸入資料字數出入甚大，摘要品質也有落差，因此影響機器判讀結果。（2）加權：事後研究人員在處理機器學習過程中，雖以獲取數和精確度（recall/precision）所建構的F1係數為準，在過程中採用了若干詞彙當做加權，雖然探勘結果增加獲取件數，但加權後的增加的件數，人工判定錯誤比例也較大。

「偽陽性」錯誤，則是指辦案人員無法問罪，但卻又不願承認錯誤無罪釋放，因此硬加上罪名。例如陳李碧霞之父李喬松，因涉及左翼事件遭政府緝捕。辦案人員始終無法加諸罪名，於是找來另案被告李漢堂指證李碧霞長住友人家時經常宣講中共軍隊和大陸進展情形，將李碧霞以「連續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 7 年，褫奪公權 5 年。¹⁸ 通常「偽陰性」錯誤較容易直接由判決書中察覺，但「偽陽性」錯誤則必須有當事人或家屬陳述，若無當事人方資料進行交叉比對，則無法察覺。

「偽陰性」和「偽陽性」錯誤，凸顯戒嚴時期政治案件普遍「因人而治」的問題，也造成資料蒐集判斷上的霧區。

(二) 檔案史料的完整程度。史料完整性是所有研究者都企求而又難以達到的狀態，政治檔案尤其是如此。檔案史料的完整程度可以從兩個面向觀察，一是言論獲罪者之間資料完整程度的比較，另一則是任一言論獲罪者資料類型完整與否的比較。

就言論獲罪者之間資料完整程度而言，不同的言論獲罪者，其檔案完整程度有落差。檔案史料本蒐集不容易完整。一方面，是指當整體檔案的完整性，也就是「所有當事人皆可找到檔案」。本研究標定的 1078 名當事人中，目前有 509 人（47%）已經取得一種以上的資料，但仍有 569 人（53%）僅有目錄而尚未取得檔案資料。為尚未取得所有檔案資料的原因，不僅因為本研究針對上千筆目錄、檔案數量龐大，也因為有些檔案目前未見於各種目錄，因此根本無法調閱。其次，政治檔案結構複雜，導致調閱檔案時程曠日廢時，再加上研究工作需要具備相當先前知識，因此即便本研究已經藉助數位科技協力，仍然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

另一方面，任一言論獲罪者資料類型完整，則是指當事人資料的「內部完整性」。亦即「每一位當事人所有階段的檔案皆可找到」。如前所述，每一個當事人的資料，依照時序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 逮捕、留置和偵訊；(2) 起訴、初審、上訴、覆判；(3) 發監執行、移監；以及(4) 刑滿開釋。

¹⁸ 陳李碧霞案，參見：(43) 審 3 字第 26 號判決書，國防部軍務局，李君處有期徒刑七年褫奪公權五年，〈廖史豪等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號：B3750187701/0039/1571/00225000/125/061）。

每一個階段都產生檔案，但由於當時檔案分由不同機構典藏保管，因此當檔案被徵集至檔案管理局，係根據檔案產生機構命名和分類，而使同一人檔案分散於不同卷宗。由於先前保存機構典藏狀況不同，因此常有缺漏。本研究所獲資料中，鮮少有言論獲罪者所有檔案全部到位，完整性因此打折扣。

肆、結論

本研究是一個初探性質的研究，研究人員經由數為人文取徑人文取徑擷取政治檔案，試圖再現戒嚴時期言論獲罪者的整體樣貌。

在法治國家，發表言論是一種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但戰後在臺灣執政的國民政府當局，為把防堵共產主義滋長，採取嚴密懲罰和規訓策略。不僅將異議者均視為叛徒，更將思想言論直接指為叛亂，致使四十年間造成許多冤、假、錯案。以「言論獲罪」為對象的研究，指向台灣戒嚴時期以特別法管制下的言論案件，這些案件所衍生的政治檔案，正是學者探索當代台灣傳播和人權歷史的重要素材。

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政治檔案的史料蒐集和結構化方法。這個由研究者和資訊技術共同協力的模式，在處理資料時分為三個階段：（一）建構言論獲罪者清單；（二）檔案資料徵集和整理；（三）資料結構化和統計。

在建構言論獲罪者清單階段，研究人員先以少量資料進行人工編碼。再以編碼結果，進行文本探勘。經由二回合的監督式學習取得初步清單，接著再根據此一清單進行滾雪球式的目錄比對、逐次累積目錄數量。第二個階段是檔案徵集和整理，研究人員根據目錄向檔管局申請調閱檔案，並萃取檔案後設資料。在最後一個階段，經過查核和排序的檔案，依序儲存至雲端資料庫，納入雲端試算表，即時產出統計結果。

本研究有以下兩項成果。首先，本研究整合新聞、歷史和資訊科學技術，發展出一套檔案史料蒐集模式。這套模式結合研究者和資料庫，可處理大量數位化檔案史料，讓研究者者能隨時監控檔案史料蒐集進度，並能夠隨時取用這些資料。

其次，本模式提供「所見即所鍵」(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input)。由於言論獲罪檔案史料數量龐大，研究者在研究過程「見樹不見林」是一大缺憾，若要等待所有檔案資料蒐集到位才進行統計分析，則又曠日廢時。因此本研究初始階段便根據人物史料特性建立後設資料欄位，並在把檔案史料匯入資料庫時，同步將資料後設資料收錄至試算表。然後再根據研究提問在試算表軟體內建立統計機制。如此一來，當研究人員鍵入資料，也同時得知統計結果。因此研究人員可隨著統計展現的態樣，調整分析方向或焦點。

參考書目

- 王天濱 (2005)。《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權》。台北：亞太圖書。
- 王漢威 (2011)。〈戰後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1946-1950〉，彰化：彰化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如蓉、翁大鈞 (2006)。〈探論戒嚴時期國家權力濫用行為〉，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頁 241-67，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
- 汪明輝 (2006)。〈政治案檔案解密對重建戰後台灣歷史真相的意義：以湯守仁案為例〉，國史館政治檔案解密座談會，台北：國史館。
-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74)《要案紀實》第 1-8 輯，台北：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 呂東熹 (2010)。《政媒角力下的台灣報業》。台北：玉山社。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2021)。〈解碼壓迫體制：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會〉，台北：台灣大學科會科學院 (2021 年 2 月 26 日)
- 邱榮裕 (2006)。〈戰後台灣客家典型白色恐怖政治事件之研究：以 1950 年代客家中壢事件為個案分析〉，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 (編)《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22-331。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 林子儀 (1999)。《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元照出版。
- 林正慧 (2009)：〈1950 年代左翼政治案件探討——以省工委會及臺盟相關案件為中心〉，《台灣文獻》，第 60 卷第 1 期，頁 395-477。
- 梁正杰 (2007)。《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政治案件之研究，1946-1961》。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君愷、蘇瑞鏘 (2006)：〈威權統治時期校園政治案件中的人權侵害初探〉，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 (編)《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

- 集》，頁 303-321，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 陳建傑（2011）〈戰後台灣客家政治案件之研究：胡海基案之個案分析〉，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進金、陳翠蓮、蘇慶軒、吳俊瑩、林正慧（2021）：《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台北：春山出版公司。
- 陳翠蓮（2021）：〈第一章 政治檔案的開放之路〉，收錄於陳進金、陳翠蓮、蘇慶軒、吳俊瑩、林正慧，《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頁 15-26，台北：春山出版公司。
- 蔡墩銘（2004）：〈戒嚴時期之惡法與審判：以不當叛亂匪諜審判案為主〉，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 曾培強（2009）：〈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件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稷安（2016）：〈導論：數位人文—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數位人文：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數位人文研究叢書 6。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1-20。
- 楊翠（2006）：〈女性與白色恐怖政治事件〉，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編）《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11-452。台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 裘佩恩（1997）：《戰後台灣政治犯之處置》。台北：台灣大學法律系碩士論文。
- 葉虹靈（2021）：〈轉型正義資料庫中呈現的政治案件態樣〉，發表於「解碼壓迫體制：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會，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頁 6-15，台北：台灣大學科會科學院（2021 年 2 月 26 日）。
- 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2015）：《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台北：稻鄉。
- 劉北成、楊遠纓譯（1992）：《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圖書公司。（原書 Foucault, Michel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劉昭麟（2018）：從數位人文研究展望資料開放、工具協同與議題網絡，《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1，11-50。
- 劉熙明（1999）：〈蔣中正與蔣經國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中的角色〉，《台灣史研究》，6(2): 139-187。
- 藍博洲（1993）：《白色恐怖》。台北：揚智文化。
- 藍博洲（2003）：《紅色客家人》。台北：晨星。
- 蘇瑞鏘（2010）：〈台灣政治案件之處置：1949-1992〉。台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蘇瑞鏘 (2011)。〈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審判過程中的不法與不當〉，《台灣風物》，61(3): 33-73。

蘇慶軒、王奕婷、劉昊 (2021)。〈司法鎮壓：台灣威權時期審判過程〉，發表於「解碼壓迫體制：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研究成果發表會，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頁 20-36。台北：台灣大學科會科學院 (2021 年 2 月 26 日)。

Mathisen, R.W. (2007). Where are all the PDBs? The Creation of Prosopographical databases for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In Keats-Roahn, K. (ed.). *Prosopography approaches and applications: A handbook*. Oxford: Unit for Prosopographical Research, Linacre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pp.95-126.

Stone, L. (1971). Prosopography,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100, 1, 46-79.

**Exploring the Cases of “Speech Crim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in Taiwan, 1949-1992:
A study of government archives**

Pai-lin Chen

ABSTRACT

This preliminary research aiming to the case of “speech crime”. During the authoritarian rule from 1949 to 1992, many were accused of "advocating Communists' thought " or "spreading rumors" and convicted by military courts.

Government archives are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academics to explore this issue. Although Taiwan has been lifting its martial law for many years, the opening pace of government archives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 Therefore, prior research of this domain is limited.

This particula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llection methods of historical data. Researchers employ multipl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first construct a preliminary list with text exploration, then collect historical data files, then use software tools to process the data to structure it, and finally perform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present the outline of the collective appearance of the victims of “speech crime”.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government archives, journalism history of Taiwan, prosopography, speech crime

Pai-lin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pailinch@nccu.edu.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 年）*

張依萍**

本文引用格式

張依萍（2021）。〈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 年）〉，《傳播、文化與政治》，14:39-86。

投稿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本文為《公民募資在台灣，2012-2019 年：從文本分析看動員策略》政治大學碩士畢業論文改寫，銘謝指導老師馮建三教授、評委魏均教授及王亞維教授。

**作者張依萍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e-mail: 110463502@nccu.edu.tw

《摘要》

本文將公民募資視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型式，募資平台則為象徵性消費的場域，社會議題在募資平台被「商品化」，倡議行動包裝為專案形式進行募資，捐獻者於募資平台上以金錢資助，募資發起方成為代理行動者以執行倡議。為理解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特色，本篇取徑「政治消費觀點」，關注消費背後的意識形態，並借鏡新傳播科技發展下「連結式行動」的動員特色，以此聚焦討論專案發起方的角色與行動策略，以歷時性研究 2012 年至 2019 年台灣線上公民募資的發展與政治參與特色。研究發現：「黨政趨向」類的專案表現在募資人次及金額最突出，此類訴求文宣，多與兩岸政治、罷免投票、環保有關，然而公民募資做為政治參與或有進步內涵的「政治消費」，其論述情境卻多與藍綠之爭、地緣政治有關。而募資發起方的行動召喚策略直指「台灣認同」，且刻意淡化組織角色，突顯個別公民的倡議身份，並以「否定」語境如反國民黨、反大陸政權為號召。公民募資看似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但研究表明，推進募資動能策略，主要發揮在身份認同的議題，募資發起時程更與台灣政黨選舉活動有關，政治消費行為背後脫離不了政黨化意識形態滲透。

關鍵詞：公民募資、政治消費、政治參與、連結式行動、群眾募資

壹、前言

台灣的募資平台起於 2011 年，至 2014 年台灣太陽花運動表現活躍，當年：「從白色力量、反核遊行，到太陽花學運、反兩岸服貿的紐約時報廣告，人民透過行動來證明對這片土地的關心、用小額贊助來表達對這片土地的認同。」（台灣群眾募資報告，2015）。公民募資最重要的精神是，民眾透過網際網路發起創新專案，跨越地理障礙連結用戶，基於領土的歸屬感集結，使公民有可能在網上和線下交流想法和意見（Oliva, 2018）。而 2019 年公民募資主題亦涉及聲援香港反送中、反中國威權滲透台灣、罷免市長、居住正義等專案主題也透過募資平台集結表態，顯示公民募資（civic crowdfunding）似乎已成為表達意志的一種社會行動。

綜觀台灣的公民募資史，從 2012 年 flyingV、嘖嘖募資平台正式開站，到 2014 年太陽花運動掀起公民募資遍地開花的高潮，至 2019 年共 8 年歷程，尚未有太多學者深入探究台灣線上群眾募資的政治動員實踐。對應台灣公民募資行動的實踐經驗，募資專案曾被質疑「隱而不諱」的夾藏政治意識形態在募資專案中：回顧沃草罷韓專案為釋例，發生於 2019 年，wecare 高雄、台灣基進、公民割草行動團隊共同發起「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¹專案，此專案被外界質疑該募資專案可能有政治勢力隱身其後（郭瓊俐，2020 年 4 月 21 日）。亦有報導指出，專案發起方可能涉及優勢政權或黨外政治勢力滲透，如黑色島國青年、島國前進、民主鬥陣、基進側翼、福爾摩沙、公民 1985、公民覺醒、沃草、全民割爛尾等團體，被指認為是政治第三勢力或是民進黨側翼（〈大紀元〉，2014 年 4 月 15 日；陶本和，2015 年 12 月 23 日）。

透過上述募資事件背景的討論，本研究欲探究看似集結群眾意志且透明的公民募資情境中其能動性為何，故以公民募資發起方的行動策略作為討論，以此聚焦，觀察募資專案中發起文本語境所浮現的角色與意識形態。本

¹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募資專案網址：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recall2019wecare>

文將公民募資視為政治參與的一種型式，募資平台則為象徵性消費的場域，社會議題在募資平台被「商品化」，倡議行動被包裝成專案形式進行募資，捐獻者在募資平台上以金錢資助，募資發起方成為代理行動者以執行倡議行動。在這個框架下，公民募資專案就是一種商品，以供贊助者「反身性消費」，透過金錢資助實現自我價值。據此，本研究納入「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通常兼指「公平交易」與「具有道德意識的購買」)進行討論，將公民募資視為一種帶有政治與倫理意圖的消費，其中「消費性支持 (buycotts)」視野，說明贊助者化身為公民消費者，藉由金錢捐獻支持募資發起方的行動意志。在此亦不可忽略在新傳播科技的媒介使用情境下，線上募資擴大了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公民募資行動具有「個人色彩」的政治消費，也是自我的參與形式表現，更是身份、生活方式與個性化政治的反映 (Baek, 2010)，藉由傳播科技手段，社會倡議不需要透過組織性資源，召喚集體身份／認同的個人加入，個人化行動成為當代政治動員的主要特色 (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故在公民發起方的行動策略討論，試圖以歷時性研究，理解 2012 年至 2019 年台灣線上公民募資的發展與政治參與特色，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 (一) 公民募資發起方在募資平台上的動員策略。
- (二) 隨著台灣政治變遷，公民募資發起專案背後的意識形態取向。

貳、文獻探討

一、公民募資的操作型定義

公民募資 (civic crowdfunding) 英文一詞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 2012 年，首先由公民募資平台 Spacehive 與 Neighbor.ly 等平台使用 (Davies, 2014)，Wenzlaff (2020) 定義公民募資，他認為公民募資具有社區參與性的專案項目、支持者可透過線下動員達到共同的群體利益、公民募資可藉由公民或民間組織發起，自發地審議公共政策。承上述討論，參與公民募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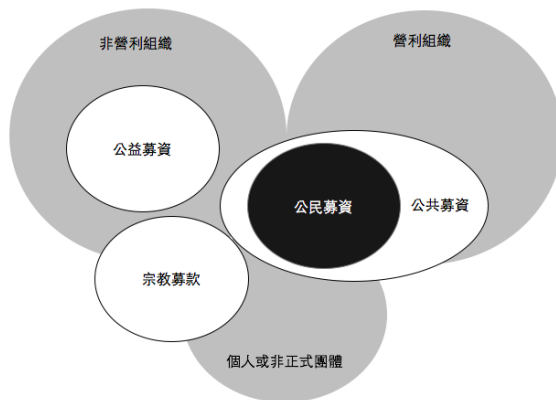
人，往往有利他、親社會的傾向 (Berger, 2019; Hsieh, HC, Hsieh, YC, & Vu, 2019)。相較於為了私人經濟收益而有的群眾募資，響應公民募資的參與者更容易發展出社群連帶關係，原因在於參與者對於公眾利益的想像（也可稱為消費者公民的想像），其次則是網路年代對他們的線下與線上連結的進行，提供了便利之門。公民募資社群的連結關係所聚集的人群流動於線下（地理性社區）、線上（社群平台、募資網站等）。而公民募資專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更取決於當地利益關係者的線下協同 (Charbit & Desmoulin, 2017)。而線下社群（泛指生活在相同地理區域的人）時而面對面交流，時而通過線上連結，在拓展集體實踐中，基於共同想法與信念聚集，形成共同想像中的社區 (Brint, 2001)。

當然公民募資類型可能涉及獨立架站募資、政府／非營利組織發起類、社區公共類、政治倡議類²或是綜合類平台募資，相較於其他背後有明確募資發起組織或已關站，本文將焦點聚焦於台灣兩大綜合類中介機構平台「嘖嘖 (Zec Zec)」與「flyingV」³進行討論，此兩大平台除了匯集台灣最多公民募資專案，平台亦有第三方中立性，具研究的指標意義。台灣目前對於募資的分類仍然有許多模糊及重疊之處，為了進一步了解公民募資的類型，不限於各式平台網站的討論，筆者以群眾募資專案發起方及專案性質進行整理（如圖一）。

² 政府／非營利組織發起類，指政府項目募資平台，由政府發起募資專案，邀請地區居民進行市政債券購買，以促進當地社區建設。如台北眾力方程式；社區公共類，指資助社會項目或改善社區建設。如信義房屋勾勾 gogo 募平台 (2017 已關站)；政治倡議類，發起支持選舉候選人募款、提出公共倡議，促進法案推動。如 VDemocracy (2014 已關站)。

³ 嘖嘖 (Zec Zec) 募資平台，於以下內文，簡稱為嘖嘖。嘖嘖成立於 2012 年 2 月，初期主打新創文化，近年來也開始著重公眾議題的經營；flyingV 在 2012 年 4 月創辦，關心公共議題為主。嘖嘖與 flyingV 平台上募資主題涵蓋設計、公共、在地、遊戲、影視、休閒等。

圖一：群眾募資的類型



專案發起方可分為個人、非營利組織、商業組織三大類，專案性質可分為公益募資⁴、宗教募款、公共募資；然而公益募資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需為非營利單位發起，是為了幫助社會弱勢群體，解決社會問題，贊助人不一定會得到實質的物質或資金回報，基本上屬於捐贈行為（王擎天，2016）；宗教募資則為宗教使用或以宗教回饋社會資金用途，上述兩者皆非本篇研究之具有政治參與行為的討論範疇。在此特別解釋以台灣兩大募資平台的來說，「公共募資」類別包含於 flyingV「公共」及嘖嘖募資平台的「空間」、「社會」、「地方創生」子募資類別，本篇研究關心的公民募資則是從兩大平台公共募資中篩選出，「專注於群體利益」的專案，本文所指的公民募資，是為了成全社群的公共利益，推進總體利益之目標，具有「公眾性」的使命（Charbit & Desmoulin, 2017）。因此在兩大平台的公共募資中，有些專案項目非以達成社群總體為行動目標，而是以成就個人或企業行銷宣傳為目的，如嘖嘖募資專案「張元植+呂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⁵」，故分類上雖屬於公共募資，卻應排除在公民募資討論範疇。而公民募

⁴ 根據台灣公益勸募條例：只有公立學校、行政法人、公益性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能發起勸募，且勸募的目標是為「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

⁵ 「張元植+呂忠翰 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是以完成兩位登山客夢想的募資計畫，為個人目標導向。資料來源：嘖嘖募資平台

資屬於回饋型募資，贊助者會預先購買服務或產品，或收到象徵性的禮物做為對於專案的認同，這類關乎社會倡議的募資型態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方向。

二、國外公民募資研究與討論

Davies (2014) 提及在美國有關募資的研究，一般是以商業募資為研究對象，在這些為數不多的文獻中，有人研究社區公民與政府協商合作，通過公民募資，生產本地的公共財 (Charbit & Desmoulin, 2017)，在此的社區型公民募資旨在由公民共同集資，生產公共財。公共財就是公共物品，擁有不可分割性，Oliva (2018) 認為社區型公民募資是用以在改善地區領土或支持社會、文化活動的公共工程，由公眾持有。關於公民募資爭議性，已有部分學者觀察到地方強勢組織介入政府資源分配、數位落差等現象：Davies (2014) 提及若專案涉及公共建設、社會福利有關，致使公民募資可能是填補政府資金短缺的方式，強勢組織或行動者甚至可能搶奪政府資源，造成地方發展不公，有時還變成私人資源干擾了政治議程；Oliva (2018) 也注意到線上的弱連結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線上募資可能出現排擠性，存在數位鴻溝的現實，參與者需要經歷數位化（電腦、手機、線上刷卡等技能）及擁有語言知識。回顧現有研究看公民募資三點特色：公民募資反轉鍵盤酸民的角色、集結行動資本、線下與線上的結合：

(一) 公民募資反轉鍵盤酸民的角色

群眾募資概念起源於眾包 (Dresner, 2014)，眾包能夠「聚集」而不是「平均」公眾意見，參與者未必有集體的意識，反而更常見個人主義的心態，這在網路上似乎無處不在 (Brabham, 2009)，致使有數位激進主義不過是「點擊主義」或「懶人主義」之說，呈現萬人響應，一人到場的現象 (Gladwell, 2010)。不過，公民募資不僅是「口惠」的響應，是「實質」上掏出錢包，

也就是「捐款」，此種響應行為，超越訊息接受、知曉、同意、分享的範疇，更接近 Zuckerman (2014) 的「參與式公民」概念：「以數位媒體為核心組成的公民參與形式」，響應網路募資的人經常將募資訊息與其他社群媒體串連，Oliva (2018) 稱之為「共享的政府」，意指社區中的公民成為自身福祉的參與者和促進者，也就是透過公民募資，捐獻的行為本身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力，促動了公共決策。

(二) 集結行動資本

透過積極的捐獻行為展現自我，同時「與人連帶協作」並傳遞資訊，動員更多關注相同議題的群眾加入，這可能是啟動潛在社會資本的機會，讓社群參與集體問題的解決過程，募資若能成功，就是政治資本的創造，可以干預政治經濟結構 (Davies, 2014)。Díaz & Cacheda (2016) 表明募資已經是一種確實可行的融資替代來源，幫助倡議運動來解決當前影響社會運動的困境和瓶頸，募資也是倡議運動手中的一種政治工具，信息透過傳播渠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有效傳播思想、概念和信息，成為激活社會資本的渠道。當倡議運動獲得公共、政府或是私人捐贈的經濟資源後，也鞏固了在政治舞台上發生的機會。

(三) 線下與線上的結合

Facebook 和 Twitter 社群平台的線下社區，透過進行公民募資而進入線上參與，已有研究 (Stiver et. al., 2015)。支持自己社區的項目，募資本身就可提供「情感和道德的回報」 (Hollow, 2013)，透過公關活動推動線上募資，進行集體行動和社區行動主義的整合 (Doan & Toledan, 2018)。另外，公民募資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的「場域性」 (place-based)，也就是說，一般的募資依賴於網路技術和線上社區，而公民募資需要串連「線下」社區，並對當地產生具體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募資平台也為募資項目中有共同利益的人起到了中介和催化劑的作用。以上學者研究都證實了公民募資與場域、社群的概念有關，透過募資網站做為接合點，進行線下線上的串連 (Charbit & Desmoulins, 2017)。

三、台灣公民募資現有研究與實踐

當然公民募資動員是具有在地特色的實踐，回到台灣特殊的政治局勢，兩極化的政黨政治、美國對台政策、執政黨對中政策、台灣國際地位認同等，都關乎台灣公民募資的發展。在台灣的公民募資研究不多，若以「募資」與「眾籌」為關鍵字，檢視《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庫》、《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與《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三個資料庫，發現從 2012 至 2020 年（至 3 月 31 日），共有 52 筆學位或期刊論文，僅有一篇聚焦「公民募資」（林信熙，2019）⁶整理國外公民募資研究主題，其餘研究如後：15 篇研究「募資的成功模式」，其他是「募資法規」10 篇、「募資平台閱聽人研究」6 篇、「非營利組織或公益募資」5 篇、「社會企業募資」4 篇、「傳播媒體」3 篇、「商業模式」2 篇、「文創產業募資」2 篇、「新聞群眾募資」1 篇、「音樂募資」1 篇、「募資風險」1 篇、「資源動員」1 篇。

四、取徑政治消費的特性看公民募資實踐

如前言所述，募資行動在募資平台上「商品化」，作為捐獻者支持的政治參與形式，此種消費行為滿足了消費者公民利他的道德行為，在過往台灣民主參與實踐中，莊佳穎（2014）以政治消費主義討論 1998-2013 年間的政文化現象，藉由台灣國族建構與民主化觀點，研究特定政治人物、社會運動發起者、社運支持者、政治迷的互動文化形成，在此討論中，將商品消費建立在國族認同的論述。然而此消費場域多涉及選舉情境中政治人物競選商品的消費，這是有形商品的消費，消費可能幾乎等於認同政黨傾向。反觀公民募資平台上，發起者角色不需要主動揭露黨派，發起者與贊助者之間並沒有清晰的政黨認同共識，贊助者卻可為了實踐公共利益，以贊助的方式展現對活動或專案的消費支持。因此，為了理解台灣公民募資能動性，接續將討

⁶林信熙（2019）。地方公共財的機會與挑戰：以公民眾籌為例。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論觸角延伸至公民募資的行動者（募資發起方、募資贊助者），討論其交相運作的行動特色。

首先藉由「政治消費」視角審視公民募資發起方提供的商品，非一般理解的物質商品。募資贊助者的政治消費實踐對象不僅是商品化的社會倡議，更是背後的政治意義，贊助者支持的是專案中文本表達出的行動理念，可視為服務性商品。根據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一書，「政治消費」是指「透過消費者行為進行倡議，企圖糾正及改善在道德、環境或政治上令人反感的慣習」（Diani, 2019）。其中的「消費性支持」（buycotts），表述了募資贊助者身為消費公民，支持專案理念的行動。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在每次進行消費決策時，都如同為生活投票，而這些行為都將匯集成一股民意，潛移默化影響企業或政府：以公民募資來說，消費者以消費支持的方式贊助提案人的理念，並挹入金錢以實踐行動，這種帶有公民意識的行為，可看做是一種廣泛的政治性參與，此概念也與 De Zúñiga 等人提出的「公民參與」概念不謀而合，他們認為消費行為本身不一定是為了影響國家，但與公民參與一樣，這些行為也會產生政治後果，如同 Charbit & Desmoulin (2017) 恰如其分地強調「當公民募資行為進入了日常生活，更可以理解為一種新型的公共生活參與。」而政治消費主義做為非常規且廣泛的政治參與形式，擴大了政治參與的範圍，甚至滲透進生活政治（Baek, 2010；Dalton, 2008；Van Deth, 2012）。因此，進一步將政治消費主義概念化，可將政治消費看作是當代政治參與，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政治的展現（Copeland, 2014）。

Copeland (2014) 樂觀提及政治消費者在意識形態上很老練，因此他們不必依靠黨派暗示來做出明智的決定或參與政治。然而當我們將公民募資平台視為生活政治的參與時，必須更嚴謹審視政治消費的互動歷程，進一步理解贊助者在公民募資中消費了什麼，也就是募資專案中的文本提供了何種意義的再現，召喚贊助者：贊助者從四面八方前來，看似有意識的通過決定支持哪些專案，以捐獻行為展現其行動意志，但事實上，意識形態滲透生活中的政治情境，募資發起方提供的說服策略成為捐贈動能的最後關鍵，因此，有必要深入討論募資平台募資專案的說服策略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如何牽動公民消費者「有意識的道德決策」。

據此，「有意識的道德決策」，早已成為企業品牌的行銷策略之一，有學者亦提醒，資本主義也如同幫助資本企業樹立社會正義感，合理化了消費行為 (Micheletti, Stolle, & Berlin, 2014)。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感知的身處地位和自我形象，出自於商品的消費，花錢是通往美好生活的想像，消費主義會根據社會價值以及政治經濟系統，以不同方式進行操控 (Sturken & Cartwright, 2001)，消費者因此掉入消費與道德的雙重陷阱中。盧嵐蘭 (2005) 提醒，「消費主義」的語境有多重涵義，其中特別提及消費主義也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進入了政黨政治的領域，左派社會主義國家與右派資本主義國家各有表述。

五、募資發起方的動員特色

從上述討論，在公民募資的消費行為，表面上看似驅動了公民消費者的能動性，可能也牽涉了政黨政治的運籌帷幄，突顯了募資發起方以何種角色傳播訊息的重要性。從 Bennett、Segeberg 與 Walker (2014) 動員行動邏輯討論，主要分為「集體式行動」、「連結式行動 (connective action)」其簡單區別如下：「集體式行動」以組織為資源動員中心，組織成員擁有與組織相同的集體身分／認同或政治訴求；「連結式行動」則充滿個人化行動特色，身分／認同在網路空間呈現流動性的特色，行動者可透過社群平台及個人網絡傳播信息，不需要中央組織資源，去中心化的特徵使得動員成本也較低，訊息傳播速度更快。除此之外，Bennett & Segeberg 與 Walker 觀察到新傳播科技成為組織的動員代理手段，此種連結式行動的優勢，包括動員的速度、中間群體在問題焦點和行動策略之間轉移的靈活性，以及通過數位媒體和大眾媒體接觸大眾的能力。

然而傳統的集體式行動有兩個困境：一是動員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號召人力及資源；其二是組織身分的認同問題，在成為組織的一份子時，必須與組織擁有相同的身份／認同或政治訴求，個人需要克服障礙或損失，實際參與行動。當個人加入了以組織形式為號召的行動時，就涉及了對於組織的認同，而公民募資專案擁有明確的行動目標，有時以組織形式做為號召，對

於贊助者的信心與專案成功有所助益。然而，若公民募資涉及政治傾向認同，鮮明政治色彩的「組織」要求加入者必須有強烈的認同，因此另一種以「去組織化」轉以議題導向做為身份認同的號召，成為近期推展社會倡議的行動策略。陶振超（2017）引述近期國內外非傳統政治議題的社會運動，如政治、經濟、社會、災難性方面新社會運動，如阿拉伯之春、西班牙憤怒者運動、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等，強調此類運動充滿了「個人化集體行動」之特色。這類社會倡議的行動邏輯彰顯了「連結式行動」特色，其特色是以主導「議題」做為號召，關乎參與者生活的場域及遭遇的切身問題。

Bennett、Segeberger 與 Walker（2014），針對連結式行動特色進一步討論，發現政治倡議行動的特色包含：（1）納入更多年輕族群；年輕人以更加個性化（而不是集體主義）的方式看待政治並與之互動，並參與了基於解決問題的臨時運動（而不是長期的組織承諾）（Vromen, Xenos, & Loader, 2015；Bang & Halupka, 2019）；（2）倡議者的行動平台：Parsloe 與 Holton（2018）認為網路行動主義可以為倡議者提供平台，通過獨特的方式建立橋接（bridge）和紐帶（bonding），將人們聚集在一起，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並為那些可能沒有能力參與動態互動的個人行動者發聲；（3）滲透至政治生活領域：Bang Halupka（2019）相信將政治生活中的問題概念化，透過群眾的連結式行動，有助於讓體制內的政治權威釋放更多權力、知識和信任給體制外多樣的社團。

上述討論可以看到在新傳播科技使用情境之下，社會倡議動員的行動邏輯逐漸從「集體式行動」轉化成「連結式行動」，透過「去組織化」策略，改以「議題」做為號召。在此需注意的是，前述提及兩種行動邏輯並非取代關係，而是根據不同社會倡議行動，倡議發起者或行動者各自形成行動策略。正是因為公民募資的組織中動員人力資源、意識形態的主張、甚至如何取得第三方團體成為盟友、盟友的政治立場與實力等協調策略，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切面，更有必要關注專案發起方行動邏輯。

從以上政治消費與動員行動邏輯的取徑，看公民募資行動者特色，發現公民消費者浸潤於生活政治中，本身的政治消費行為難以脫離意識形態的認同，除了傳統的集體式動員，「去組織化」的連結式行動邏輯似乎有助於理

解隱藏特定政黨的角色。承上討論，為了理解台灣公民募資實踐，藉由文獻對話，回應研究問題有二：「公民募資發起方在募資平台上的動員策略」及「隨著台灣政治變遷，公民募資發起專案背後的意識形態取向」，因此本篇取徑「政治消費觀點」，提出公民募資即是政治參與行動，因此消費背後的意識形態成為本篇研究關注焦點，並借鏡新傳播科技發展下「連結式行動」的動員特色，以此聚焦討論專案發起方的角色與行動策略。

參、研究方法

一、募資網站的模板佈局

在募資專案頁面中，flyingV、嘖嘖募資平台提供募資發起方模板式的一頁式網頁，發起方可在網站架構下的框架上傳文字（專案主題、專案介紹、回饋品說明）、圖片（專案主視覺圖片、回饋禮品、其他輔助敘事圖片）、影片，主頁面也有外連的機制，分別是其社群平台、電子郵件連結、分享募資專案按鈕，另外在一頁式網站中主要顯示最大的區塊為專案介紹，與專案介紹平行的頁籤則包含專案進度、互動留言，而本篇論文篇幅限制，不討論網頁互動的超文本與影片，焦點鎖定於「募資說明」中的文本分析，進行消費實踐的經驗調查。（如圖二）

圖二：募資網站模板頁面⁷



二、台灣公民募資專案趨勢的研究架構

公民募資做為政治倡議是新興的社會現象，以現有學術研究、社會脈絡、實務場域分析材料，難以進一步回應台灣的公民募資現象，為了更加理解公民募資的行動輪廓，本篇研究資料取自兩大募資平台自 2012 年 2 月開站至 2019 年 12 月期間，於 flyingV「公共」及嘖嘖募資平台的「空間」、「社會」、「地方創生」子類別的募資專案進行逐筆檢查篩選出 562 項公民募資專案，並進行分類。研究分為三階段：

(一) 第一次定質分析：議題類型之分類

本文研究架構，首先採用社會科學研究的「定質分析」，透過傳播資料的初步研讀，以形成假設、發現新的關係與勾勒出概括的趨勢。以內容性質的判讀當作基本內容單位，而定質分析需仰賴研究者主觀的分類應用，視文

⁷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整理與繪製（左）。截圖自 flyingV 募資網站：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4878>（右）。

本為跳板，研究訊息傳播者於文本後隱匿的意識形態（閻沁恒，1967）。從文獻探討中，理解到新傳播科技下，動員邏輯傾向議題在前的連結式行動（Bennett 與 Segerberg, 2012；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 2014），以此討論希望透過資料分類，進行議題輪廓之初探。在 562 項募資專案中，定質分析方式以研究者於研究期間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間，反覆八次檢視，依據專案發起背景、專案行動目的、訴求等面向進行歸類，若專案可能同時兼具多種類型特色，則以側重屬性者為主。

透過定質分析的分類，進行公民募資專案分類共十類：「黨政趨向」⁸、「弱勢關懷」⁹、「性別平權」、「動物保護」、「教育推廣」、「環保倡議」、「社區營造」¹⁰、「自媒經營」、「健康促進」及「食安倡導」¹¹。並且根據統計各專案之上架平台、總贊助人數、總贊助金額，分析其台灣公民募資實踐經驗上倡議主題之傾向。

（二） 第二次定質分析：敘事功能面向分類及論述

在首次分類公民募資類型的定質分析中，取總贊助人數、總贊助金額具研究代表性之類別，進行第二次之定質分析（見附錄一）。¹² 敘事學本文結構分析，即是對語言中「選擇」與「組合」的機制進行理解，透過切割文本表層，浮現出敘事者的策略，根據法國學者 Gerald 提及敘事研究即是找出敘事文本的基本要素，並將其中作用呈現出來（孫秀蕙、陳儀芬，2011，頁 143），本篇論文將以敘事功能面向，分別以「行動目的」、「行動召喚」、「發起

⁸ 黨政趨向：與執政政府、地方政府、黨派有關的窄義政治動員，關乎地緣政治、國家與地方治理的倡議。

⁹ 弱勢關懷：弱勢族群之救助，包含偏鄉族群、特殊疾病、身障、精障、遊民、新移民、清寒貧困者等。

¹⁰ 社區營造：促進社區發展、傳承當地文化，守護當地人文地景等在地公共事務推動。

¹¹ 食安倡導：關注食品安全議題，從田間實作推廣健康食物，或抵制不良企業的黑心商品。

¹² 2012 年公民募資列表中，無黨政趨向類募資專案，2012 年公民募資僅有 2 案：「Book Surfing--整個城市就是我的圖書館」隸屬教育推廣類；「【VetLaw】肥肉青年環島志工服務種子團」隸屬弱勢關懷類，黨政趨向類募資專案之文本研究自 2013 年開始計。

角色」、「政治立場表態」等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募資說明文案」（位置見圖 2）：（1）透過「行動目的」及「行動召喚」去理解募資發起方如何透過議題的再現，動員公民募資的政治消費行為，來回應「公民募資發起方在募資平台的動員策略」之研究問題；（2）而「發起角色」、「政治立場表態」的探討面向，則做為觀察動員邏輯特色中（組織角色是否表態？政治立場作為身份認同？），公民募資發起方的身份與訊息內容意識形態，以此回應「公民募資發起方在募資平台的身份應用策略與意識形態的取向」之研究問題。

（三）詮釋批判的分析取徑

在取得定質分析資料後，研究根據前述文獻檢核，以「政治消費主義」的視角，找尋密縫於字裡行間的意識形態，藉此分析文本語境的動員特色。公民募資的情境與整體政治經濟環境、社會脈絡有關，由此展開論述批判討論，在此將文本視為一種社會行動，做為研究者仰賴的論據來源，因此，在歷史上可看成「社會過程的指標」，政治上更是「社會控制」與「意識形態」支配運作的場域（Devereux, 2007）。而根據 Devereux 提及文本產製、流通與意義的建構，都在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中進行，其中不可忽視意識形態的存在。意識形態是指和某種利益牽連的觀點，以這個觀點用來描述這個世界，進而合理化某社會團體或組織的利益，因此藉由論述的方式，審視意識形態背後這套社會發展而成的語言或描述系統，如何建構並傳播一套連貫的意義體系進而服務某群體利益。

一般來說，以論述途徑做為分析策略的學者，會特別偏向某些議題及特色：Van Dijk（1985）關注語言的再生產及理解，如何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以及認同的行動，他強調意識形態是一種社會認知的形式，也是集體的再現（倪炎元，1999, 2018）；此外，採取 Ruth Wodak 的歷史—批判論述分析，則可有利於檢視文本中的自我指涉、認同召喚、他者建構、理念操作、框架設定的策略（倪炎元，2017）。本篇研究根據不同分析目的，擷取上述學者論述分析的特色與方法，理解公民募資文本中的符號、文本結構及敘事框架：首先採用 Van Dijk 研究方法，檢視個別字彙與語句的策略性意義、功能以及語句之間的關聯，從語言文本中有效識讀出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符

碼，關注「意義」如何被創造與詮釋，並產生隱而不顯的「意識形態」，揭露其中運作的機制；同時以 Ruth Wodak 的歷史—批判論述分析特色在於重視議題前後的歷史脈絡，並將脈絡還原與重建，可揭露出論述實踐中隱藏或明示的「操縱說服特徵」（倪炎元，2018），據此本篇研究也將透過政治變遷下的歷時性交叉檢閱 2013 至 2019 年間，政黨政治變遷與專案中政黨意識立場，檢視台灣公民募資的實踐特色。

三、分析工具

募資網站的文本，並非皆以文字形式展現，為了版面設計美觀，大多募資專案發起方，都會採用圖文兼具的圖片，進行文案宣傳，因此在分析過程，需要以人工判斷方式進行區別。本篇研究工具以「MAXQDA」質化分析軟體進行分類（見圖三），透過整頁截圖儲存為 PDF 方式匯入「MAXQDA」軟體，逐筆詳閱文本語境內容，以定質分析進行「文本單位」之分類標示（見表一），做為本篇研究之語料素材，以下分別詳述募資網站之模板佈局及敘事單位之分類。

圖三：分析介面示意



資料來源：截圖至研究者電腦之分析介面

公民募資論述分析方式依據每個面向中的文本內容進行分類，每項類別為最小敘事單位之分析，分類力求互斥周延。在此需特別說明文本單位認定

方式，經由「MAXQDA」質化分析輔助標示募資文本的數個文本單位後，透過「MAXQDA」內建表格程式，了解在各募資專案文本內容偏重哪個文本單位，最後經由人工判讀，個別專案在「行動目的」、「行動召喚」、「發起角色」、「政治立場表態」中文本分類之歸屬¹³。以下為文本單位之分類示意（如表一）。

表一：文本單位之分類示意

文本分類	行動目的	行動召喚	發起角色	政治立場表態
文本單位	政治議程的介入：公投、罷免、法案倡議	太陽花相關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鮮明政治立場
	作品	人權自由	組織或聯盟	強調無政黨立場
	線上工具	媒體改革		反對特定政權／政黨／政治人物
	線下集會	代議民主失望		
	其他專案	台灣角色認同		
		政府角色失能		
		審議民主		
		選舉文化的修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重新整理與繪製。

¹³ 以下分別說明自定義操作及立意說明：1.募資行動目的：指募集的資金將資助什麼類型的行動，依照募資專案之行動目的可分為 a.政治議程的介入，以公投、罷免、法案倡議等目的之遊行或登報等行動、b.作品係指影音書籍及互動遊戲等、c.線上工具則包含公民線上問政網站、國會直播平台、公民媒體等、d.線下集會則納入各種落地活動形式，舉凡講座、放映會、演唱會、返鄉專車等；e.其他專案則包含書店重建、外交活動、輔選監票志工等無法歸類之專案。2.行動召喚：在每篇募資文案中，發起方皆有一個訴諸行動的議題，由議題做為行動的鉤子，吸引了對特定議題關注的贊助者，而這些議題除了看作驅動贊助方捐獻的動力，也可能反應了在民眾對生活政治現況不滿的狀態，此類行動召喚的主軸包含太陽花相關、人權自由、媒體改革、代議民主失望、台灣角色認同、政府角色失能、審議民主及選舉文化的修正。3.發起角色：以募資發起方角色做為討論變項，進一步討論連結式行動中，組織或個人角色在發起議題的策略。4.政治立場表態：以政治立場做為討論變項，有助於連結發起議題與政治立場的關係，進而浮現背後的意識形態。

肆、研究發現

一、台灣公民募資整體趨勢

平台共發起 562 項公民募資倡議專案，籌得約 2 億 4 仟萬元，共 15 萬 962 人次參與台灣公民募資（如表二），募資動能顯示出台灣以非經濟目的的捐贈行為推動社會改革，在形塑台灣政治消費文化具有指標性意義。在 562 項募資專案中，「弱勢關懷」類最常見，佔所有公民募資項目的 48.75%，參與人數 30.42% 佔第二位，而「黨政趨向」類募資總額佔 33.33%，為公民募資金流第一名，捐款人次也高達 40.79%，佔捐款人次第一名。而專案平均金額次高者為「黨政趨向」類，高達 114.0158 萬，政黨相關的募資議題形同是募資的吸鈔機。

表二：flying V、嘖嘖公民募資類別統計表，2012-2019

類別	專案數	專案數百分比	捐款總額	捐款總額百分比	捐款人次 (萬)	捐款人次	每人捐款 平均金額	專案 平均金額 (萬)
			(萬)		百分比			
1.黨政趨向*	70	12.46%	7981.1035	33.33%	6.4956	40.79%	1229	114.0158
2.弱勢關懷	274	48.75%	7285.9046	30.42%	3.7919	23.81%	1921	26.5909
3.性別平權	46	8.19%	2651.1286	11.07%	2.2021	13.83%	1204	57.6332
4.動物保護	71	12.63%	2756.1773	11.51%	1.9533	12.26%	1411	38.8194
5.教育推廣	15	2.67%	1274.8947	5.32%	0.6567	4.12%	1941	84.9930
6.環保倡議	35	6.23%	722.3386	3.02%	0.3804	2.39%	1899	20.6382
7.社區營造	41	7.30%	665.4452	2.78%	0.3578	2.25%	1860	16.2304
8.自媒經營	3	0.53%	512.3372	2.14%	0.0621	0.39%	8250	170.7791
9.健康促進	5	0.89%	95.8769	0.40%	0.0250	0.16%	3835	19.1754
10.食安倡導	2	0.36%	3.7200	0.02%	0.0014	0.01%	2657	1.8600
總數	562	100%	23948.9758	100%	15.9264	100%	1504	42.6138

*「黨政趨向」專案詳細資料，見附錄一。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與整理。

回到前言（表 2）統計數據來看，黨政趨向類募資之金流與人數都分列公民募資第一位，具研究之重要性。接續討論如（表 3）所示。在公民募資 562 筆資料中的前十名¹⁴，「黨政趨向類」佔 5 項，除了青年返鄉列車的投票倡議之外，顯示其他三案都是與不適任代議士的罷免相關，其總捐獻的費用共高達 2365 萬 9742 元，佔 70 案政黨監督類募資總金額的 29.6%，動員金額的集中性顯示了罷免代議士的募資主題具有高度的動員力，卻也突顯了募資捐獻流向分配過於集中。

接續觀察募資前十名（如表 3）的動員：以太陽花運動相關議題的募資動能最強大（3 案），前十名主題募資主要有兩大訴求，包含政治議程介入（選舉、罷免）、地緣政治關係（太陽花、主權正名、反滲透、香港民主），而這兩種訴求都需要強大的資源及組織來號召群眾，然而從表中可看出專案發起方多以個人或非正式團體身份發起專案，僅有「「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一案是以正式組織角色發起專案。

太陽花學運是台灣公民募資茁壯萌芽的濫觴，續存的民意能量仍以各種形式埋伏在「黨政趨向」類專案中，發揮學運的長尾效應，其中募資金額及人數最高的「割闌尾計畫」，鎖定罷免國民黨籍立委蔡正元、林鴻池與吳育昇，群眾對代議士放任服貿協議通關表達不滿。2019 年啟動的罷免時任高雄市長韓國瑜的「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為台灣史上第一起成功以公民募資形式介入政治議程完成罷免行動的專案。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募資平台上對香港民主奧援，案 64「銅鑼灣書店 | 台灣重啟 | 為自由的靈魂

¹⁴ 公民募資總表前十名專案，分別是 1. 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黨政趨向類：1198.4994 萬、11514 人次）、2. 非常召集 | 牽手步入禮堂的最後一哩路（性別平權類：1037.9789 萬、5334 人次）、3. 福山部落：方舟計畫（弱勢關懷類：802.4666 萬、1224 人次）、4. 拯救台灣石虎：吃雞·毒殺·衝突化解——全民募資計畫（動物保護類：759.8476 萬、4580 人次）、5. 【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黨政趨向類：759.8476 萬、11514 人次）、6.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黨政趨向類：616.0988 萬、4188 人次）、7. 銅鑼灣書店 | 台灣重啟 | 為自由的靈魂而開（黨政趨向類：597.7350 萬、2901 人次）、8. 《美感教科書第二季》107 教改倒數計時，台灣孩子值得一套更美的課本！（教育推廣類：564.0281 萬、2824 人次）、9. 公民割草行動（黨政趨向類：551.3760 萬、4352 人次）、10. 《政經關不了》最勇敢的政論節目·政經全面攻網（自媒體經營類：510.5700 萬、549 人次）

而開」專案，為支持出版自由。在 2019 年初習近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及香港反送中抗爭，針對年輕選民而言，「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即視感，反應了多數民眾對香港處境的憂慮（俞振華，2020 年 1 月 22 日），而案「銅鑼灣書店」顯現香港民主議題的特殊性，在消費者公民的想像中，塑造了香港民主言論自由在台灣重現的可能。

表三：flying V、嘖嘖公民募資之黨政趨向類前十名列表

專案名稱	募資平台	台幣（萬）	捐款人次	專案發起方
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	flying V	1198.4994	11514	割闌尾計劃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	flying V	694.7166	3611	自己國家自己救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	嘖嘖	616.0988	4188	wecare 高雄 （正式組織）
銅鑼灣書店 台灣重啟 為自由的靈魂而開	flyingV	597.7350	2901	林榮基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公民割草行動	嘖嘖	551.3760	4352	公民割草行動 （正式組織）
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	flying V	502.6619	3153	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沃草！國會無雙 2.0: 自己的國會自己督！	flying V	492.3659	3897	沃草 （正式組織）
台灣保衛戰 拒絕中國滲透，推動「護台法案」！	嘖嘖	413.5616	2123	護台防中立法行動小組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	嘖嘖	322.7431	1461	挪威居留證訴訟核心團隊 （個人或非正式組織）
「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flyingV	288.3927	5586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 （正式組織）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與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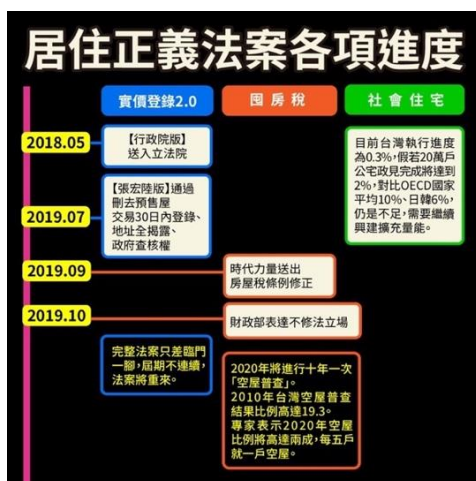
觀察台灣公民募資的發起專案，從參與人數、募資金額等客觀條件上，皆可看出「黨政趨向類」的公民募資相當重要，這是展現民眾試圖以集體力量與政府的協商經驗，有其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學者提醒討論公民募資特色時，強調不應只是關注平台、專案項目、募資贊助方，更需要結合募資發起方觀點，了解其互相交互的實作經驗（Wenzlaff, 2020）。與歐美偏向社區建設的公民募資特色有所不同，從以上台灣公民募資平台及專案項目整理（表 2 ~ 表 3），觀察到黨政趨向類的金錢（33.33%）及人力（40.79%）動員表現突出，然而令人玩味的是排名前十項專案主要涉及政治議程介入（選舉、罷免）、地緣政治關係（太陽花、主權正名、反滲透、香港民主），在網站的募資發起方的介紹，卻多以個人、非正式組織身份發起。從上述整理出台灣法令對於公民募資規範尚未周全，彈性規範的雙面刃固然使新創企業可以彈性自由發展，而公民募資帶有政治參與的實踐特色，在募資發起方的身份上，卻涉及了政黨側翼的猜想（陶本和，2015 年 12 月 23 日；趙婉淳，2019 年 12 月 27 日），因此循此台灣募資實作經驗的發展脈絡，本篇研究以「黨政趨向類」的公民募資聚焦，進一步討論公民募資文本中的動員策略與意識形態。

二、從文本分析看動員策略與意識形態

（一）行動目的著重於政治議程介入

逐筆觀察募資的行動面向，可分為政治議程的介入（29%）、線上工具（14%）、線下集會（26%）、作品（10%）、其他專案（21%）等五個行動類型。公民募資的行動反映圖灣政治經濟結構上的缺失，也突顯台灣倡議行動的取向，其中政治議程的介入（29%）佔比最重，揭露了社會行動者不滿政府及代議制度的缺失，提出法案倡議包含空污、廢核、青年投票、罷免不適任官員、拒絕紅媒、東海岸土地開發、氣候變遷、兩岸監督條例、居住正義（如圖四）等。

圖四：案 62「終結金權政治，實現居住正義」募資網站文本



資料來源：截圖自嘖嘖募資網站¹⁵

然而從議題中也可以看出在政治議程的介入中，募資平台發起方對於資本家剝削、經濟勞工條件不平等、低薪、精神病除罪化司法等議題並無太多著墨，至今針對美國「佔領華爾街」等反政商交相勾結的倡議募資或甚至是勞工權利等相關的募資主題，在台灣募資平台鮮少提及。從文本分析單位上，觀察到線下集會（26%）是最常使用的行動類型，如講座、放映會、音樂會、演唱會、街頭抗爭等；線上工具（14%）大多是太陽花當時的學生或公民團體自發性延伸的募資專案，專案的行動目的用於監督國會、問政網站或是公民媒體。從分析結果也回應了 Davies (2014)、Charbit 與 Desmoulin (2017) 提及公民募資重視社群的關係，並且連結了線下社區的動員，從數據上也再次證明了公民募資著重場域的經營，體現了公民募資中在地社群凝聚的行動特色，而募資平台則成為線上與線下之間的資源串接點。其他專案（21%）則表現在多元及特色的倡議表現，如外交行動、台灣正名等的媒體登報行動。而公民募資中的作品（10%），則大多都是 2014 年後太陽花學運後的作品，民眾做為活動紀實或是提供公民媒體的觀點再現。

¹⁵ 參見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housing-right-1109>

(二) 以台灣認同做為行動召喚

行動召喚是募資文案的訊息重點，也是說服式傳播的核心。募資發起方在募資文本中提供了「操縱說服特徵」，這些核心議題與個人價值觀一致 (De Zúñiga, Copeland & Bimber, 2014)，做為贊助方被文本中的核心價值吸引，有意識地進行倫理道德的消費，也就是「消費支持」。因此透過募資文本中行動召喚，可以窺見募資發起方提供何種核心說服策略做為刺激消費的動能：在募資文本分類中可以發現「台灣角色認同」(26%)是佔比最大的論述核心，「政府角色失能」(19%)次之，接下來依序則為「代議民主失望」(16%)、「太陽花相關」(14%)、「媒體改革」(8%)、「審議民主」(9%)、「人權自由」(7%)、「選舉文化」(1%)。

你終於可以站出來，成為決定台灣未來的關鍵～「案 67：

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Monticelli 與 della Porta (2018) 主張消費行為建構個人身份，意味者個人消費 (贊助) 什麼，等同於你認同什麼。在公民募資文本中，將台灣做為募資個體的族群認同 (26%) 是最常見文案手法，在此也強調了募資贊助者與土地之間的連結性，鼓勵民眾發揮草根的力量。於此分析浮現了 Wodak 提及的論述分析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處理「認同政治」，而認同的建立分散在不同地域、族群、世代的記憶、敘事與迷思中 (Wodak, 2010；倪炎元, 2018)。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布的《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1992~2020》，2007 年後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48.4%) 的比例首次超越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43.1%) 的比例¹⁶，在募資文本中，大量出現「台灣」關鍵字，做為行動的呼喚，似乎也暗示了募資的行為就是投資台灣的未來。於此可觀察出「台灣認同」成為積極性政治消費的一種手段，也回應了新傳播科技下認同邊界形塑了組織的樣貌 (Diani, 2019)。

¹⁶ 《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1992 年~2020 年 6 月》，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https://esc.nccu.edu.tw/upload/44/doc/6960/TaiwanChinese.jpg>

募資文本中，時常出現直指政府角色失能的控訴（19%），現實狀況對應了草根人民的被剝奪感，此時的贊助行動，更突顯出公民募資贊助方不可推卸的道德消費角色，如同 Oliva（2018）提及的「共享政府」，公民在情感上成為了自身福祉的推動者。

無論是回家的房租，還是出門的消費，食衣住行都深受高房價衝擊，...為什麼我們的政黨和政治人物，似乎都拿不出辦法來解決？～「案 65：終結金權政治實現居住正義」

而針對代議民主的失望（16%），則反映了民眾對於國會立法委員及當地政府首長議會的施政不滿，主要議題包含了不適任民代的罷免或是政策的倡議。

代表地方選區、應該反映民意的代議士，卻長期跑紅白場、接受關說綁樁，派系角力大於公平正義，在國會殿堂裡淪為黨意的橡皮圖章時，自己的立委應該自己罷！（罷免時任國民黨台中市立委蔡錦隆）～「案 28：全面罷免 2：極速罷免」

太陽花相關的公民團體仍然持續為監督政府努力，除了相關學運紀念作品集外，特別一提的是，其他公民募資專案如青年返鄉列車（2014 年），也跟隨這股學運勢力的餘溫號召捐款人，試圖影響 2014 年九合一縣市長及議員的選舉。在此，可觀察到「太陽花」也成為了募資情境中被消費的議題（14%），吸引對太陽花議題有共感的捐獻者。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用像太陽花學運當時那樣餐風露宿睡柏油路，卻還是可以匯集人民的力量發揮影響力，改變台灣的未來？有的！今年的 11 月 29 日就有這樣的機會。～「案 21：【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青年投票、翻轉政治」

(三) 隱匿組織身份與政黨角色做為群眾動員

從以往研究理解公司企業與大型組織發起之社會文化活動專案在目標募資金額與實際募集金額上皆顯著高於小型組織或個人募資發起方，合理推斷組織在公民募資中的集結資源及信任優勢角色（王笙，2015；張又云，2015），然而與下述研究發現悖逆，本篇研究將募資發起方分類為組織或聯盟、個人或非正式團體¹⁷，在 70 筆黨政趨向類公民募資中的文本中發現以組織或聯盟發聲的募資專案為 41 案（59%），發起方為個人或非正式團體則有 29 案（41%）。

首先從模板架構審視專案發起方介紹介面，募資平台的規定中並無規定必須上傳發起組織或團體的非營利事業登記證等證明文件，贊助者其實難以分辨發起方背後組織的角色，也就是說，在募資平台的模板上，募資發起方可彈性選擇以何種身份表態，舉例「割闌尾」相關募資事件：案 13「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中只提及提案者「割闌尾計劃」，沒有留下其他線索分辨發起角色為個人或組織；而案 25「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徵」同樣也是簡單留下專案名「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徵」。在「割闌尾事件」罷免的對象，蔡正元、林鴻池、吳育昇、黃昭順、林國正、蔡錦隆的黨籍都是國民黨，雖然發起方都未直接表態政治立場，但文本中幽微透露出親綠的政治意識形態。從文本可窺見部分募資專案以個人或非正式團體之名，隱匿政治意識形態，對於自身角色採取迂迴模糊的策略，展現出連結式行動邏輯的特性。

觀察黨政趨向類型的公民募資，隱藏組織身分似乎形成一種策略，以看似代表公民意見的個人發起專案，合理化了文本中隱藏的政治立場，如同 Bennett & Sergerberg（2012）分析連結式行動與集體式行動中，發現了組織藏於幕後，但對於傳播內容仍然具有控制權，也就是雜揉型的連結式行動特色：運用社交技術手段，讓鬆散的公共網路圍繞個人化的行動主題而聚集起

¹⁷ 組織或聯盟是指若共同發起方有登記於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商業／工廠登記資料、或由維基百科登錄，即認為組織或聯盟；非正式團體是指在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未登記在案之發起方。

來，在不向其參與者強加政治符號和集體身份／認同的情況下動員資源或創立聯盟。

值得一提的是，不以正式組織為認同邊界時，身份認同則成為動員策略，其中以「我們」、「年輕人」為名吸納集結作為手段：募資文本中匡列對話的溝通對象，並且將對話族群也列入「我群」，綜觀文本中的角色表態，時常慣用「我們」，如案 13「割闌尾計劃」中募資網站的文字雲，計算出文本中的可複製文字共出現 67 次「我們」單詞，圖片中則出現 4 次「我們」（圖五）。

圖五：案 16「割闌尾計劃」文字雲及圖片¹⁸



此種論述策略與 Wodak 提及自我指涉經常使用「我們」來代表群體中的「大我」。而在公民募資中的「我們」，則同時或個別指涉幾種角色：（1）經歷相同社會情境者、（2）當地居民、（3）受威權壓迫的弱勢者、（4）發起團體代表、（5）一般職業角色等。

此外在台灣，年輕人等同於「低薪化」的代表，自 2009 年 5 月 11 日頒布「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22K 方案」，低薪化趨勢已成為當代年輕人出社會之後的困境，甚至在網路平台上，年輕人自稱「魯蛇」（loser）、「本魯」自嘲（吳駿盛 2014；轉引自莊佳穎 2014）。

¹⁸ 圖左：資料來源：由研究者自制文字雲。生產器來源：

<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

圖右：資料來源：截圖自 flyingV 募資網站：<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3080>

孔子說三十而立，但台灣現在年輕人卻是「三十焦慮」…
領著 22K 月薪面對高而房價，不只焦慮，更是絕望與憤怒…放
棄購屋，卻被批評不存錢、不努力的「魯蛇」。～「案 19：巢
運：帝寶一坪換公平」

對比政治權貴，年輕族群是社會上相對資源弱勢的群體，文案發起方透過將自己的角色定位與想像的對話者連結，勾勒出年輕人的世代困境，對於弱勢的贊助，也形成合理了道德的消費。在此的語藝作用形成了「實質共享」的關係，也就是兩個個體透過擁有相同的理念、態度、特質等呈現實質的連結，形成了同質性（彭懷恩，2002）。

（四）反紅反藍視為敵對角色的共鳴

對於政治宣傳來說，最常見的宣傳策略，其一是「激發敵我之間的對立」也被認為是衝突的重大驅力，其二，運用刻板印象，塑造共同敵人，也稱為「共鳴策略」，似乎對立越極端，衝突就越明顯，衝突越明顯，說服重點就越明確（孫秀蕙、陳儀芬，2011）。本文將以上兩種策略應用為「排斥」的策略解釋，進一步深入研究發現募資文案中即使募資發起方選擇不直接表述政治立場，但 70 案中的 52 案仍可從文本中觀察到特定的反對立場，並於論述策略中塑造一個共同的敵人，這些反對立場包含反藍（30 案，58%）；反紅（12 案，23%）；反綠（6 案，11%）；反當地政府（1 案，2%）、反媒體霸權等（3 案，6%）。Díaz & Cacheda（2016）提及群眾募資做為倡議運動的形式，參與者擁有共同的倡議目標，而倡議的形式往往是以反對霸權方式呈現，透過對抗共同的目標，來創建一個集體身份。從文本中的對立立場來看，反藍的修辭論述高達 58%、反紅論述為 23%，顯示出募資發起方塑造「負向他者」，操作「對立論述」來做為另一種政治消費的動能，這也顯示出了在台灣兩極化政黨政治的特色下，操作對立意識似乎比認同某個政黨，更能爭取支持。觀察反國民黨政權的募資主題，亦發現長期性的倡議行動，包含廢核（6 案）、228 共生音樂節（4 案）、台灣獨立（2 案）、投票列車（5 案）等行動訴求：將中國大陸政府視為敵對論述則包含了反大陸政權壓

迫、反紅媒、撐香港、台灣正名等四個倡議方向，從反紅的論述中，大致可觀察出文本中將「中國」框架為「加害者」，並且塑造我者為「受害人」，鮮明的表現出透過強化衝突，並透過情緒性字眼「蠻橫」提升了加害者的迫害。（圖 6）

圖六：案 55「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支持東奧正名、幫台灣隊加油！」

19



在對照反紅的議題框架：反大陸政權壓迫、反紅媒、撐香港、台灣正名，以上論述都是國民黨政權難以回應的重大爭議性議題。林怡廷（2020 年 3 月 6 日）提及台灣經歷民主化及本土化後，台灣認同及民主價值已是主流的社會價值，在兩岸議題上，蔡英文政府公開反對一國兩制、支持反送中，反觀國民黨明顯的親中色彩使其落入囚徒困境，失去台灣社會和年輕人認同，因此藉由反紅的論述，某方面也間接的擴大了我群與他群（國民黨、中國大陸政權）的差異性。

三、從歷時性分析看公民募資經驗

吳乃德（1996）提及「台灣人」的族群意識和對台灣的國家認同是同步並且逐步發展的，而國家認同歧異卻是台灣當代政治最顯著的分歧，並且一直是撕裂台灣的重要議題，吳乃德（1996）曾經提出國家認同是選舉中最常

¹⁹ 資料來源：截圖自嘖嘖募資網站：<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TeamTaiwan>

被討論的議題，也是候選人攻擊對手的主要武器，他認為族群認同的形成是透過政治動員的社會工程。回到台灣 2012 年至 2019 年的政治情境，經歷了兩次九合一選舉與總統大選，而台灣認同以及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一直是台灣政黨政治的主旋律，2019 年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談話，年中掀起滔天巨浪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撼動台灣政局，也讓國人對國族和國家認同出現震盪，世代對於國家認同的衝突到了史上新高（林倖妃，2019 年 12 月 30 日）。

順著以上研究脈絡，接續討論公民募資提出的當時政治環境（時任執政黨、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與募資發起方的反對立場進行比對：將 70 案募資專案依照發起時程排序，關鍵的時間斷點分別為 2014 年九合一選舉（2014 年 11 月 29 日，選舉結果民進黨取得多數線市長執政）、2016 年總統大選（2016 年 1 月 16 日，選舉結果民進黨蔡英文當選）、2018 年九合一選舉（2018 年 11 月 24 日，選舉結果民進黨大敗，國民黨再次取得多數縣市長席位）、2020 總統大選（2020 年 1 月 16 日，選舉結果民進黨蔡英文連任），主要分成四個時期進行觀察：（如圖七、圖八）

圖七：議題訴求與執政政黨的對照—1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專案上線期間	時期
1	PLU.R.S.電音反核陣線音樂遊行				2013/2/21-3/8	時期 A : 2014年九合一選舉日前(2014年11月29日)
2	台灣需要白色的力量				2014/1/1-2/28	
3	3/8 全台廢核大遊行：忍無可忍，不見不散				2014/2/6-3/10	
4	PLU.R.S.電音反核陣線 2014音樂遊行				2014/2/19-3/11	
5	【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				2014/3/24-3/24	
6	413·白色力量守護台灣之夜				2014/4/7-4/12	
7	太陽，不遠 - 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				2014/4/7-6/5	
8	蒲公英計畫：318公民運動札記《反什麼服貿》服貿紀事				2014/4/7-4/11	
9	盛開的向日葵-太陽花學運創作合輯				2014/4/8-4/18	
10	學韻：台科大學生太陽花主題曲				2014/4/14-6/10	
11	太陽花學運合輯，等待破曉				2014/4/16-6/12	
12	勇敢的種子：『誰是太陽花』樂遊創作專案				2014/4/19-6/7	
13	割關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				2014/5/3-6/19	
14	守護希望世代出版計畫-關於真相與法律 公民參與 集體說故事 次章：國會無雙 2.0：自己的國會自己督				2014/5/13-7/13	
15	新聞e論壇 - Be your eyes & ears				2014/5/26-6/11	
16	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公民直播記者培訓”全臺巡迴計畫				2014/6/3-8/4	
17	公民卡拉OK				2014/8/5-8/31	
18	奧運：帝實一坪換公平				2014/8/26-10/25	
19	市長，給問嗎？前進大台中				2014/9/2-10/1	
20	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_青年投票、翻轉政治				2014/10/31-11/10	
21	監票者聯盟全國監票活動				2014/11/9-12/6	
22	全民監政				2014/11/13-2015/1/13	
23	雲林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2014/11/19-11/28	
24	割關尾高雄區的急徵				2014/11/29-2015/1/29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日期	時期
26	全民參政：鍵盤民主網				2014/12/1-1/31	時期 B : 2014年11月6日總統大選日前
27	2015台灣獨泥板助印募資				2015/1/7-2/17	
28	全面罷免 2：極速罷免				2015/1/16-2/23	
29	台灣第一屆模擬WHO - 許臺灣的醫療與外交，一個美好的未來				2015/1/17-2/5	
30	228共生音樂節—青年再起				2015/1/27-3/20	
31	314廢核遊行 台南場健康家園返陣行				2015/2/26-3/13	
32	《廢核重生》314南台灣廢核大遊行				2015/2/27-3/13	
33	314核電告別式 - 全國廢核大遊行				2015/3/2-3/13	
34	革命議會：拆車輪計畫				2015/9/15-10/31	
35	對國際發聲！請支持台灣成為真正的國家！				2015/11/14-11/22	
36	海馬迴補修 兩岸監督條例升空計劃				2015/11/16-12/10	
37	全國青少年投票日：告別舊國會，十八歲要投票				2015/12/2-2016/1/20	
38	青年·回投 中部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2015/12/22-12/31	
39	最後一里路，全民『監票』				2016/1/7-1/14	
40	正義衙門，打開台灣的正義之門				2016/1/10-3/7	
41	228共生音樂節：我們在這裡				2016/1/13-3/10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整理與繪製。²⁰

²⁰ 圖表說明：藍色為國民黨、綠色為民進黨、紅色為中國大陸政權、灰色為當地政府、黃色為媒體霸權。

圖八：議題訴求與執政政黨的對照—2

編號	專案名稱	反對對象	時任執政政府	時任縣市長多數執政黨	日期	時期
42	愛國T恤-5_20邀請您·一起穿出屬於台灣人的榮耀	紅	藍	綠	2016/2/1-3/30	日 時 前 期 (C 2 : 0 2 1 0 6 1 年 6 1 年 月 總 1 統 7 選 日 舉 至 後 2 至 0 2 1 0 1 年 8
43	對世界發聲！落實轉型正義·門牌喊聲建國！	藍	藍	綠	2016/3/3-4/30	
44	605【顧健康 疼困仔 反污染】大遊行	綠	藍	綠	2016/5/13-6/14	
45	海濱單車天堂怎麼了？集氣登頭版廣告	灰	藍	綠	2016/12/24-2017/1/17	
46	219我在高雄反空污	綠	藍	綠	2017/1/26-2/19	
47	228共生音樂節—欲行 e 路	藍	藍	綠	2017/2/7-3/12	
48	第六屆共生音樂節—壹無此人	藍	藍	綠	2018/1/23-3/30	
49	搖滾凱道365_沒有人是局外人_海濱巡迴計畫	綠	藍	綠	2018/3/30-6/1	
50	改變選舉生態·就從抱怨開始				2018/5/11-6/11	
51	在那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	紅			2018/8/1-9/30	
52	減煤好空氣—2018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綠			2018/9/26-11/11	
53	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支持東奧正名·幫台灣隊加油	紅			2018/10/19-11/9	
54	喂？我在路上了_2018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2018/10/24-11/9	
55	給我好空氣 問政新北第七選區				2018/11/2-12/2	
56	廢話電子報：廢死聯盟其實很怕死又不想死的真心話				2018/12/18 (訂閱制)	
57	世衛無國界醫療外交計畫-看見台灣醫實力	紅			2019/4/11-5/9	舉 時 前 期 (D 2 : 0 2 1 0 8 1 年 8 1 年 2 九 月 合 2 一 5 縣 日 市 至 長 2 選 0 舉 1 後 9 及 年 2 1 0 2 2 月 0 3 年 1 總 日 統 1) 選
58	一起讓更多人關心台灣吧	紅	綠	藍	2019/4/24 (訂閱制)	
59	拒絕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623 凱道集結聲援計畫	紅	藍	藍	2019/6/16-6/16	
60	wecare罷韓30·高雄Reset大遊行	藍	綠	藍	2019/7/19-8/31	
61	公民割草行動	藍	藍	藍	2019/7/19-7/31	
62	沒有圍牆的監獄：維吾爾人的今天 特展	紅	藍	藍	2019/8/14-9/28	
63	台灣保衛戰 拒絕中國滲透·推動「護台法案」!	紅	藍	藍	2019/8/20-9/24	
64	銅鑼灣書店	紅	藍	藍	2019/9/5-11/4	
65	終結金權政治·實現居住正義	綠	藍	藍	2019/10/31-11/3	
66	減煤爭好氣·呼吸要平權：2019 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綠	藍	藍	2019/11/1-12/15	
67	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藍	藍	2019/11/24-12/30	
68	2020年政黨不分區立委辯論式政見發表會		藍	藍	2019/12/3 - 2020/1/31	
69	每月來點「政」能量 一起用政治知識來改變台灣		藍	藍	2019/12/4 (訂閱制)	
70	撐香港 援助與安置計畫	紅	藍	藍	2019/12/10-12/15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整理與繪製。

時期 A，2014 年九合一選舉日前（2013 年至 2014 年 11 月 29 日）：為國民黨馬英九執政期間，於 2014 年發生太陽花學運期間及之後，多項專案都表明了太陽花學運相關行動及試圖影響 2014 年九合一選舉結果為主要行動導向，高達 17 案募資專案持有反對當時執政黨—國民黨的立場，其中太陽花相關募資佔了 10 案，反藍論述是這時期的主基調。特別需要關注的是案 25「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徴」，動員旨在罷免高雄區立委黃昭順、林國正，由於募資發起日為九合一選舉投票日（2014 年 11 月 29 日），於法不可宣傳選舉人廣告，而募資專案中的反藍語境重現太陽花運動國民黨代議士的不適任，募資發起方在如此敏感的選舉日發佈募資專案，是否間接影響輿情？無從得知。

時期 B，2014 年九合一選舉至 2016 年總統大選日前（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此階段，民進黨地方選戰得勝，中央與地方分別由藍、綠主導，在此階段民進黨積極佈局 2016 年總統選戰，而值得注意的是，時期 B 首次出現台灣公民募資史上台灣獨立相關的行動（案 27、案 35），而反核行動在此時於台灣北中南各地發起遊行集結行動（案 31、案 32、案 33），可以看見此階段的議題集中在統獨及反核議題。而在總統大選前一週，則有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相關募資主題（案 40、41），募資專案發起時機敏感，做為案例討論可持續關注。

時期 C，2016 年總統選舉後至 2018 年九合一縣市長選舉日前（2016 年 1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4 日）：2016 年總統選舉藍下綠上，民進黨蔡英文贏得總統大選，這段時期是朝野同時皆由民進黨佔多次席位，本篇研究分析 2016 年總統大選後僅有 4 件募資專案發起，2017 年整年度更只有 2 起，發案頻次明顯雪崩式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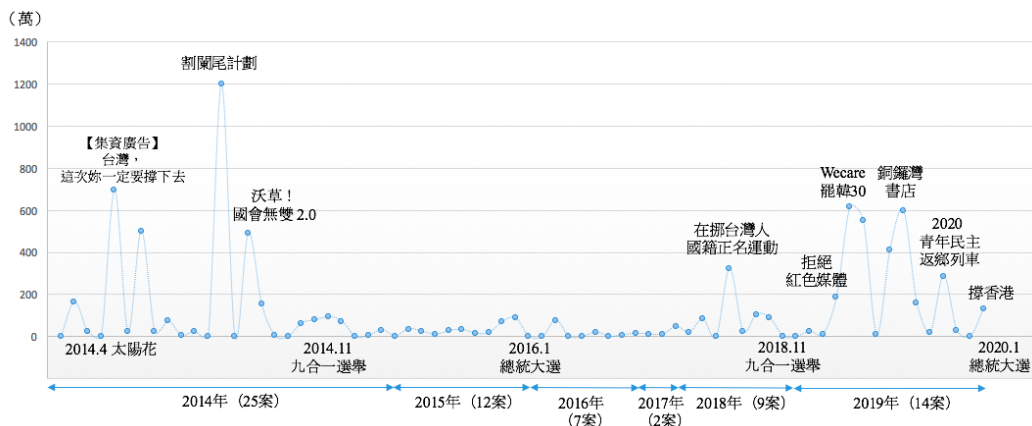
時期 D，2018 年九合一縣市長選舉後及 2020 年總統選舉前（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則是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之後，同時也是 2020 總統大選前 2 年，在地方首長選舉的表現上，民進黨失利僅拿下地方首長 6 席，國民黨則獲得 15 席²¹，於此同時，可以觀察到許多反對中國大陸威

²¹ 2018 年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權的募資案例增加，高達 7 案，議題訴求包含反對紅色媒體、台灣正名、撐香港、反中國滲透等議題，反藍的議題則有 2 案，主要是針對罷免韓國瑜的議題，反綠則有 2 案，議題訴求在居住正義及高雄反空汙的議題。

總合以上四個階段的歷時性分析，從「募資專案發起的政治時勢」與「募資發起方的反對立場」交相觀察發現如下：監督民進黨之公民募資專案遠少於監督國民黨、2018 年九合一選舉前後敵對共鳴目標轉向反紅色滲透、募資動員高峰期與社會運動及政治時事連動。特別觀察六年間案量峰期變化（見圖 9），表明了募資倡議的發起與社會運動、選舉活動、地緣政治情勢等有高度相關性，這類重大政治事件牽動著募資動員的節奏，募資商品的消費被交織在地緣政治與政黨意識的情境中，高峰更是集中於選戰前與大型社會事件後。此外，消費實踐與黨政更迭有明顯的交互動態關係，2016 至 2017 年兩年間朝野都是民進黨主政，募資發起量明顯偏少，整體公民社會的募資行動者為何在這兩年間近乎沉寂，其中不言而喻或有待進一步解釋。攤開歷時性數據，除了募資集中在選戰前，不利於民主發展之外，公民募資行動看似形塑出公共意識，卻可能由特定的意識形態主導，當民智與消費者公民的道德被利用，也反映出了群眾智慧的決策風險。

圖九：募資專案年度發起量及金額表



資料來源：筆者重新整理與繪製。

伍、結論

募資贊助方視為公民消費者，認同了募資發起方議題建構的價值，以金錢贊助的行為響應了募資議題，將線上倡議化為實際的行動。從層層線索觀察，在公民募資平台的動員流程中，發起方的角色與文本策略也成為公民募資平台動員系統的重要決策關鍵：

一、公民募資的角色策略——「弱勢我者」

本研究發現，揭示了公民募資文本在「我者」定位上的特殊策略：Wadak 提及論述策略都涉及「正向我者」、「負向他者」，這是建構認同與差異論述的基礎（倪炎元，2018），然而不同於 Wadak 的「正向我者」、「負向他者」論述策略，本篇研究發現在公民募資的敘事處理上，呈現「弱勢我者」、「負向他者」的策略，通常透過「年輕人」指涉弱勢我群，強化了政治消費的道德性，循著文本透露出的發起方策略，本文發現政治性公民募資的文本

善於使用「吸納」、「排斥」的策略製造出衝突的共鳴，募資發起方大量使用「我們」、「年輕人」、「草根」的字眼建構了發起方身份，象徵這群人與捐獻者共同擁有相對弱勢的身份。在回顧網路群眾募資平台中資源交換與行動者參與動機的文獻中，發現群眾募資涉及尋求認可、建立連結、參與感或幫助他人等更涉及情感層面的資源流動（陳慧如、陳誼珊，2016）。觀察公民募資的文本運用，淡化以「政黨」、「組織聯盟」視為「正向我者」的敘述策略，透過「弱勢我者」做為募資發起方的角色定位，也實現了募資動員中在認同、連結等情感需求。

二、台灣認同的歧異視為身份認同標章

本篇論文整理出募資發起方建構「台灣認同」（30%）的議題，將台灣價值做為催化劑，來獲得社群團結，此研究發現也應證了張嘉玲（2016）提及「強調本土意識，進而取得募資者贊同」是群眾募資成功關鍵之一。在以往募資的動員經驗中，募資專案需要組織角色以提升專案信任度、動員各界資源，然而在台灣公民募資行動特色發現，募資發起方藉由議題的框架，形塑了捐獻者的身分／認同，在建構認同的策略上，公民募資發起方更傾向以「倡議議題」在前，「台灣認同」在文本中做為身份邊界認同，此時組織的角色隱於幕後，這種動員策略與 Bennett & Segerberg（2012）提出了「連結式行動的邏輯」相呼應，募資發起方在處理「認同政治」時，將組織的角色隱匿於後台，化身為個體公民發起行動，以個人角色做為整體的代表發起倡議，此種協調方式，有利於募資專案的「去政黨化」，進而爭取中間選民，淡化組織角色的動員策略，免除了個人在行動中被定性標籤，捐獻者可專注於行動議題。在論述策略上，募資發起方為了符合認同的價值，塑造共同的敵人以操作台灣認同的價值，賦權贊助者的行動正當性；然而從公民募資的論述策略中，觀察到台灣認同的意義被政治角力腐蝕，藍綠兩黨的認同者在一中／台獨、中國人／台灣人、威權態度／民主理念，這些主觀態度上有清楚的分野，身份認同的本質失去了「文化」、「族群」的內涵。

三、政黨意識形態隱匿於日常生活中的政治

當公民募資進入日常生活，也成為當代政治參與的一種形式（Charbit & Desmoulin, 2017），以往涉及重大政治選舉背景的動員，公民在行動前，清楚理解各政黨所擁護的意識形態後才進一步行動。然而，以議題主導的線上公民募資，其政治動員是以非常規形式納入公民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捐獻者的決定轉瞬在指尖之間，募資發生的時間段也非在特定選舉日，政治參與的正式情境鬆動，政黨意識形態也隨之滲透至公民社會的日常，也解釋了政治消費的「生活方式政治」選擇情境（Giddens, 1991）。藉由歷時性分析的線索，本篇研究勾勒出線上流動的政治參與如何鑲嵌在消費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募資發生高峰期座落於選戰前或牽動於地緣政治，然而公民募資做為監督政府的工具之一，對比 2014 年 25 案，於 2017 年間僅有 2 案，監督公器的角色明顯失衡，此種峰期的明顯變化更揭露出看似透明的公民募資藏有貓膩，而公民消費者浸潤日常生活政治中的確難以察覺。當公民募資發起者化整為零，迴避了政黨角色的表態，消費者公民選擇行動代理人解決社會問題，也必須審思、審查募資發起人背後組織的意識形態，觀察該發起組織長期支援的議題、組織成員政黨關係及意識形態等。

四、政黨意識滲透稀釋了公共意志

台灣長期藍綠兩黨角力的政治環境，致使公民募資的公共論述空間也滲透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派角力，甚至也交織著地緣政治的走勢：從太陽花運動的反服貿事件後，募資平台大量發起「反藍」的倡議主題（見圖 7），到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後（見圖 8），公民募資以「反紅」做為倡議主軸，若從歷時性觀察公民募資議題的核心，脫離不了台灣主權、抵制大陸政權等主題，隨著社會瀰漫著亡國感氛圍，這類主題更接近民進黨政府的「議題所有權」策略。在利他性的公民募資消費中，實現社會改革的價值是最重要的動能，而歷經不同政黨輪替的政治情境，公民募資倡議與政黨議題所有權，

共構了屬於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經驗。實際上進一步對應募資發起的論述情境，研究發現在藍綠兩極化政治的政治背景下，募資平台的監督立場卻嚴重傾斜於反藍、反紅的論述（82%），值得省思的是，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更少見監督民進黨募資專案（10%）的發起，顯示公民募資監督政府的作用失衡，另外一方面，以反對政黨立場為排斥論述的公民募資，在勞工權益、弱勢關懷、國防、教育等重要政治議題上出現排擠效應。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提倡「公共意志」可以排除政黨政治或代議制，真正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理想社會。原以為「公共意志」實現在公民募資，然而誰來建立、營運公共意識系統？當公共意識營運包藏政黨意識的運籌帷幄，消費者公民從捐獻行為獲得的代理行動是否真的能夠享受社會倡議下的成果？本篇研究行文至此對公民募資眾志成城的神話打一個問號。

本篇研究透過文本解構數位政治參與的神話，並非意圖指向公民募資可能為側翼力量的集資管道；台灣是民主後進國家，在公民社會的政治動員過程中仍持續在經驗中學習與省思，本文以政治消費視野看公民募資，從上述討論消費者公民更應該理性理解，公民募資於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參與實踐是一種「消費性支持」，研究證據表明浮現了募資行動中充滿政黨傾向的暗示，而公民募資非正式選舉的政治參與，消費者公民浸潤於日常接觸的線上募資平台，公民募資行為代表了生活方式的政治消費主義的展現，贊助者不易察覺能動性背後，帶有政黨意識偽裝成個人角色的政治行動。如同 Aitamurto（2012）提及群眾的線上政治參與是民主實踐的過程，不是點到為止的曇花一現，而最後的目標應是公民共同追求的民主與平等社會。政策施行於民，公民從作中學需理性監督，決策傾向不應該依附在政黨偏好，並且注意能見度較低卻事關重要的倡議議題，有效發揮公民募資的公共性。

五、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建議

透過政治消費與動員邏輯的討論，觀察到公民募資中的募資發起方透過隱匿組織身份將政治意識藏於行動議題之後。然而，「黨政趨向類」公民募

資在不同國家發展脈絡下，亦可能呈現不同特色，此與國家的民主成熟度、政治文化背景、經濟發展、人口結構、教育程度、地緣政治等皆息息相關，本篇研究僅限於台灣公民募資之經驗，以台灣做為案例研究，與其他國家募資消費經驗必有不同之處，也有自身的挑戰與課題，然而台灣在兩極化政黨背景、地緣政治的政權威脅等背景下的公民募資實踐經驗，可當作國際政治研究之應用與借鏡。本研究拋磚引玉透過文本分析描繪出台灣募資消費實踐的輪廓，其分析過程可能涉及個人語境詮釋判斷的限制：本文以詮釋批判視野，透過定質分析募資發起方的策略，分類上是以台灣在地經驗進行歸類，且本研究中納入多達 70 篇「黨政趨向類」專案文本尚未納入影音文本進行討論，在分析完整性未有完善；此外，本篇研究分類之公民募資其他九個類型，其發起方策略及意識形態之論述策略可能也有所不同，是否滲入特定政黨意識形態，致使議題排他性也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本篇論文尚未解決政黨暗示性文本與線上線下動員群眾的互動關係，也仍待處理行動訴求與成功募資的關係。本篇論文以台灣公民募資實踐經驗之研究初探，提供動員策略的大致輪廓，更多相關議題討論，期待更多學者進一步探討之。

參考書目

- 〈厭倦藍綠第三勢力展翅 選制不利小黨 學者：挑戰仍大〉（2014 年 4 月 15 日），《大紀元》。取自 <https://reurl.cc/GV4jmp>，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
- 王擎天（2016）。《眾籌：無所不籌，夢想落地》。台北：采舍。
-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1: 5-39。
- 林怡廷（2020 年 3 月 6 日）。〈站在反共和親中的十字路口，國民黨如何面對內部的「中國因素」？〉，《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kmt-china-relationship-crossroad>
- 林倖妃（2019 年 12 月 30 日）〈天下 2020 獨家國情調查：五成六民眾不滿經濟，但對台灣樂觀者首度超過悲觀〉，《天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352>，上網日期：2020 年 4 月 15 日。
- 俞振華（2020 年 1 月 22 日）。〈國民黨如何從 2018 的大勝到 2020 大敗〉，《奔

- 騰思潮》，取自 <https://www.lepenseur.com.tw/article/251>，上網日期：2020年4月20日。
- 倪炎元（2017）。〈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中的官方論述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42: 23-57。
- 倪炎元（2018）。《論述研究與傳播議題分析》。台北：五南圖書。
- 孫秀蕙、陳儀芬（2011）。《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台北：正中。
- 張嘉玲（2016）。〈案以群分：大數據解析回饋型群眾募資成功關鍵要素〉，《台灣經濟研究月刊》，39(2): 27-37。
- 莊佳穎（2014）。〈從政治消費文化觀點看當代台灣社會的民主參與和認同建構〉，《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1): 160-184。
- 郭瓊俐（2020年4月21日）。〈「罷韓一役」民進黨中央態度模糊 背後暗藏這個的政治盤算〉，《財訊》。取自 <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5242>，上網日期：2020年4月20日。
- 陳慧如、陳誼珊（2016）。〈群眾募資模式探究：非營利組織案例分析〉，《經營管理論叢》，12(1): 1-14。
- 陶本和（2015年12月13日）。〈泛綠外圍組織參與辦辯論？沃草：被貼標籤，不公平〉，《ETtoday 今日新聞網》。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1223/617934.htm>
- 陶振超（2017）。〈社交媒體的動員力量：網絡機會模式之觀點〉，《新聞學研究》，131: 49-86。
- 彭懷恩（2002）。《政治傳播與溝通》。台北：風雲論壇。
- 群眾觀點（2016）。〈台灣群眾募資報告，2015〉，《群眾觀點》。取自 <https://annual-report.crowdwatch.tw/2015>，上網日期：2020年4月20日。
- 趙婉淳（2019年12月27日）。〈陳麗娜要監委調查 Wecare 募資 嗆尹立勿閃躲〉，《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227003389-260407?chdtv>，上網日期：2020年4月20日。
- 盧嵐蘭（2005）。《媒介消費：閱聽人與社會》。台北：揚智文化。
- 閻沁恒（1967）。〈傳播內容之定量分析與定質分析〉，《新聞學研究》，1: 305-324。
- Aitamurto, T. (2012).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Finland: Committee for the Future.
- Baek, Y. (2010). To buy or not to buy: who are political consumers? What do they think and how do they participate? *Political Studies*, 58(5), 1065-1086.
- Bang, H., & Halupka, M. (2019). Contentious connective action: A new kind of life-political association for problematizing how expert systems operat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2(1), 89-104.
- Bennett, W. L., & Segerberg, A. (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5), 739-768.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232-260.
- Berger, S. (2019). A behavior economic perspective to political consumerism. In Boström, M., Micheletti, M., & Oosterveer, P.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pp. 111-13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bham, D. C. (2009). Crowdsourc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for planning projects. *Planning Theory*, 8(3), 242-262.
- Brent, D. A., & Lorah, K. (2019).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ivic crowdfunding. *Cities*, 90, 122-130.
- Brint, S. (2001). Gemeinschaft revisited: A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ncept. *Sociological theory*, 19(1), 1-23.
- Charbit, C., & Desmoulins, G. (2017). Civic Crowdfunding: A collective option for local public goods? *OEC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2017(2), 1. Paris, France: OECD.
- Copeland, L. (2014). Value Change and Political Action: Postmaterialism, Political Consumeris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2(2): 257-282.
- Dalton, R. J. (2008).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6(1), 76-98.
- Davies, R. (2014). *Civic crowdfunding: Participatory communities,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 Davies, R. (2015). Three provocations for civic crowdfund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3), 342-355.
- De Zúñiga, H. G., Copeland, L., & Bimber, B. (2014). Political consumerism: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social media conn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6(3), 488-506.
- Devereux, E. (Ed.). (2007). *Media studies: Key issues and debates*. Los Angeles: Sage.
- Diani M. (2019). Modes of coordination in political. In M. Boström, M. Micheletti, & P. Oosterve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pp. 89-10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íaz, J. R., & Cacheda, B. G. (2016, March). Financing social activism: Crowdfunding and advocacy social movement in Spain in times of cri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lectronic governance* (pp. 139-148). Montevideo, Uruguay.
- Doan, M. A., & Toledano, M. (2018). Beyond organization-centred public relations: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a civic crowdfunding campaig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4(1), 37-46.
- Dresner, S. (2014). *Crowdfunding: A guide to raising capital on the Interne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dwell, M. (2010).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42-49.
- Hollow, M. (2013). Crowdfunding and civic society in Europe: a profitable partnership? *Open Citizenship* 4(1): 68-72.
- Hsieh, H. C., Hsieh, Y. C., & Vu, T. H. C. (2019). How social movements influence crowdfunding success.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53, 308-320.
- Micheletti, M., Stolle, D., & Berlin, D. (2014). Sustainable citizenship: The role of citizens and consumers as ag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state. *State and environmen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1, 203-236.
- Mollick, E. (2014). 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 1-16.
- Monticelli, L., & della Porta, D. (2018). The Successes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liva, N. (2018). Crowdfunding and Civic Crowdfunding: Theoretical Featur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U. Comite (Eds.),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pp. 115-126). London: IntechOpen.
- Parsloe, S. M., & Holton, A. E. (2018). Boycottautismspeaks: Communicating a counternarrative through cyberactivism and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8), 1116-1133.
- Stiver, A., Barroca, L., Minocha, S., Richards, M., & Roberts, D. (2015). Civic crowdfunding research: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future agenda. *New media & society*, 17(2), 249-271.
- Sturken, M., & Cartwright, L. (2001). *Practices of looking*.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th, J.W. (2012). Is creative participation good for democracy, in M. Micheletti and A. McFarland (Eds.), *Creative 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taking in the political world* (pp. 148-172). Boulder, CO: Paradigm.
- Van Dijk, T. A.(1985). Structures of news in the press.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10, 69.
- Vromen, A., Xenos, M. A., & Loader, B. (2015). Young people, social media and connective action: From organisational maintenance to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8(1), 80-100.
- Wodak, R. (2010). The glocalization of politics in television: Fiction or rea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3(1), 43-62.

- Wenzlaff, K. (2020). Civic Crowdfunding: Four Perspectives on the Definition of Civic Crowdfunding. In *Advances in Crowdfunding* (pp. 441-472).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 Zuckerman, E. (2014). New media, new civics? *Policy & Internet*, 6(2), 151-168.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Taiwan Civic Crowdfunding 2012-2019

Yi-ping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Crowdfunding" from 2012 to 2019 on zaccac and flyingV websites. The citizen behavior of online donation is a wa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well-intended political consump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category of "Party-Politics Induced Projects" are the most outstanding in donations of person-time and total-amount, and such requests are mostly related to cross-strait politics, recall voting,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owever, civic crowdfunding practices on behalf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rogress-oriented political consumption, its discourse seems to relate with the KMT & DPP party competition, or geopolit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ll-to-action strategy is straightforward to "Taiwan Recognition". Especially most of the fundraisers deliberately downplay the rol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et the identity as "Individual Citizens ". Civic crowdfunding seems to be a bottom-up reform force; howev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fund-raising strategies mainly occurs on issues of self-identity. The donors should not ignore that political ideologies follow by the fundraisers behind the political consumerism.

Keywords: connective action, crowdfunding, civic crowdfund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nsumerism

*Yi-ping Chang is a PhD student of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110463502@nccu.edu.tw

附錄一

編號	專案名稱	募資平台	捐款總額 (萬)	捐款 人次	專案上線期間
1	P.L.U.R.S.電音反核陣線音樂遊行	flying V	2.5830	32	2013/2/21-3/8
2	台灣需要白色的力量	flying V	164.8369	1709	2014/1/1-2/28
3	3/8 全台廢核大遊行：忍無可忍，不見不散	flying V	23.6566	303	2014/2/6-3/10
4	P.L.U.R.S.電音反核陣線 2014 音樂遊行	flying V	1.5124	26	2014/2/19-3/11
5	【集資廣告】台灣，這次妳一定要撐下去	flying V	694.7166	3611	2014/3/24-3/24
6	413。白色力量守護台灣之夜	flying V	23.1133	99	2014/4/7-4/12
7	太陽，不遠—太陽花學運影像紀錄	flying V	502.6619	3153	2014/4/7-6/5
8	蒲公英計畫：318 公民運動札記／ 《反什麼服貿》服貿紀事	flying V	24.3321	614	2014/4/7-4/11
9	盛開的向日葵-太陽花學運創作合輯	flying V	75.8825	1479	2014/4/8-4/18
10	學韻：台科大學生太陽花主題曲 EP	flying V	5.1081	50	2014/4/14-6/10
11	太陽花學運合輯，等待破曉	flying V	26.2972	386	2014/4/16-6/12
12	勇敢的種子：『誰是太陽花』桌遊創作 專案	flying V	0.6842	26	2014/4/19-6/7
13	割闌尾計劃 Appendectomy Project	flying V	1198.4994	11514	2014/5/3-6/19
14	「守護希望世代」出版計畫--關於真相與法律/公民參與* 集體說故事* 療癒抱報	flying V	1.3750	15	2014/5/13-7/13
15	沃草！國會無雙 2.0：自己的國會自己督！	flying V	492.3659	3897	2014/5/26-6/11
16	新聞 e 論壇—Be your eyes & ears	flying V	154.4957	1486	2014/6/3-8/4

17	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 ”公民直播記者培訓” 全臺巡迴計畫	flying V	4.4902	26	2014/8/5-8/31
18	公民卡拉 OK	flying V	1.0900	12	2014/8/8-10/9
19	巢運：帝寶一坪換公平	flying V	64.6276	469	2014/8/26-10/25
20	「市長，給問嗎？」前進大台中！	flying V	78.8305	787	2014/9/2-10/1
21	【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青年投票、翻轉政治	flying V	93.9817	840	2014/10/31-11/10
22	監票者聯盟全國監票活動	flying V	73.9618	754	2014/11/9-12/6
23	全民監政	flying V	0.2100	3	2014/11/13-2015/1/13
24	雲林青年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flying V	5.3900	19	2014/11/19-11/28
25	割闌尾高雄區の急徵	flying V	31.8422	307	2014/11/29-2015/1/29
26	全民參政：鍵盤民主網	flying V	3.9910	8	2014/12/1-1/31
27	2015 台獨擋泥板助印募資	flying V	36.6451	176	2015/1/7-2/17
28	全面罷免 2：極速罷免	flying V	25.1650	278	2015/1/16-2/23
29	台灣第一屆模擬 WHO - 許台灣的醫療與外交，一個美好的未來	flying V	10.7150	34	2015/1/17-2/5
30	228 共生音樂節—青年再起	flying V	27.6818	295	2015/1/27-3/20
31	314 廢核遊行·台南場【健康家園】短陣行！	flying V	33.3156	332	2015/2/26-3/13
32	《廢核重生》314 南台灣廢核大遊行	flying V	15.7719	175	2015/2/27-3/13
33	314 核電告別式—全國廢核大遊行	flying V	19.0269	442	2015/3/2-3/13
34	革命議會：拆車輪計畫	flying V	70.6526	408	2015/9/15-10/31
35	對國際發聲！請支持台灣成為真正的國家！	flying V	88.5518	751	2015/11/14-11/22
36	「海馬迴補修」兩岸監督條例升空計畫	flying V	0.3815	11	2015/11/16-12/10
37	全國青少年投票日：告別舊國會，十	flying V	0.5800	10	2015/12/2-2016/1

台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 (2012-2019 年)

	八歲要投票！				/20
38	【青年·回投】中部返鄉投票專車計畫	flying V	77.6006	439	2015/12/22-12/31
39	最後一里路，全民『監票』	flying V	0.4901	28	2016/1/7-1/14
40	正義衙門，打開台灣的正義之門	flying V	0.0200	2	2016/1/10-3/7
41	228 共生音樂節：我們在這裡	flying V	22.2251	199	2016/1/13-3/10
42	愛國 T 恤-5/20 邀請您，一起穿出屬於台灣人的榮耀	flying V	0.3000	6	2016/2/1-3/30
43	對世界發聲！落實轉型正義，鬥陣喊聲建國！	flying V	8.3441	77	2016/3/3-4/30
44	605【願健康 疼仔仔 反污染】大遊行	flying V	15.0262	35	2016/5/13-6/14
45	海濱單車天堂怎麼了？集氣登頭版廣告	flyingV	12.1694	134	2016/12/24-2017/1/17
46	219 我在高雄反空污	flyingV	11.7210	105	2017/1/26-2/19
47	228 共生音樂節—欲行 ê 路	flyingV	47.8710	281	2017/2/7-3/12
48	第六屆共生音樂節—查無此人	flyingV	21.3354	221	2018/1/23-3/30
49	搖滾凱道 365 ——【沒有人是局外人】海嘯巡迴計畫	flyingV	83.5543	752	2018/3/30-6/1
50	改變選舉生態，就從抱怨開始	flyingV	0.3050	9	2018/5/11-6/11
51	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	嘖嘖	322.7431	1461	2018/8/1-9/30
52	減煤好空氣—2018 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flyingV	27.4187	158	2018/9/26-11/11
53	台灣不是中華台北！支持東奧正名、幫台灣隊加油！	嘖嘖	105.4457	608	2018/10/19-11/9
54	「喂？我在路上了」——2018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flyingV	89.3839	2842	2018/10/24-11/9
55	給我好空氣 問政新北第七選區	flyingV	2.9400	30	2018/11/2-12/2
56	廢話電子報：廢死聯盟其實很怕死又不想死的真心話	嘖嘖	0.5895	35	2018/12/18 (訂閱制)

57	世衛無國界醫療外交計畫-看見台灣醫實力！	嘖嘖	25.8059	136	2019/4/11-5/9
58	一起讓更多人關心台灣吧	嘖嘖	12.7455	372	2019/4/24 (訂閱制)
59	拒絕紅色媒體、守護台灣民主：623 凱道集結募資計畫	嘖嘖	190.1614	1320	2019/6/16-6/16
60	wecare 罷韓 30，高雄 Reset 大遊行	嘖嘖	616.0988	4188	2019/7/19-8/31
61	公民割草行動	嘖嘖	551.3760	4352	2019/7/19-7/31
62	「沒有圍牆的監獄：維吾爾人的今天」特展	flyingV	12.3050	148	2019/8/14-9/28
63	台灣保衛戰 拒絕中國滲透，推動「護台法案」！	嘖嘖	413.5616	2123	2019/8/20-9/24
64	銅鑼灣書店 台灣重啟 為自由的靈魂而開	flyingV	597.7350	2901	2019/9/5-11/4
65	終結金權政治，實現居住正義	嘖嘖	161.5362	904	2019/10/31-11/3
66	減煤爭好氣，呼吸要平權：2019 高雄反空污大遊行	嘖嘖	20.0700	68	2019/11/1-12/15
67	「回家以後」—— 2020 青年民主返鄉列車	flyingV	288.3927	5586	2019/11/24-12/30
68	2020 年政黨不分區立委辯論式政見發表會	嘖嘖	28.7620	268	2019/12/3-2020/1/31
69	每月來點「政」能量 一起用政治知識來改變台灣！	嘖嘖	1.0722	48	2019/12/4 (訂閱制)
70	撐香港 援助與安置計畫	嘖嘖	132.9751	583	2019/12/10-12/15

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 2003~2018 趨勢分析

王教安、王嵩音*

本文引用格式

王教安、王嵩音（2021）。〈信任媒體就信任政治？2003~2018 趨勢分析〉，
《傳播、文化與政治》，14:87-113。

投稿日期：2021 年 9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11 月 20 日。

* 作者王教安為台灣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王嵩音為台灣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專任教授，e-mail：telsiw@ccu.edu.tw。

《摘要》

媒體信任和政治信任都是維持國家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關鍵。然而國內外甚少研究探討兩者之關聯。本研究運用 2003 年和 2008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 2015 年與 2018 年「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共計四年的全國性資料觀察兩者之間關聯的長期趨勢。媒體信任是以報紙、電視、雜誌、廣播與網路五種媒體之絕對可信度測量，而政治信任則是以受訪者是否同意「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和「政府首長在媒體上說的話是可相信的」兩個陳述句加總測量。研究結果顯示各媒體之可信度逐年下滑，且都僅在及格邊緣。資料也顯示民眾對於政治信任的態度傾向不信任。四年中有三年的電視可信度與政治信任之間呈現正向關聯，較符合「良性循環說」的觀點。而廣播可信度在 2015 年時，與政治信任呈現負向關聯，則符合「媒介抑鬱論」的觀點。

關鍵詞：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政治信任、媒體可信度、趨勢分析

壹、前言

Rudolph & Evans (2005) 認為政治信任是一種對政府的情感，可以被概括為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信任的建立對於國家機構來說，是最首要的事情。而大眾媒體則是政治資訊傳播的重要媒介；一方面扮演著民眾與政府的橋樑，另一方面也具有第四權責任，發揮監督政府的功用。因此，對於民眾而言，無論對於媒體或是政府的信任都是維持國家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關鍵。

根據 2017 年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所公布的最新資料如表一，台灣民眾對「新聞記者」這行業的信任感竟只有 29%，相較於 2016 年的 34.9%，下滑了近 6%，成為當年「最不受民眾信任」行業第一名，也透露出媒體目前的危機。¹

表一：2015~2017 年台灣地區社會信任調查名次表

	2008	2013	2015	2016	2017
政府官員	11/13	14/14	14/14	7/10	9/10
新聞記者	12/13	12/14	12/14	9/10	1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表除了顯示新聞記者是目前台灣民眾不信任的對象外，也透露出另一個不受民眾所信任的對象，那就是政府官員。其排名幾乎皆是墊底的，與新聞記者輪流為最後一名。

台灣近二十年來無論在政治以及社會都歷經許多的變遷情況，包括在政治上已完成三次政黨輪替，逐步邁向民主政治之途。然而憲政體制改革、統獨意識衝突、社會貧富不均以及貪污腐化等問題均影響政治的順利發展（王業立編，2017）。期間包括 2006 年的「反貪污紅衫軍」事件以及 2014 年「太

¹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 <http://www.humanrightwatch.cc/?p=24064#more-24064>

陽花學運」都對台灣的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台灣歷年政治大事紀詳見附錄一。

至於在媒體產業發展方面，台灣新聞媒體長期以來受到學界與社會大眾的批判。自從有線電視日益普及之後，尤其是電視媒體進入惡性競爭時代，導致媒體內容競逐庸俗而新聞內容八卦化。期間 2005 年發生台灣假新聞始祖之「腳尾飯」事件，2012 年則接續發生「旺中案」以及「反媒體壟斷」事件，引發社會輿論。台灣歷年媒體大事紀詳見附錄二。

上述或許可以部份解釋民眾於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的態度，也同時引發本研究試圖探討媒體信任和政治信任的變遷情形與兩者之間的關聯。有關媒體信任與政治信任的討論至少有二派的說法。「媒介抑鬱論」認為媒體多報導政治的黑暗面會降低民眾的政治信任。而「良性循環說」則認為無論媒體是正面或負面報導政治，都會增進民眾對於政治的參與以及政治信任感。而縱觀目前國內、外的研究可以發現，政治信任感與媒體可信度經常被作為兩個獨立的變項來探討。政治學者經常研究政治信任，並且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去觀察個人因素與結構因素對於政治信任的影響。而媒體可信度的概念則被廣泛運用在傳播領域當中，觀察新聞內容對媒體可信度所產生的影響，鮮少研究探討媒體信任與政治信任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開啟媒體可信度與政治信任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契機，並試圖以跨年代資料分析兩者關聯之長期變遷趨勢。

貳、文獻探討

一、媒體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

傳播學界對於媒體信任多以「媒體可信度」做為評估。學者們將可信度（credibility）視為是一種閱聽人對於訊息傳遞者相信程度的評價，其評估並非針對訊息本身的價值（actually quality）來評估，而是針對訊息來源的「可靠性」（trustworthiness）或「專業性」（expertise），來進行主觀性的認定。若

是要將可信度做更為精簡的定義，可稱其為閱聽人對訊息的「認知可信度」（perceived credibility; Freeman & Spyridakis, 2004; Gaziano & McGrath, 1986; Hovland & Weiss, 1951）。現今，隨著網路迅速發展以及社群網站的興起，造成訊息的生產方式出現改變，使用者自身可自行生產內容並且傳遞給任何人。這樣的模式使得學者們開始關心這些使用者產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的真實性，此因素的出現也驅使可信度的定義產生改變，更將之後的研究焦點轉為關注訊息本身的價值（Li & Suh, 2015）。

過往有關媒體可信度的測量大致可分為「相對可信度」與「絕對可信度」兩種。由於兩者各自都有缺失，因此同時測量可以彌補兩者之間的不足。相對可信度是指，同一件新聞事件，在不同類型的媒體報導上產生矛盾、不一致時，閱聽眾對各類型媒體所做的可信度評估（Schweiger, 2000）。整理過去相關文獻，可以發現在測量相對可信度時，研究者會直接向受試者詢問：「如果您發現報紙、雜誌、廣播或電視對同一件事情報導不同時，請問您會相信哪一種媒體？」

最早應用相對可信度來進行測量的是 Roper 機構。自 1950 年代起，Roper 開始為電視資訊局調查美國民眾對各類型媒體的可信度差異來進行比較，即是採用此方法。透過詢問美國民眾：「當不同類型的媒體報導同一事件，報導產生差異時，你會相信哪一種媒體？」。歷年來的研究結果均發現電視的可信度已超越報紙可信度，成為美國最被民眾信賴的媒體類型，廣播位居第三，雜誌則是排名最後。也因為這種測量方式最為簡易，且定義最為明確，因此最常被學術界拿來做使用（羅文輝、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2003）。

由於，Roper 機構是美國史上最久且最大規模的長期調查機構，再加上相對可信度操作上較為簡單易懂，因此也成為往後媒體可信度研究者主要參照的範本，但這樣的問法卻也隱藏著不少缺失。有學者認為，這樣的詢問方式，僅只能針對事情報導不同時做出比較，無法反映在報導相同時，受試者較相信哪種媒體（Cater & Greenberg, 1965）。

Greenberg & Roloff（1974）也批評 Roper 機構並未提供認知參考點，會使得受訪者對題意產生誤解，像是對電視的認知可能為全國性電視網，對報紙卻是地方性報紙，這樣的比較方式，會使得結果產生嚴重的誤差。

另外，相對可信度的測量尺度畢竟是一種順序層次，除了無法真正了解閱聽人對各類型媒體的相信程度，只能了解內心中的排名之外，也無法知道各類型媒體之間的差距。因此，有許多學者為了改善此問題，於是發展出絕對可信度的度量方式，以補足相對可信度的缺失。

Cater & Greenberg(1965)為了彌補相對可信度的缺失，因此修正了 Roper 機構的相對可信度問法，提出了新的測量方式——絕對可信度。絕對可信度是指，研究者直接讓閱聽人對不同類型的媒體所呈現的新聞內容可信程度，直接進行評分 (Schweiger, 2000)。整理過去相關文獻，發現測量絕對可信度時，研究者通常會直接向受試者詢問：「請問您對報紙、雜誌、廣播或電視的新聞報導，相信程度從 1 到 10 分，您會給幾分？」(徐美苓，2015)。這樣的詢問方式，除了能了解閱聽人對媒體的排名之外，也能了解各類型媒體間的實際差距。這樣的研究結果也證實，採用不同的問法，會有不同的結果出現，像是若以 Roper 機構的問法，得到的結果會是相信電視的人比相信報紙的人多了一倍；但改採絕對可信度的問法，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差距有縮小，分別為 82%相信電視，68%相信報紙。

基於上述，本研究採用「絕對可信度」，進行趨勢分析，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 1：台灣民眾對於報紙、電視、雜誌、廣播、網路可信度的趨勢為何？

二、政治信任 (political trust)

政治信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資源，也是一個國家的公民願意誠實付稅以及接受政府政策的基礎 (Hertherington, 2005)。在定義上，政治信任是人民對於政府和政治機構的信任態度。公民依據心中的期望對於政治體系進行主觀的評價。換言之，政治信任是公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評價，也就是認為政府即使在不刻意監督的情況下也能正確施政。

在民主國家，政治信任是維持政府正常運作的重要基礎。雖然學界對於政治信任要達到何種程度才能使得政權正常運作仍具爭議。但是較一致的共識是低度的政治信任會造成政治體系的不穩定（Parry, 1976）。

政治學界依據制度理論觀點認為政治信任會受政治環境所影響，主要因政府績效成果而生成（Norris, 2000）。意即政治信任是基於民眾主觀地對政府績效表現所給予的評價，若政治績效良好則能增加信任，反之則對政府產生懷疑與不信任，而這樣的信任感很容易受到政府短期表現而產生改變。像是政府在施政的表現上不如預期，或者是民眾對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評價不高，又或者是政府的操守出現問題，如貪污、醜聞等，都會使民眾對政治產生不信任。

Feldman（1983）認為美國民眾的政治信任低落，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於現任民選官員以及制度的不滿所致。其中，民眾不滿國會一是導致政治信任低落的主要原因。Hetherington（1998）根據美國當時的社會環境，提出影響政治信任感的因素包含：國內、外政策滿意度、政府效能的認知、世界觀、新聞媒體的報導與評價。

國內研究方面，盛治仁（2003）之研究指出，台灣先前歷經政治制度的轉變，像總統直選、國會改選與政黨輪替等，使得台灣民眾對於政治信任感趨向於不穩定以及退步的趨勢。陳陸輝（2006）的研究結果則發現受訪者對於經濟情況的回溯性評估，也是會影響政治信任的關鍵。若受訪者相對於先前，經濟狀況有改善，則政治信任感會提高；反之，若相對於先前，經濟狀況倒退，則政治信任感會降低。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8）的研究指出，政府的績效表現，會影響民眾對於政治的信任感。譬如民眾對於政府舉辦的選舉、公民投票過程以及對於正副元首槍擊事件處理的滿意度上，皆會對民眾政治信任感產生顯著地影響。

至於政治信任測量的對象，學界多根據 Easton（1965）所提出的政治系統論檢視民眾對於三種不同政治對象的信任，分別為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體制（regime）與執政者（authorities）。

政治社群是以政治分工而形成的一群人，其成員間透過多元的政治關係集結在一起，一同追求該體系的政治目標。簡言之，即大眾對於其所屬政治

群體、疆界的認定與態度傾向，如國家榮譽感、國家認同等，屬於長期、穩定的偏好態度。在操作上，其測量題目大多是詢問：「是否以國家為榮？」、「是否願為國家而戰？」等。

政治體制是指憲法秩序，包含價值與規範。其中價值表示人民日常生活與行為的基本原則；規範則是人民可接受的程序與行為的界線。簡單來說，即是良好的政治體制能讓社會階級有良好的流動，也能使人民之間的關係較為和諧，遇到糾紛時，司法體制能給予公正的判決。在操作上，其測量題目大多是詢問：「是否認為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體？」。

執政者是指能制定或是執行決策，承擔政治後果且具有權力的人。也就是說，執政者是人民對政府執政結果的評估，包括政治制定的能力、道德操守、效率、政策推動的正確性及是否能謀求一般民眾的福祉等。人民會檢視政府施政的效率面與公開面，包含是否是出自於私利或是別有用心，都會是影響民眾對政治的信心程度。此層面也反映出政治信任除了是民眾對於政府的評價之外，也包含人民對於政府情感上的喜惡，是屬於短期和易變的支持，與政治體制與政治社群的支持相反 (Cappella & Jamieson, 1997; 陳陸輝, 2003)。在操作上，其測量題目大多是詢問：「是否相信政府首長說的話？」、「政府是否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等。

綜合上述，本研究僅針對執政者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分析台灣民眾長期對於執政者的政治信任分佈情形，因此本研究第二項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 2：台灣民眾政治信任的趨勢為何？

三、政治信任與媒體信任

Dunleavy & O'Leary (1987) 認為民眾對於政治的接觸與參與，大多數皆來自於傳播媒介的呈現，並非直接接觸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因此傳播媒介對於政治資訊的傳遞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影響閱聽人對於政治的態度。

有關媒體信任與政治信任的關聯至少有二派的學說。有一派學者認為大眾媒體會對政治態度形成負面影響，並將此影響定義為「媒介抑鬱論」(media malaise theory)。此派學者認為媒體對於政治有越來越多的負面報導時，會使

民眾內心產生負面的印象，對於政治感到失望，覺得政治是黑暗的，進而對政治失去信心（Robinson, 1976）。O'Brien（2009）也發現媒體長期對於政策議題做負面的報導，會降低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感。

但是另有一派學者認為，媒體的報導方式對政治信任議會產生正面的影響，他們將此定義為「良性循環論」（virtuous circle theory）。此派學者認為媒體對於政治議題的呈現不論好壞，都能激發出民眾對於政治的參與。當媒體報導負面時，會使得民眾更願意投入監督政府的角色，希望實踐自己的公民權，讓政府不肆意妄為；當媒體報導正面時，會使得民眾對於政治產生期待，進而提高其政治涉入感，甚至直接參與政治（Norris, 2000）。

Tsfati & Cohen（2005）指出民眾對於媒體的信任程度不僅影響其媒體使用行為民眾，也是影響民主制度信任的重要因素。有研究發現美國民眾長期以來對於新聞媒體的不信任是造成美國政治系統兩極化的主要促因（Ladd, 2012）。

Ariely（2015）藉由 32 個歐洲國家的調查資料，並且運用多元比較法進行跨國比較，探討各國民眾對於報業的信任感以及政治信任感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受到不同的媒體環境所影響。研究發現報業的信任感與政治信任感呈現正相關，但相關程度會因每個國家的媒體環境情況有所差異。該研究發現新聞媒體越專業和自主的國家，其媒體信任和政治信任的關聯越弱；而兩者關係越強的國家通常是媒體與政黨關係密切之平行結構（press/party parallelism）。因此媒體信任和政治信任關係太緊密未必是好事，反而可能限制媒體監督政府的作為。

國內研究方面，劉嘉薇、黃紀（2010）利用二手資料分析，透過陳義彥與陳陸輝於 2004 至 2006 年所做的「我國大學生政治價值與態度的持續與變遷-大學四年社會化過程之研究」全國性調查，試圖從媒介政治資訊的角度，討論政治信任感的持續與變遷，另外也加入社會結構因素、政黨認同因素做探討。研究發現大學生對媒介公正性評估越高，政治信任感也會隨之提高，符合「良性循環論」的觀點。而在政黨認同因素上，發現偏綠支持者，接觸頻率高且認為媒介公正時，政治信任感比接觸頻率低者更低，則較為符合「媒介抑鬱論」的觀點。

上述研究僅能獲得關於台灣大學生對於政治信任與媒體公正性的觀察。而且媒體公正性僅為媒體信任概念的其中一個面向，並無法代表整個媒體信任的概念。因此，本研究運用全國性調查資料，以各個媒體的可信度作為自變項，政治信任為依變項，探究兩者之關聯。本研究提出第三個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問題 3：在不同的年度媒體可信度和政治信任關聯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調查資料

有鑑於台灣近二十年來，整個社會變遷十分巨大，在政治與傳播層面產生何種變遷？各層面變遷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議題。因此本研究將採取縱貫性資料分析，期望能提供有價值的科學實證紀錄。

本研究採用由中研院所主持的五年一次「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2003 年和 2008 年調查，以及 2015 年與 2018 年由科技部所進行的「台灣傳播調查資料庫」全國性調查，共計四年的全國性資料做分析。這四年的調查樣本抽樣方式是以台灣地區年滿十八歲及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為研究母體，並以台灣地區戶籍資料檔為抽樣名冊（sampling frame），利用分層等機率三階段抽樣法（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抽出受訪對象。實際抽樣執行程序是依據人口特性、商業發展、公共設施、財政狀況、地理環境等相關指標，將台灣各鄉鎮分為七層。在抽樣時，先計算各分層所有鄉鎮之人口數，依其人口數比例來分配各分層欲抽出之人數，並在各分層中依人口數多寡而抽取一定數目的鄉鎮市區；其後，在每一鄉鎮市區中，再依人口數之多寡依照等距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有系統地抽取一定數目的村里；最後，在前述中選村里中再同樣依等距抽樣法抽取一定數目的受訪個案。四次調查的基本資料詳見下表。

表二：四次調查基本資料

年份	受訪年齡	樣本數	完訪率	調查期間
2003	18 歲以上	2,161	54.0%	2003/08/10~2003/10/24
2008	18 歲以上	1,980	43.0%	2008/07/20~2008/08/24
2015	18 歲以上	2,002	29.8%	2015/11/14~2016/01/15
2018	18 歲以上	2,028	28.4%	2018/07/04~2018/10/11

二、變數測量

（一）媒體絕對可信度

絕對可信度是指，研究者直接讓閱聽人對不同類型的媒體所呈現的新聞內容可信程度進行評分（Schweiger, 2000）。因此在問卷中，請受訪者各別針對報紙、雜誌、廣播、電視與網路媒體所報導新聞的整體表現給予評價，從 0 分代表最不可信，100 分代表最可信。

（二）政治信任

本研究分析台灣地區民眾近幾年對於執政者的政治信任分佈情形。本研究將政治信任定義為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以及相信政府首長在媒體上的發言，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兩個陳述句，並加總後成為「政治信任」。各年度政治信任指標之 Cronbach's α 信度值依序為 .65（2003 年）、.74（2008 年）、.70（2015 年）、.71（2018 年），均達到可信的程度。

（三）控制變項

本研究整理過去研究，發現影響政治信任的因素如下：

1. 人口學變項

從文化理論角度來看，政治信任之所以會產生變化，是因為人會隨著人生成長，各種經驗的累積，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價值體系與政治態度，因此會對政治有自己獨特的看法（Mishler & Rose, 1997）。陳憶寧、羅文輝（2006）的研究結果發現，性別與年齡皆對政治信任產生影響。在性別方面，男性相對於女性而言，政治信任度較高；在年齡方面，年齡越長，信任感越強烈。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8）的研究則指出，教育程度是影響政治信任的因素，小學教育程度比大學教育程度對政治信任的程度較高。

2. 政黨傾向

陳陸輝（2006）以及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8）的研究皆發現黨派立場會對政治信任態度產生顯著影響力。當執政黨與自己的黨派立場相同時，則較信任政治；若執政黨與自己黨派立場不同時，則傾向不信任。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政黨傾向作為控制變項，探討媒體可信度對於政治信任的影響。

肆、資料分析

一、各媒體可信度趨勢分析

從表三可以發現不論是在哪一年的調查，若以 60 分為信任基準的話，各媒體多呈現在及格邊緣，約 55~65 分的區間之中，顯示出台灣民眾對於媒體的信任感並不高。而且整體媒體可信度有逐年降低的趨勢。至於比較各媒體可信度，皆以電視的可信度高於其他媒體。四年調查各媒體總平均數依高低順序分別為電視、報紙、廣播、網路、雜誌。

若針對各媒體本身的逐年比較，可以發現報紙在 2015 年時達到高峰 64.9 分，其餘三次的調查中，皆呈現上下震盪的情況，且都處及格邊緣。

在電視方面，可以發現電視可信度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從 2003 年 70.9 分為最高點，自該年起電視的評價便一路下滑，更在 2018 年跌落谷底。

網路是在 2003 年調查才開始測量。其表現在台灣民眾心中是不及格的，僅有 53.6 分，低於基本分數，但在後續兩次的測量中表現較佳，2008 年並超過報紙成為僅次於電視的媒體，分別為 2008 年的 66 分、2015 年 60.3 分。2018 年則下滑至不及格的分數。

雜誌如同網路一樣，也是在 2003 年起才開始測量。雜誌表現不理想，2003 年 54.5 以及 2008 年的 55.8 分，皆是低於及格分數的，但到了 2015 年時突破及格線達到 62.1 分，但是 2018 年又降至最低的 54.4 分。

最後在廣播的部分，在 2003 年最初的測量有 61 分的表現，但到了 2008 年時為 59 分，低於及格分數。2015 年分數提高至 63.7 分，但於 2018 年又跌到不及格的 58.7 分。

綜合而言，五種媒體的可信度有逐年下滑的趨勢。而電視在四次調查總平均分數居各媒體之冠。

表三：各媒體可信度統計表

年份/媒體	報紙	電視	雜誌	廣播	網路	平均值
2003	63.6	70.9	54.5	61.0	53.6	60.7
2008	61.2	67.0	55.8	59.0	66.0	61.8
2015	64.9	65.9	62.1	63.7	60.3	63.4
2018	62.3	63.8	54.4	58.7	59.8	59.8
平均值	63.0	66.9	56.7	60.6	59.9	61.4

註：分數為 0~100 分，60 分為可信任基準。分數越高代表可信度越高。

二、政治信任度趨勢分析

首先從「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福利」的題項觀察，可以發現在這四次的調查當中，台灣民眾皆是傾向不同意的態度，並且在 2008 年時達到了最低的 2.70。2015 年時，稍微提高與 2003 年同樣的水準，回升到 2.81，而於 2018 年達最高程度之 2.83。若從「政府首長在媒體上所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

的題項觀察，台灣民眾在這四次的調查中依然是呈現不信任的態度，而且逐年下滑，從 2003 年的 2.76，2008 年的 2.51，到 2015 年的 2.36，最後到 2018 年僅剩 2.30（詳見表四）。

整體而言，台灣民眾在政治信任的態度上，均傾向不信任，且逐年下降，從 2003 年的 2.82，到 2008 年的 2.61，2015 年的 2.59，最後到 2018 年的 2.57。顯然台灣民眾長期以來對於政府呈現不信任的態度。

表四：政治信任度之趨勢

年度	2003	2008	2015	2018
政府會為全民謀求最大的福利	(M=2.81, SD=.87)	(M=2.70, SD=.99)	(M=2.81, SD=1.09)	(M=2.83, SD=1.17)
政府首長在媒體上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	(M=2.76, SD=.85)	(M=2.52, SD=.90)	(M=2.36, SD=.91)	(M=2.30, SD=1.01)
政治信任	(M=2.82, SD=.75)	(M=2.61, SD=.84)	(M=2.58, SD=.88)	(M=2.57, SD=.97)

註：「政府首長在媒體上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之題項在 2003 年測量時採用四點量表，為求數值統一以加權方式處理。

三、媒體可信度與政治信任關聯分析

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統計分析四個年度媒體可信度與政治信任的關聯。第一階層輸入人口學變項，包括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第二階層輸入政黨傾向。第三階層則輸入五種媒體的可信度。

表五顯示在 2003 年時，第一階層中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的人口學變項為教育程度 ($\beta=-.10$, $p < .001$)，即教育程度越低，對政治信任也就越高。階層二加入在政黨傾向，可以發現年齡 ($\beta=.07$, $p < .05$) 和教育程度 ($\beta=-.06$,

$p < .05$)具有顯著預測力，而政黨傾向為泛藍($\beta = -.15, p < .001$)與泛綠($\beta = .15, p < .001$)皆能對政治信任感產生顯著的關聯。政黨傾向越偏向藍者，越不信任政治；而在政黨傾向偏向越傾向綠者，越信任政治。第三階層加入媒體可信度，年齡($\beta = .09, p < .01$)、教育程度($\beta = -.08, p < .01$)以及泛藍傾向($\beta = -.17, p < .001$)泛綠傾向($\beta = .15, p < .001$)依然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媒體可信度中只有電視可信度($\beta = .07, p < .05$)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民眾對於電視的可信度越高，就越相信政治。

在 2008 年時，階層一中人口學變項上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的變項為年齡($\beta = .16, p < .001$)，即代表年齡越長，對政治信任感的程度也就越高。階層二加入政黨傾向後，年齡($\beta = .12, p < .001$)依然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而在政黨認同上，泛藍($\beta = .19, p < .001$)與泛綠($\beta = -.08, p < .01$)政黨傾向皆能有效預測政治信任，即越偏向泛藍者對政治的信任程度越高，而越傾向泛綠者，對政治信任的程度越低。階層三加入五種媒體可信度，年齡($\beta = .13, p < .001$)、泛藍傾向($\beta = .15, p < .001$)以及泛綠傾向($\beta = -.09, p < .01$)依然具有顯著預測力。在五種媒體可信度中，報紙可信度($\beta = .14, p < .001$)以及廣播可信度($\beta = .08, p < .05$)顯著地正向預測政治信任。民眾越相信報紙以及廣播兩種媒體，就越信任政治。

在 2015 年時，階層一中沒有任何人口學變項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階層二加入政黨傾向時，依然沒有任何變項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階層三加入五種媒體可信度，電視可信度($\beta = .24, p < .05$)和網路可信度($\beta = .16, p < .05$)皆可以正向預測政治信任，但是廣播可信度($\beta = -.24, p < .01$)卻是負向預測政治信任。這顯示民眾對於電視和網路的可信度越高，政治信任感越高；對於廣播的可信度越高，則政治信任感越低。

在 2018 年時，階層一中人口學變項中只有教育程度($\beta = -.08, p < .05$)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度，意即教育程度越低，政治信任度越高。階層二加入黨傾向後則沒有任何變項可以顯著預測政治信任。階層三加入五種媒體可信度則僅有電視可信度($\beta = -.18, p < .001$)可以非常顯著地預測政治信任。民眾對於電視的可信度越高，其政治信任度就越高。

綜合上述，在人口學變項中，年齡在 2003 以及 2008 兩個年度皆能正向顯著預測政治信任，因此年齡越長，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教育程度則僅在 2003 年負向預測政治信任，意即教育程度越低越信任政治。此一結果符合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8）之發現。可能的推論是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於政治事務的認識較深。對政府的表現亦多持批評態度，呈現較不信任的態度（王中天，2010）。

至於在政黨傾向方面，2003 年時由民進黨執政，在政黨傾向上就可以發現，泛藍傾向者對政治不信任，而泛綠傾向者對政治較信任。但到了 2008 年，台灣社會經歷第二次政黨輪替，改由國民黨執政，此時泛藍傾向者轉向對政治感到信任，而泛綠傾向者則在 2008 年持不信任的態度。因此當執政黨與自己偏好的政黨符合時，政治信任感會越高，反之當執政黨與自己偏好的政黨不符合時，則越不信任政治。政黨傾向在 2015 年與 2018 兩個年度均不具有預測力。

綜合四年的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報紙可信度僅有在 2008 年時具有顯著預測力，且與政治信任呈正相關。在廣播可信度方面，在 2008 年與 2015 年均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在 2008 年時呈現正相關，但是在 2015 年卻呈現負相關。電視可信度除了 2008 年以外皆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且呈現正相關。

表五：政治信任之迴歸分析

政治信任				
年度	2003	2008	2015	2018
階層一：人口學變項				
性別	.02	.06	.06	-.01
年齡	.09**	.13***	.12	-.01
教育程度	-.08**	.00	-.01	-.07
R ²	.02	.02	.02	.01
階層二：政黨傾向				
泛藍	-.17***	.15***	.10	-.05
泛綠	.15***	-.09**	-.00	-.01
Incremental	.06	.05	.01	.00
R ²				
階層三：媒體可信度				
報紙可信度	.07	.14**	.08	-.08
電視可信度	.07*	.07	.24***	.18***
雜誌可信度	.04	.00	-.01	.03
廣播可信度	-.01	.08*	-.24***	-.05
網路可信度	.01	.04	.16*	.07
Incremental	.02	.07	.13	.03
R ²				
Total R ²	.10	.14	.16	.04

註：表內數值為最後階層標準化迴歸係數值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結論

本研究透過四次調查資料的分析，長期觀察媒體可信度的變遷趨勢。分析結果顯示各媒體之可信度逐年下滑，而目前都在及格的邊緣。顯然台灣民眾對於媒體的信任度有待加強，也代表台灣媒體正面臨信任的危機。

而這樣的結果也符合相關文獻所顯示，大多數台灣民眾認為媒體新聞內容缺乏專業性、記者問的問題沒深度，且大多皆以娛樂八卦與政治口水為主。不但從媒體無法獲取實用資訊，而觀看新聞演變成是為了打發時間和娛樂消遣之用。新聞媒體已缺乏應有的功能性，並喪失扮演第四權的角色（林照真，2009；陳憶寧，2011）。

媒體可信度的低落反應台灣媒體生態的變遷情形。在報紙媒體方面，2001 年之後「壹週刊」與「蘋果日報」陸續成功來台發行，並以誇張的報導手法與吸睛的圖片，吸引閱聽人的目光，也直接影響台灣報紙新聞的報導方式，使得資訊娛樂化，開始朝向感官主義的發展（王泰俐，2004）。自此之後在強調訂閱率的情況下，各報新聞標題聳動、錯誤報導與捏造新聞的情形也明顯增加。除此之外，新聞集團逐漸被財團整併，如旺旺集團入主中時、中天與中視；宏達電入主 TVBS 電視台等，皆對新聞產製產生衝擊，違反學者提到的媒體應與政治與財團脫鉤，以維持新聞自主的原則。陳炳宏（2009）指出媒體集團化與產權集中化將會影響媒體呈現多元性的內容，且會避重就輕，隱瞞部分的事實。上述現象極可能直接影響民眾對於媒體可信度的評價。

綜觀各媒體可以發現電視可信度長期以來均位居龍頭的寶座。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媒體的可信度時有高低，卻只有電視可信度一路下滑。自 1993 年起，台灣通過有線電視法後，電視台的出現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導致諸多電視台分食固定的廣告量。為了能生存下去現今的電視媒體越來越趨近於商業化。此外，電視媒體為了滿足使用者對於娛樂的需求，因此會對於新聞報

導誇張化或戲劇化來吸引眼球。根據國家通訊委員會申訴廣電內容案件數統計，近幾年最高的類型是電視新聞報導內容不實或不公。²

至於在網路可信度方面，資料顯示網路可信度在 2003 之調查中敬陪末座，但隨即於 2008 年調查中躍升為可信度第二名，僅次於電視可信度。到了 2018 年，網路可信度也超越廣播與雜誌兩個媒體，排名第三。這顯示網路雖然已成為民眾相當依賴與使用頻繁的媒體，但是透過網路所獲的資訊卻令人難以相信。尤其是近年來假新聞在網路上極為氾濫，充斥在各大社群媒體，也影響了網路的可信度。

在台灣民眾政治信任方面，資料顯示民眾對於政治信任的態度傾向於不信任。這與先前的研究結果相符合（林聰吉，2012；陳陸輝、陳映男，2012）。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政府首長在媒體上所說的話是可以相信的」自 2003 年到 2008 時下降幅度最大，顯示出台灣政治領袖在人民心中是不被信任的。

在 2006 年時，第一家庭女婿趙建銘因涉嫌台灣土地開發公司內線交易案，導致台灣民眾對第一家庭的印象大為反感，亦使得陳水扁的形象大受打擊。不久之後，前總統陳水扁旋即爆發「國務機要費案」、「龍潭購地案」以及「101 買官案」，涉嫌貪汙洗錢以及偽造文書與多項罪名，第一家庭的負面形象又再度浮上檯面。2008 年林益世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因協助中鋼下游廠商續約為由，坦承向該公司索賄遭到起訴。同年，蘇治芬因涉嫌收賄，遭檢察官起訴。在短短的兩年期間，爆發出一連串的弊案，導致台灣當時陷入政治黑暗期。

這些弊案與貪汙的情形，皆影響民眾對於政治人物形象的評價。當這些形象差的政治人物在媒體上公開發表時，民眾也就不會願意相信他們所說的話。

至於影響政治信任的因素方面，在 2003 年時，政黨傾向越藍者，越不信任政治，而政黨傾向越綠者，則越相信政治。主要因為當時是由民進黨執政，因此政黨傾向偏向泛藍者較不信任民進黨政府，反而是政黨傾向偏向泛綠者較為信任。在 2008 年時，政黨傾向為泛藍者，越能有效預測政治信任的態

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媒體申訴案件統計資訊，參見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

度。2008 年台灣政治面臨第二次政黨輪替，歷經民進黨政府八年執政後，改由國民黨執政，泛藍支持者對於國民黨的執政充滿著期待，因此政黨傾向越傾向泛藍者對於政治信任的態度就會越高。另外，在深藍支持者中，普遍年齡較長，因此年齡也成為顯著能預測政治信任的變項。此結果符合陳陸輝（2003）提及政治信任除了是民眾對於政府的評價之外，也包含人民對政府情感上的喜惡。若執政黨是民眾所支持的政黨時，政治信任程度就會較高或不明顯。反之，執政黨並非民眾所支持的政黨時，政治信任就會較低。不過受訪民眾之政黨傾向在 2015 年以及 2018 年不再影響政治信任程度。這可能因為台灣已歷經二次政黨輪替成為常態，政黨傾向不再對於政治信任產生影響。

在媒體可信度和政治信任之關聯上，本研究發現在 2003 年時，僅有電視可信度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即受訪者越覺得電視可信度高，越覺得政治是值得被信任的。在 2008 年，報紙以及廣播可信度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表示當報紙或廣播可信度越高，政治信任程度越高。在 2015 年時，廣播和電視可信度成為政治信任的顯著預測變項，但兩個呈現相反的發展。電視可信度越高，越信任政治；但廣播可信度越高，越不信任政治。最後在 2018 年時，則僅有電視可信度能顯著預測政治信任。

綜觀四次調查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媒體信任與政治信任之間的正向關係與 Ariely（2015）所做出的研究結果一致，也較為符合「良性循環說」的觀點。唯一不同的是，廣播的可信度在 2015 年時，與政治信任呈現負向關聯。

這或許與台灣地下電台的現象有關。台灣在國民黨長期執政時代，電子媒體掌握在黨政軍手中，未見頻道開放。因而自 1990 年代起地下電台紛立，節目大多以批評時政為主。地下電台在各種選舉期間，尤其是扮演政治競選的工具（陳清河，2004）。譬如 2004 年三一九槍擊案，地下電台不斷宣稱是大陸所為。而 2006 年黃俊英走路工事件，地下電台則運用選舉語言催票（諸葛俊、黃于恬、汪明生，2012）。在 2015 年調查時，正值總統大選前一個月。當時地下電台普遍對執政之國民黨不滿，且持續發揮其針砭時事的功能，批

判執政黨的親中、賣台，這可能使得閱聽人在收聽地下電台的廣播之後，會降低對政府的信任感。此種現象較符合「媒介抑鬱論」的觀點。

綜合而言，本研究之發現提供有關台灣媒體評價與民主政治發展的觀察與深思。本研究呼應 Ariely (2015) 的研究，民主社會中的公民傾向對於政治較不信任，而且媒體信任和政治信任的關聯不高。一個社會的新聞媒體越不受到政治和經濟因素的限制，越能朝專業的方向盡其監督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台灣電視媒體長期以來與政治信任的關聯較其他媒體密切，顯示民眾越相信電視則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而電視也是所有媒體中可信度最高者。因此，若是電視媒體能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專業精進與改革，促使其成為民眾獲得精確與充分政治資訊之管道，進而能對於政治體系進行理性評價，應該有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

最後，本研究限於二手資料庫之跨年代分析，各項變數之測量方法受到限制。首先在媒體可信度的測量方面，本文為了跨年代之比較僅採取絕對可信度的測量而有所不足。此外政治信任包含的面向很多元，完整的政治信任測量指標還包括對於各種政治機構的信任度評量。然而本研究卻僅能針對二個項目之加總作為測量，因為只有這四年的調查包含一致性的政治信任測量，因此難以掌握政治信任的全貌。建議未來研究能夠針對兩項概念進行更細緻的測量與分析。

參考書目

- 〈台灣社會信任調查〉(無日期)。取自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網站
<http://www.humanrightwatch.cc/?p=24064#more-24064>
- 〈媒體申訴案件統計資料〉(無日期)。取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1153&is_history=0
- 王中天 (2010)。〈當社會信任遇見政治信任—對政治文化觀點的整合與檢驗〉，《台灣民主季刊》，7(4):47-83。
- 王泰俐 (2004)。〈電視新聞節目感官主義的初探研究〉，《新聞學研究》，81:1-42。
- 王業立編 (2017)。《政治學》。台北：晶典文化。
- 林照真 (2009)。《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林聰吉 (2012)。〈台灣民眾的機構信任以媒體信任為分析焦點〉, 地《東吳政治學報》, 30(1):43-79。
- 徐美苓 (2015)。〈影響新聞可信度與新聞素養效能 因素之探討〉。《中華傳播學刊》, 27:99-136。
- 盛治仁 (2003)。〈台灣民眾民主價值及政治信任感研究—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選舉研究》, 10(1):115-169。
- 陳炳宏 (2009)。〈媒體集團綜效偏差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 16:77-213。
- 陳清河 (2004)。〈還原媒體的時代形貌—台灣地下電台運動史流變的再論述〉。《台灣民主季刊》, 1(3):165-201。
- 陳陸輝 (2003)。政治信任、施政表現與民眾對台灣民主的展望〉。《台灣政治學刊》, 7(2):149-188。
- 陳陸輝 (2006)。〈政治信任的政治後果—以 2004 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台灣民主季刊》, 3(2):39-61。
- 陳陸輝、陳映男 (2012)。寧信地方, 不信中央: 政治信任的類型及其政治後果。《社會科學論叢》, 6(1):15-57。
- 陳憶寧、羅文輝 (2006)。〈媒介使用與政治資本〉, 《新聞學研究》, 88:83-134。
- 陳憶寧 (2011)。〈探索政治議題感知的世代差異—一個媒介效果的觀點〉。《台灣民主季刊》, 8(2):39-181。
- 諸葛俊、黃于恬、汪明生 (2012)。〈地下電台傳播行為對台灣高雄地區公民社會影響之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 20(1):15-150。
- 劉嘉薇、黃紀 (2010)。〈持續與變遷—政治資訊對大學生政治信任感影響之定群追蹤研究〉。《政治學報》, 50:111-146。
- 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 (2008)。〈選舉事件與政治信任: 以 2004 年總統選舉為例〉。《問題與研究》, 47(3):29-50。
- 羅文輝、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 (2003)。〈媒介依賴與媒介使用對選舉新聞可信度的影響: 五種媒介的比較〉。《新聞學研究》, 74:19-44。
- Ariely, G. (2015). Trusting the pres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ndition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25(3), 351-367.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R. F., & Greenberg, B. S. (1965). Newspapers or television: Which do You believ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1), 29-34.
- Dunleavy, P., & O'Leary, B. (1987).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NY: Macmillan.
- Easton, 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Feldman, S. (1983). Th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Methodology*, 9(3), 341-354.
- Freeman, K. S., & Spyridakis, J. (2004). An examination of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51(2), 239-263.

- Gaziano, C., & McGrath, K. (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45-62.
- Greenberg, B. S., & Roloff, M. E. (1974, November). Mass media credibility: Research results and critical issues. *News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rs Association*, 6, 1-48.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4), 791-808.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vland, C. I., & Weiss, W. (1951).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4), 635-650.
- Ladd, J. M. (2012). *Why Americans Hate the Media and How It Matte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 R., & Suh, A. (2015).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vidence from Facebook Pag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72(Supplement C), 314-328.
- Mishler, W., & Rose, R. (1997). Trust, distrust and skepticism: 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2), 418-451.
- Norris, P.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S. (2009, January). Political conflict, the media,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USA.
- Parry, G. (1976). Trust, distrust and consensu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 129-142.
- Robinson, M. J.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2), 409-432.
- Rudolph, T. J., & Evans, J. (2005). Political trust, ide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660-671.
- Schweiger, W. (2000). Media credibility—experience or image? A survey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orld Wide Web in German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1), 37-59.
- Tsfati, Y., & Cohen, J. (2005).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of 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 The case of Gaza Settler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0 (4): 28–51.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A longitudinal Study

Chiao-An Wang & Song-In Wang

ABSTRACT

Media trust and political trust are both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trust and political trust is rare.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from 2003 to 2018 using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Media credibility was measured by asking respondents to score from 0 points (least credible) to 100 points (most credible) the overall news coverage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radio stations, TV channels, and Internet sites. Political trust was measured by asking respondents to indic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greed with two statements using a 5-point Likert-type scale: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create maximum welfare for the people” and “W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say in the media is believable.” The two scores were then averaged to create the measure of political trust.

Analyz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and the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we found that respondents evaluated low levels of both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with levels declining year by year. The results show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V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a finding that fits the “virtuous circle theory.” Data also show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o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which fits the “media malaise theory.”

Keywords: media credibility, political trust, longitudinal study,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

* Chiao-An Wang, MA 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ong-In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telsiw@ccu.edu.tw

附錄一：台灣歷年政治大事紀

1996	首次總統直選	李登輝、連戰當選
1997	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中，首度超越國民黨	
2000	台灣首次政黨輪替	陳水扁、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
2001	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	民進黨成為國會最大黨
2004	三一九槍擊案	
2004	陳水扁、呂秀蓮連任正、副總統	
2005	廢除國民大會	
2005	2005 三合一選舉	國民黨取得 14 個縣市長 民進黨取得 6 個城市
2006	總統親家趙玉柱涉及台開股票內線交易	
2006	第一家庭女婿趙建銘違反證交法起訴	台開案終結
2006	百萬人民反貪腐運動	
2006	基隆市長依貪汙治罪條例判刑確定	
2006	國務機要費案終結，陳水扁與吳淑珍涉嫌貪汙及偽造文書	
2006	國民黨立委何智輝，以貪汙、背信等罪，判刑確定。	
2007	馬英九涉及特別費案，依貪污罪起訴	
2007	經濟部常務次長因涉及工程弊案遭收押禁見	
2007	呂秀蓮、游錫堃及陳唐山依貪汙罪嫌起訴	呂秀蓮為時任副總統 游錫堃為民進黨黨主席 陳唐山為國安會秘書長
2008	馬英九、蕭萬長當選正、副總統	
2008	反黑心顧台灣大遊行	表達對政府的兩岸、經濟與食安方面施政不滿
2008	前總統陳水扁收押禁見	
2008	雲林縣長蘇治芬依貪汙治罪起訴	
2010	前總統陳水扁因龍潭購地弊案及 101 買官案，遭判刑確定。	
2011	前第一夫人吳淑珍判刑確定	
2012	馬英九、吳敦義當選正、副總統	國民黨取得國會多數
2012	林益世坦承貪汙索賄	

2013	馬（英九）王（金平）政爭	
2014	太陽花學運	要求逐條審查海峽兩岸 服務貿易協議
2015	台南市議會議長賄選案，四人遭收押 禁見	李全教、蔡啟新、楊明 達、林聰彬
2015	前新北市副市長許志堅涉嫌收賄遭 收押禁見	
2016	蔡英文、陳建仁當選正、副總統	政黨輪替 民進黨取得國會多數
2017	同婚合法化	正反意見分歧
2018	九合一選舉	

附錄二：台灣歷年媒體大事紀

年份	事件	備註
2003	三法整併及黨政軍退出媒體修正	黨政軍退出媒體部分完成三讀
2005	腳尾飯事件	東森新聞 S 台被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撤銷牌照。
2005	新聞局進行換照引發爭議	七個頻道未通過審核停播 台灣言論自由環境受到批評，也有人認為是媒體亂象的回應
2007	周政保影帶事件	史鎮康自導自演，TVBS 多名主管及總經理下台負責
2007	NCC 認定 TVBS 內部新聞控管失靈，裁罰 TVBS 與 TVBS-N	
2010	放寬黨政軍進入媒體門檻修正案	暫停推動立法
2012	旺中案	NCC 決議，有條件性通過
2013	反媒體壟斷法修正案	遭國民黨擋下，以議事程序封殺此案
2018	廣電三法修正草案	建立公平上下架機制、分組付費機制、反媒體壟斷等條例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檔案與再檔案之間*

井迎瑞**

本文引用格式

井迎瑞 (2021)。〈檔案與再檔案之間〉，《傳播、文化與政治》，15:115-131。

投稿日期：2021 年 7 月 19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本文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開始撰寫，2021 年 7 月 18 日完稿，疫情之下完成了給自己的功課。

**作者井迎瑞為國家電影資料館前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榮譽教授、台灣電影文化資產保存協會理事長、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創辦人、館長；2014 年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2021 年第一屆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影視聽遺產保存貢獻獎」，e-mail：rayjiing@gmail.com

《摘要》

對於檔案館或博物館而言，蒐集典藏品、藝術品、文獻並建立檔案（或稱資料庫），是最基本的功課，此過程涉及方法、技術與施作程序，除了實務面的考量之外，更涉及對於檔案的美學與哲學性思考；本文要討論的即是典藏品、藝術品、文物或電影，從被發現之後，離開原來所在的檔案（資料庫），被遷徙、轉移、入藏進入另外的檔案裡面，或建立新的檔案，這種現象有可能重複多次的發生，這樣做法是今天檔案館（資料館），博物館運作的常態，這外觀似乎平淡無奇，使用者也習以為常，管理者除了遵循檔案化的工序之外，還可能會有那些人文思考？檔案與再檔案這個行為的本身代表何種意義？檔案與再檔案之間出現的裂縫能否乍現春光？能否讓我們窺見博物館背後所隱藏的秘密？本文以電影蒐藏家博物館的電影器材、戲服、文獻等三個檔案（資料庫）為例，說明檔案的發現、轉移、入藏等再檔案的過程，不是價值的逃逸路線，而是再脈絡化的過程，藉此建立新的話語系統，激活想像擴大影響。

關鍵詞：再檔案、再脈絡、遷徙

壹、前言

檔案是一個封閉的空間，是一個自我完成的話語系統與表述方式，這種話語系統是依靠著檔案內部的物件與物件、藏品與藏品間，某種生動的內在連結得以建構完成，而當整個話語系統被建立之後，檔案的邊界就可被打破，就有了向檔案之外擴延的力量，蓄勢待發，這些內部的物件，藏品便有了跨界與檔案之外的世界對話的可能，所以檔案是從「所指」到「能指」的轉變過程。

貳、音像紀錄、影像維護與電影蒐藏家博物館

我 1996 年參與了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的籌設，創辦了音像紀錄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往後的幾年裡，隨著紀錄所的發展，使我看見設所時對於紀錄片的理解與論述，需要跟著時代變化而有所更新，音像紀錄研究所在 2009 年增加了「影像維護組」，所名也改為「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這樣做的原因是鑒於台灣媒體環境的改變，紀錄的工具由機械改為電子，紀錄的媒材由類比改為數位，工具變得輕薄短小，媒材變得方便經濟，拍攝紀錄片的門檻因而大大降低，過去以呎計價，錙銖必較的拍攝行為，現在改成開了機就能長期跟拍的參與式觀察，紀錄者短時間內就累積大量素材，衍生出檔案的儲存，管理，再使用的問題，甚至檔案本身也成了一種文本，兼具了敘事功能，因此紀錄片的拍攝衍生出了檔案管理的問題，顯然作為一個研究所對於檔案的理解，乃至於紀錄與檔案關係的研究認識論上已經有所不足，都必須盡速地跟上；鑒於紀錄（拍攝）與檔案（管理）是有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一個原本主張紀錄片作為方法的研究所，認識論不足之外，方法論上也必須增加「影像維護組」以為因應，音像紀錄研究所於 2008 年經過教育部的核定增加影像維護組，2009 年招開始收第一屆研究生，在 2011 年有了影像維護專業第一屆的畢業生，這個以研究電影資料館學 *archive studies*

為主的學科，在台灣甚至在兩岸高教體系中都是首創。從 2009 至 2021 年也匆匆 11 個年頭，這段時間以來除了對於先前設定的影像檔案維護的目標之外，隨著對於檔案的型態，載體，與物質性的理解，而擴大到了對於所有電影文化資產的維護保存，其領域也涉及到了後端的展示問題，自然而然影像維護也和博物館學有了交集。

2016 年，我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退休，獲得了富邦文教基金會的支持，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設立了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這是一個以收藏電影蒐藏家和他們的蒐藏品的博物館；我希望讓民眾欣賞這些蒐藏家的收藏品，並且透過這些蒐藏品來理解電影史，所以 2016 年成立了電影蒐藏家博物館，把我 10 年來的蒐藏品在電影蒐藏家博物館設立展廳展出¹；主要有三個展廳，陳列三個蒐藏家的三個資料庫，分別是：黃仁與他的藏經閣（文獻）、陳成昕的敦煌寶庫（器材）及李衍宏的戲服世界（戲服）。這三個資料庫都是我近十年來經手所收藏，希望讓世人透過這些物件去重新理解電影史²。

一、黃仁與他的藏經閣（文獻）³

黃仁（1925-2020）本名黃定成，福建省連城縣人，一生從事電影評論、電影史研究，持續累積史料與檔案長達半世紀，為建構台灣本土電影史觀打下基礎，他的著作等身均以歷史研究著稱，他命名自己的資料室為「黃仁電影資料館」，足以凸顯他對於史料的重視，生前居住於台北市，九十高齡仍持續讀書寫作。2012 年由我本人出面洽談之下，黃仁先生將畢生五千餘冊的電影書籍與二百餘個電影檔案捐贈予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並在我努力之下在校內設立「黃仁書房」，並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於電影學術的貢獻。2017 年經黃仁先生授權，本館獲得「黃仁電影資料館」全部復刻版檔案夾，

1 因為我自己也是個蒐藏家，有一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趣味。

2 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官網，<http://www.fcm.tw/index.html>

3 同上。<http://www.fcm.tw/halls.html>。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官網文字均由本人親自撰寫。

陳列台北文創大樓 4 樓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展廳，讓這些檔案永續為台灣電影研究發揮功能。

二、陳成昕的敦煌寶庫（器材）⁴

陳成昕（1925–2015）是大基影業和大基貿易行的創辦人，該公司成立於 1960 年代中期，是日本 IBIGAWA CARBON 炭精棒的台灣總代理，60、70 年代台灣電影業一片榮景，炭精棒放映機又是電影院放映主流，大基影業業務因此迅速成長，後來開始跨足其它電影器材業務，最具規模的是電影鏡頭，因為陳先生年事已高，且因健康因素，2000 年初期已結束營業。2014 年我率領了南藝大的研究團隊，打開了位於在台北市信陽街大基影業舊址地下密室的鐵門，裡面蒐藏了大量的電影鏡頭與攝影機，不但分類清楚且有恆溫恆濕的控制，規模十分驚人，儼然發現一座電影鏡頭的敦煌寶庫。經過登錄與整理這些鏡頭陳列於台北文創大樓 4 樓本館展示，並做推廣電影教育之用，不但讓這些鏡頭有了第二生命，也讓陳成昕與大基影業的名字不會被遺忘。

三、李衍宏的戲服世界（戲服）⁵

李衍宏（1926–2017）本名李芥園，湖南邵陽人，從事電影戲劇服裝工作超過五十年，經歷台灣電影、電視各個不同時期發展，對台灣電影事業的發展貢獻良多。李師傅從入行到退休，一路經歷了古裝武俠電影、抗戰愛國電影、健康寫實主義電影、台灣新電影，其所參與的電影與戲劇總數超過一百部，因此他從事電影服裝的歷史，就是一部台灣電影發展的歷史。而李師傅金宏服裝社中的大批電影戲服，更成為台灣電影史的另一種載體與資料庫，李師傅於 2013 年退休後，金宏服裝社所有 10000 件戲服，在我努力之

⁴同上。

⁵同上。

下所幸沒有分散，悉數由電影蒐藏家博物館蒐藏，使李師傅所建構的戲服資料庫得以創造永續價值，李師傅其人其事也不會被遺忘。

貳、原初檔案 (original archive)、再檔案 (re-archiving) 與再生檔案 (regenerate, recreated archive)

檔案、再檔案，是指整個檔案的遷徙過程，包括了檔案之接收與搬遷，並且在不同的環境脈絡中重新檔案化，建立一個全新的檔案，在檔案化的過程代表了一種價值的轉換，它不僅是地點的轉變，也可能建立一個與原來目的、宗旨、甚至方向都可能迥異的檔案，例如大基影業的器材、金宏服裝社的戲服，原來檔案的目的是為了產業，是為了營運，是為了租售，但是再檔案之後，它的目的是為了教育推廣和文創產業，價值取向也改變。

至於再生檔案，是指檔案之再生，在檔案維護整理之後，因而產生了許多附屬檔案，或者次級檔案、亞檔案，例如大基影業的電影器材大批量的接收、典藏、搬遷，但在整理之後產生許多新的物件或者新的檔案。例如大基影業檔案類別與數量龐大，這些項目經過清點維護，甚至修復之後，會產生許多新的物件或者新的檔案；黃仁先生的檔案是有關電影資料史料與文獻，這些文獻經過了整理、掃描、複製成為兩套，甚至多套複製品便於異地典藏以及推廣之用，這些再製與派生的檔案，這叫做檔案之再生，或者叫做再生檔案。

檔案最初典藏的地方，也是檔案原初被發現之處，是第一次檔案，也是依照原來初始典藏者的需求與目的而建立的檔案，首先我們針對這些原初檔案的數量、類別、內容，進行測繪、登錄，做基本了解，就有了原初的檔案，在深入研究之前設法重建這些檔案當初建立的脈絡，從這些脈絡中來對於檔案進行了解，這就是做脈絡化的研究。當脈絡化之後對於檔案本身新的理解，又增加了我們對於當時大環境與時代脈絡的理解，於是這樣脈絡與檔案，檔案與脈絡互動式的理解，就更能夠增加對檔案的理解，這就是辯證性的理解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當原初檔案被發現之後可能會被蒐藏、轉手、遷徙或是複製，這裡就牽涉到了再檔案，再重脈絡化的做法，這做法甚至會不斷發生下去，文物從原先墓穴的隨葬品出土，成為文人墨客、皇親國戚及富商大賈的收藏品，再幾經轉手成為博物館的典藏品。這都是檔案與再檔案的過程，不僅是地理位置的改變，它的意義和它的脈絡，以及它們的觀眾也隨之改變，從藝術品，收藏品本身而言，他們的接觸面因而擴大了，他們原先的檔案意義也改變了。

而所謂的遷徙 (migrate) 在本文中有兩個含義，第一個含義是指物理上的搬遷 (relocate)，另一個含義是指媒體變遷中，信息從一個媒材轉移到另一個媒材的過程，另一種說法叫做「拷貝」(copy) 或「複製」(reproduce)。產生的新檔案與它的新環境，新脈絡之間出現新的扞格，然而在互動學習之後逐漸消除了這種障礙，而達到了和諧與辯證後的統一，這些檔案將以新的面貌面對世人。

一、檔案與再檔案之間

指的是整個檔案的遷徙、接收與搬遷，並且在不同的脈絡中進行再檔案化，也可稱之為「二次檔案化」，再檔案化有時性質單純，可能只是典藏地點的轉變，同性質蒐藏者之間的買賣、出讓或物權的轉移，也可能是比較複雜的價值轉換，例如代表電影蒐藏家博物館蒐藏品的三個展廳，分別從原初典藏地點遷徙並重新建檔而來，它們不僅是物理環境的改變，更因為牽涉到博物館與蒐藏者目標不同，而必須將檔案重新整合，剪裁、更新、再檔案化，使其服膺於新的蒐藏者之價值取向。

至於再生檔案，是指檔案之再生，指的是在檔案維護整理之後，因而產生了許多附屬檔案，或者次級檔案、亞檔案，例如大基影業的電影器材大批量的接收、典藏及搬遷，但在整理之後產生許多新的物件或者新的檔案。例如附圖顯示大基影業的物件檔案經過維護整理，甚至修復之後，會產生許多新的物件或者新的檔案；黃仁先生的檔案是一些電影資料與文獻，這些文獻經過了整理，掃描，複製成為兩套，甚至多套複製品便於異地典藏以及推廣之用，這些再製與派生的檔案，這叫做檔案之再生，或者叫做再生檔案。

黃仁的資訊檔案：原來名稱為「黃仁電影資料館」，位於台北市大安區區仁愛路三段 x 巷 x 號 4 樓

大基的器材檔案：原來名稱為「大基貿易行」，位於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 11 之 2 號

金宏的戲服檔案：原來名稱為「金宏泰服裝社」，位於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126 號 2 樓

三個原初電影檔案分別位於台北市大安區，萬華區，中正區，它們的位置相距不遠，距離台灣電影事業之都的西門町也很近，如果把當時掌管台灣電影事業的行政院新聞局也置入這份文化地圖的話，一個十分形象化描繪台灣電影產業的拓撲學輪廓就清晰浮現：

行政院新聞局電影事業處（政策）⁶：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天津街 2 號（裁撤時地址）

大基距離新聞局 800 公尺，步行 11 分鐘⁷

金宏距離新聞局 2.5 公里，車行 6 分鐘

黃仁寓所距離新聞局 2.8 公里，車行 5 分鐘

從四者的地理位置我們看見了一個台灣電影事業發展的產業地圖，一葉知秋，從這份地圖中看見了他們之間一種共生關係，其中除了黃仁先生資料的蒐集是經過我和黃先生本人討論了多年之後才執行的移交，其餘大基、金宏的檔案蒐集都是突發事件，大基貿易行的陳成昕先生由於健康因素而結束營業多年，並在過世之後，我才協助家屬把所收藏品、器材、機具等打包移交，屬搶救性的蒐集；金宏泰服裝社的李衍宏師傅雖然是生前把所有戲服轉交給我，然而當時他已經將近 90 歲高齡，並且雙目失明，所以這樣的轉移也是屬於搶救性的蒐集；當我在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重新建檔，並建立詮釋資

6 新聞局於 2012 年 5 月 20 日裁撤，改為在行政院本部內設置發言人辦公室，電影業務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取代。

7 使用 Google 地圖估算。

料時，我驚覺這幾個檔案原來的地點竟然相距那麼近，甚至於與主管電影事業的官署也緊密相連，台灣電影曾經輝煌從這份地圖中可見端倪，這些公司行號與機構，他們地理位置看似巧合的背後，恰巧說明了一個電影產業鏈的存在，這些民間公司或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基於需要與方便，逐漸往西門町集中，這是一個緩慢的型塑過程，我的搶救是偶然，但反證了電影產業共生的必然歷史。

然而由於時代的變遷，傳統電影產業的沒落，導致與原初的檔案必須轉手，先是到了學界——台南藝術大學，建立了不同的脈絡，最終來到了松菸文創園區的電影蒐藏家博物館：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 4 樓之 6，檔案內的物件大體上沒有改變，但是它的架構與脈絡改變了，同樣的物件、藏品，但是機構的宗旨改變了，他們不再是為了服務電影產業，而是進駐了松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這些檔案經過重新編碼、整合、增刪、分類等再檔案化過程，它們不再是直接服務影視產業支援電影公司拍片的目的而存在，而是為了彰顯文化園區發展文創產業的價值取向而定名為博物館，檔案的目的從租售而改變為展覽，讓參觀者看見電影的發展歷史，回顧電影紀錄真實與再現真實的原理，用欣賞感恩的心再次看見電影的價值。也由於再檔案的機遇，檔案的邊界也隨之打開，與新的觀眾群互動，與整個創意社群（不僅是影視業界）跨領域的互動，希望各領域的創意人員，藝術家互相碰撞，把各領域的藝術元素成新組合，甚至相互融合，或許能產生什麼新的藝術產品，甚至於新的藝術形式。

下個階段電影蒐藏家博物館正在規劃成立社區性的微型電影博物館，預期將會進行再次的檔案化與再次的脈絡化，然而每次的變動，都預示著可能的發展與創新，再檔案與再檔案之間，會有新的挑戰與新的機遇發生，檔案與再檔案之間，造就了物件的流通性，也增加了能見度與影響力，擴大了接觸的人群，打破了固定化的觀眾群與觀看脈絡。一次再檔案化就是一次與原來脈絡的斷裂，也是一次意義的迸發與翻新，否則文物就會靜靜的留在原處，等待著歷史的輪迴，或是等待著千年以後再次的出土，我是積極而樂觀的看待變動與再檔案這件事。

松菸文創園區原來是一個製菸廠，一個製造香煙的地方，但是廢棄多年之後改為了文創園區，從建築群本身的翻修重劃，就是一個再檔案，再脈絡化的過程，原來的意義不在了，原來製造香煙的意義和目的也消失了。不管是電影器材、電影戲服、電影文獻等三個檔案，都因為了創意產業而再生，建立了新的脈絡，賦予了新的意義，今天進出文創園區的人不再是菸廠工人，也不再是貿易商，接觸整個園區的使用者也都變了，面向的是開放、多元、實驗性的未來。

松山文創園區是黃仁、大基及金宏檔案再檔案化的發生地點，其位置與三個原初檔案的位置也相距不遠，電影蒐藏家博物館選擇進駐松山文創園區從物理環境，到價值取向兩個維度而言，都代表著承先啟後，延續歷史，創造未來的新使命。

大基距離松菸 6.8 公里，車行 11 分鐘

金宏距離松菸 6.6 公里，車行 10 分鐘

黃仁寓所距離松菸 2.4 公里，車行 7 分鐘

二、檔案的內與外

檔案內部的物件及藝術品，他們之間的關係再現了某種的內在邏輯，換言之，這些物件是依據某種想象而安置在一起，從意義的動蕩，歷經了辯證的發展，而最終到達了一種和諧狀態，「人不能踏在同一條河兩次」⁸，一切萬物皆流動，不斷的變動才是世間不變的真理，所以和諧是要通過競爭才能達到，只有正反兩極不斷的辯證，才能達到統一與和諧。我也引用這個概念來論證檔案也是一個競爭的場域（contest terrain），檔案內部典藏品的選取與淘汰（inclusion/exclusion），檔案內部與外部邊際的消長與變化，都是屬於話語權爭奪的範疇，檔案/再檔案，脈絡/再脈絡，代表著話語權之變動，也代表著意義躁動之後的和諧，如河水般的變動發展，永無止修。

⁸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之名言。

檔案，不管是帝王的陵寢，或是帝王生前把玩的多寶閣，檔案內部物件的排列都有它的邏輯，它代表了一種宇宙觀，是理想中的極樂世界，一直到有一天，由於盜墓，或是考古發現⁹，這些物件進入了收藏家的手中，或是進入了博物館的檔案或資料庫裡面，慢慢的由於教育與研究的開展，也由於檔案與世人之相處，逐漸被觀眾所理解接受，而形成了新的和諧關係，檔案的內與外也形成了一種新的連結；物件和物件之間的關係叫做故事，物件與外界的關係叫做歷史，關注檔案內部物件的解讀叫做微觀，關注檔案外部歷史語境，以及在此語境下對於物件的解讀叫做宏觀，故事與歷史也都是在變動中發展。

三、以書架為例

我舉書架為例便於形象化思考，書架既是一個封閉，又開放的價值系統，但是必須先要有封閉，然後才能夠開放，根據每個人的興趣、偏好、理想及預算，精挑細選，滾動式發展，不斷的擴充；一個書架代表一個世界觀，書架的物質空間有限，書本必須精挑細選，所以空間是封閉的，但意義是開放的，從封閉作為起點，而走向無限；藏書有不同規格、版型、語言，每個人依照書籍的內容、主題、作者、出版社、叢書等因素挑選，並分門別類的放到一起，或是分別儲存。書架內部也有自己的框架與空間，書本與書本之間，或緊緊密排列沒有縫隙，或者稀疏鬆散，甚至不經意歪斜著，不論外觀如何，都有著一種邏輯與內在含義，讓它們在此相遇；他們此刻都是處於一種安定與和諧的狀態，所以這個書架雖然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但是他都代表了一個鮮活的價值系統與世界觀。

⁹ 盜墓，考古發現，對於墓主人而言都是擾動，不同的是盜墓是為著私利存在的偷盜行為，不是為了採集古代歷史與文化信息，反而因為盜墓，古代歷史與文化信息遭到破壞；考古發現是對於古代遺存的探勘組織化的研究行為，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存在，為的是採集歷史與文化信息，增加對於古代社會生存方式與社會結構的了解。

書本和書本之間，物件和物件之間，藝術品和藝術品之間的連接關係，具有敘事性（narrative），而這個書架世界又與外在的環境脈絡發生了辯證的關係，環境脈絡就是時間和空間的脈絡，若要理解書架的意義，就必須把這個書架放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來理解，這個書架放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裡，和放在另外一個時空裡所產生的意義是不同的，換言之，如果把書架搬到另外一個地點，或者另外一個時空環境，它的故事與它的敘事意義會不同，生產出來的價值也會不同，例如同一個書架放在某個時空裡可能代表「前衛」，而放置在另一個時空裡面則代表「懷舊」，所以書架必須從封閉走向開放，滾動式發展擴充典藏。書架和檔案一樣，需要不斷地再檔案，與日俱進，日久彌新，書本與書本，物件與物件之間有一種生動而活潑的邏輯把它們連結在一起，隨著時間進程書架的意義會慢慢凸顯，意義會逐漸滋長發酵，這些意義和外在環境的碰撞，也會形成了一個新的脈絡，話語也隨之更新。

四、檔案的意義是浮動的

檔案的意義會隨著脈絡改變而改變，檔案的內/外關係討論完之後，最後也要考慮人的因素，檔案最後是要為人服務，因此不能排除「人」這個維度，也就是要為人服務的初衷，檔案與再檔案次數越多，表示活動程度越大，或者較中性的說，就是檔案內部之間，外部之間的關係互動更為緊密，否則檔案 archive 會是靜止的，那麼這些收藏品就會變成隨葬品一樣，一藏就是幾百年，所以從檔案的角度，從博物館的角度，這樣的遷徙與斷裂是好的。例如，木乃伊，離開了金字塔埃及法老王的墓穴裡面，敦煌莫高窟的大量文物與畫卷被伯希和、斯坦因帶到了歐洲的博物館，都代表了一種脈絡的斷裂，在歐洲的博物館中又產生了新的脈絡，從民族主義的角度，這都是掠奪，是不好的。但是在這種再檔案的過程中，反而讓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口看見了這個文物，這種檔案與人類的關係變成更為活躍，而不再只是深埋地下，從這樣的例子，我們看見了檔案的價值。

大基位於信陽街，金宏位於西寧南路，都位於西門叮的電影區或鄰近地區，二者之間的距離不到 2 公里，他們的檔案是為了服務電影的產業，距離

松煙文創園區大約 7 公里，取用的人口，觀賞的人口也改變了，反而是因為再檔案的過程，讓他們的接觸人口擴大，邊際被打開了。

參、結語

檔案的選取與淘汰，檔案邊際的消長與變化都是話語權的爭奪，當檔案和脈絡的關係被確立之後，最後還要加上一層人的角度，建立檔案要有人本的思想，要有以人為本的觀念，要把人的角度，人的視野加入到這一個理解與再檔案的行為中，這個人不是空洞的人，是要活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之下的一個人，不是抽象的人，人才是檔案的主體，人有一種主觀的覺知，是人要來使用這個檔案，人來理解這個檔案，來欣賞這個檔案，所以人為主體的這個面向，在理解檔案與再檔案的過程當中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脈絡的三維度體現，產生出了立體化的脈絡，有些是看得見的，有些是看不見的，展廳、場域、人，是看的見，史觀是看不見的，但是存在的；本文概略說明了個人作為一個教育者，檔案維護者的專業探索，也描繪了一個研究所的轉變與發展經歷，或許對於同儕有參考的價值，它既非主流的電影教育的逃逸路線，也非傳統博物館學的思考模型，它不可諱言的具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又具有不可多得的實驗價值，鬆動了原先的電影教育與博物館學的界限，而可能出現的一種新範式，這種靈活度或許也能夠給此階段的文化創意產業帶來一些省思。

。

A Look at the Ar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Ray Jiing*

ABSTRACT

For archives or museums, collecting objects, arts and crafts, documents, and establishing databases, archives and repositories are the most basic tasks; this process involves methods, techniques, and professional procedures. Archiving is not only about practical means,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hind the process itself. Objects, art works, cultural relics, or film, from their initial discovery, leave their original repository then migrate and transfer into another repository, a common practice that repeats itself many times through institutions and generations.

This essay tries to ask questions around humanistic thoughts that buttress the archival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c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Can the space between the archiving and the re-archiving shed light upon such philosophical, aesthetic or humanistic practices? Can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have a glimpse of the secrets behind the museum? This paper takes the Taipei Film Collectors' Museum's three collections of apparatus, costumes, and documents as an example, to reveal and explain how the discovery, migration, acquisition, and other archival work, is not the lessening of value, but rather the process of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enrichm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discourse, to activate the imagination, and to disseminate the influential work of an archive.

Keywords: migrate, re-archiving, re-contextualization

*Ray Jiing, Honorary Professor, National Tain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rayjiing@gmail.com

附圖：

說明：同一批蒐藏品先後被不同的機構收藏而進入不同的檔案

圖一：大基貿易原始檔案



圖二：南藝大媒體中心檔案



圖三：電影蒐藏家博物館檔案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四期
2021 年 12 月

新聞自由還是專業倫理？

中天新聞的書面鑑定與親身體驗

陳順孝*

本文引用格式

陳順孝（2021）。〈新聞自由還是專業倫理？中天新聞的書面鑑定與親身體驗〉，《傳播、文化與政治》，14:133-150。

投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10 月 25 日。

*陳順孝為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 e-mail：chen328@gmail.com

《摘要》

我擔任中天新聞台換照聽證會鑑定人，閱讀超過兩千頁資料，發現中天宣示的理念、自訂的法規、建立的品管機制都可圈可點，但它的實質表現，卻天差地別。中天一再觸犯「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等法規，被裁罰的次數和金額，都是所有新聞台之最，連自家新聞都錯報謊報。我因此認定，中天沒有守住新聞專業倫理底線。

聽證會後，NCC 決定不予中天換照；中天反彈，把我列為攻擊對象之一。中天及其所屬的旺中媒體集團，污蔑我的延遲直播建議是效法中共媒體、謊稱我引用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聲明已被總部收回，罵我「很瞎」、要我道歉；我沒有想到在書面鑑定之後，還要以親身體驗，見證中天新聞的專業淪喪、內控失守。

關鍵詞：新聞自由、新聞自主、新聞倫理、媒體自律、事實查證

壹、挑戰

2020年9月下旬，接到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邀約，請我擔任中天新聞台換照聽證會的鑑定人，我陷入長考，因為一旦接受邀請，我就會捲入今生最大的爭議之中。

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規定，電視執照有效期六年，屆滿前須向 NCC 申請換照，換照先由以外部委員為主的諮詢會議初審，再由 NCC 委員會議複審。中天新聞台上次換照是 2014 年，當時因違規次數和罰款金額為所有新聞台之最，初審時，六票對五票，多數反對換照；複審時，NCC 同意換照，但附加四條件：辦理員工訓練、強化倫理委員會、補實編審人員、落實獨立審查人制度，要求半年內達成（劉子維，2014 年 12 月 3 日）。

2020 年 12 月 11 日，中天新聞台執照又將到期，再次申請換照。中天這六年的違規次數和罰款金額仍是所有新聞台之最，而且上次換照要求半年內落實的獨立審查人制度，它延宕到 2019 年才設置；八月初審會議，九票對三票，三分之二委員反對換照，NCC 委員會議預定 11 月複審做出決議。此案關係重大，NCC 決定召開成立以來第一次換照聽證會，邀請中天代表、利害關係人、證人和鑑定人對話，作為複審會議決策參考（TNL 編輯，2020 年 10 月 20 日）。而我就是 NCC 邀請的鑑定人之一。

我第一時間婉拒。一來認為有多位學者比我更能勝任，二來聽證議題有數項超出我的專長領域，三來是否換照要考量的因素太多，我難以做判斷。NCC 聯絡人告知，我認為更能勝任的學者有的擔任初審委員、有的曾和中天所屬的旺中集團有過衝突，都不適合當鑑定人；鑑定人只需鑑定自己專長的議題，不需回應所有問題，也不必對是否換照做出判斷，NCC 委員自會參考鑑定報告和其他資料，做出是否准予換照的決策。

我還是猶豫。中天換照案，已經引爆兩種信念的對立，一方認為新聞自由至高無上，無論新聞台表現如何，政府若不讓它換照，就是打壓新聞自由；另一方認為新聞自由不能無限上綱，新聞台是社會公器，有專業倫理底線，失格者應該退場，才能守住底線、遏止沉淪。兩方針鋒相對，誰也說服不了

誰。我的觀點傾向後者，是眾多論者之一，但若出面當鑑定人，恐將成為箭靶。

我私心希望遠離紛爭、平靜生活，但又覺得不能憂讒畏譏、臨事退縮，在校園踱步長考，最後決定接受邀請、承接挑戰。

貳、書面鑑定

NCC 很快寄來資料光碟，內容包括中天新聞台 2014 年換照計畫書和審查意見、換照後半年執行報告、2020 年換照計畫書和補正資料、前一次評鑑報告書及評審意見，以及中天營運不當監理紀錄、NCC 歷次委員會議紀錄、中天歷次到會陳述紀錄，還有中天前次執照和本次執照期間，所有新聞台被裁罰的明細和比較、中天倫理委員會會議紀錄；此外，還有王立強指控中天接受中國資助及中天說明、《金融時報》指稱中共國台辦對旺中媒體下達編採指示及中天說明、中國旺旺公司財報揭露與中天公司關係人交易案。內容龐雜，單單 2020 年換照計畫書就超過一千頁，全部資料超過兩千頁。

我逐頁瀏覽、比對、評估。中天接受中共資助和指揮的指控非常嚴重，但沒有直接證據；中國旺旺與中天關係人交易資料，我沒有能力解析；換照計畫書提到的股權結構、財務狀況，也不是我的專長。我不斷篩選、摸索，逐漸將鑑定焦點集中在一個簡單而關鍵的問題：中天有沒有守住新聞專業倫理底線？

一、事實查證

我細看中天提供的資料，它的頻道理念說「真實是新聞的生命」，宣示要提供「正確、多元、客觀、真相」的新聞節目；它訂有新聞自主公約、專業倫理規範、涉己事務新聞製播規範、新聞性政論節目製播準則、新聞事實查證辦法，法規堪稱完備，而且內容可圈可點，例如政論節目製播準則明訂：「針對所有消息來源，注意查證，宜避免單一來源或無根據臆測」；不僅

如此，它還建立四層品管機制，分別由單位主管、編輯和助理總監、編審和副總監、獨立審查人把關，程序堪稱嚴謹。中天若能貫徹這樣的理念、法規、機制，不僅可以守住倫理底線，更能發展成優質新聞台。

但檢視 NCC 的裁罰資料，中天的實質表現，卻和上述理念、法規、機制存在嚴重落差。中天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本次執照生效到 2020 年 10 月 20 日止，共計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等法規 23 次，受罰金額合計 1073 萬元。其中違反衛廣法第廿七條第四款「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高達 12 件、罰鍰 720 萬元；違反第三款「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4 件、罰 180 萬元；違反第二款「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3 件、罰 120 萬元；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款「營運不當，有損害訂戶或視聽眾權益之情事」1 件，罰 50 萬元；另外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1 件，罰 3 萬元。中天被裁罰的次數和金額，均為所有新聞台之最。

這些裁罰公正嗎？我評估沒問題。首先，裁罰並非 NCC 獨斷：NCC 接獲民眾申訴後，會函請新聞台召開倫理委員會討論，再將倫委會報告提請「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審議，這個會議由 51 位專家學者、公民團體代表、實務工作者組成，每次開會隨機邀請 19 人審議，審議結果再送請 NCC 委員會議裁決；其次，受罰的不只中天，截至 9 月 15 日的比較表顯示，最嚴重的中天違規 18 件、罰 913 萬，第二名三立違規 17 件、罰 380.3 萬，第三名 TVBS7 件、罰 123 萬，第四名民視 5 件、罰 190 萬；第三，國民黨執政的 2008 年至 2014 年，中天受罰件數和金額，就是新聞台之冠，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才如此。

實際檢視中天遭罰案件，宣稱 200 萬噸文旦被倒進水庫、鳳梨跌到 1 公斤 1 元，指稱我駐新加坡代表在韓國瑜記者會「盯場」、中央「卡救命錢養蚊滅韓」，都違背事實。最離譜的是，連自家新聞都錯報謊報：2019 年 3 月 27 日，NCC 因中天誣指駐星大使「盯場」、不當報導「異象？！三市長合體天空出現『鳳凰展翅』雲朵」合計裁罰 100 萬元，中天新聞台卻報導成 NCC 「以中天電視因為播送韓國瑜新聞佔比太大等理由」開罰，隔天持續播放「報韓國瑜新聞太多」、「NCC 重罰中天百萬」標題，還子虛烏有地自稱「對於關西機場搜救報導，也被裁罰 40 萬元」。

二、自律內控

這些數據和實例，顯示中天宣示的「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理念、事實查證辦法等法規都形同具文，四層品管機制也形同虛設。不僅如此，中天為了「落實媒體自律機制」而設置的倫理委員會，對 NCC 裁罰案件——特別是新聞性政論節目遭罰案件——的討論決議，也與法律、內規存在重大落差。

例如：2020 年第一次倫理委員會議，討論「大政治大爆卦」節目播出「批評韓國瑜者，由鄰里長發一個月 5000 元」，以及「新聞龍捲風」節目播出「昧著良心批評韓國瑜，但每位成員到 12 月底至少可獲得 10 萬元，最高到 100 萬元薪資」等 NCC 認為違反事實查證原則的案件，倫理委員會的決議是：「這是談話性節目，屬於來賓個人意見表達，本台並沒有違反事實查證」，可是宣稱批評韓國瑜可月領 5000、薪資 100 萬明明是指涉「事實」而非「意見」，倫理委員會的認知顯然有問題。

此外，倫理委員會在 2019 年 5 月通過的新聞性政論節目自律機制，對直播節目「爭議言論」的處理方式為：先以標題或側標提醒尚待查證，事後再進行查證和平衡。我研判「爭議言論」是指民眾爆料、涉及事實的指控，因為純粹言論是個人意見表達，並不需要查證；然而，既然涉及事實，就應該先查證再播出，怎可先播出再查證？我因此認為，中天若不能確保政論節目內容的真實性，應該考慮減少或暫停直播，或者建立類似美國扣應節目的延遲直播機制，延遲七秒或三十秒播出，萬一民眾講出沒根據的指控，可以及時停刪，以免散播謠言、再受裁罰。

三、專業底線

除了上述事實查證問題，中天的涉己報導也是失實失當，它的選舉新聞更嚴重違反公平原則，報導單一政治人物（韓國瑜）的比例曾超過 88%。我

因此認定中天沒有守住專業倫理底線，對聽證議題的第二題和第三題¹提出以下鑑定意見：

第二題：中天新聞台違規受罰次數為所有新聞台最多、違規受罰金額為所有新聞台最高、被申訴的次數也是所有新聞台之冠，違規裁罰案件顯然過多、自律內控機制顯然失能、營運顯有不善之情事。

第三題：中天新聞台之內控機制顯然不足以確保下列事項：(1) 落實節目製作流程自律；(2) 自律倫理委員會有效運作；(3) 獨立審查人有效運作；(4) 改善過去違規情事，並提升新聞專業自主。至於能否「避免外界不當干預新聞製播」，鑑定人從現有資料中難作論斷。

參、毀譽由人

10月26日，我和另外六位鑑定人搭車穿過示威人群，進入聽證會場，在網路直播鏡頭前，宣讀鑑定意見；其他鑑定人分別是：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代表林月琴、台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沈伯洋、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廖福特、東吳大學會計系副教授柯瓊鳳、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副教授陳慧蓉、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郭文忠。

一、聽證迴響

¹ 聽證議題共有八題：(一)中天新聞台是否已履行前次換照之附款與行政指導，及評鑑命改善事項？(二)中天新聞台過去是否有營運不善之情事？違規裁罰案件是否過多？自律內控機制是否失能？(三)中天新聞台之內控機制是否足以確保下列事項：1.落實節目製作流程自律；2.避免外界不當干預新聞製播；3.自律倫理委員會有效運作；4.獨立審查人有效運作；5.改善過去違規情事，並提升新聞專業自主。(四)中天新聞台之人事組織及執行能力是否足以落實營運計畫？財務結構與財務狀況是否健全？其股權結構與負責人是否對新聞獨立製播有不利影響？(五)中天新聞台節目規劃是否落實視聽多元及弱勢保障？(六)中天新聞台員工之勞動權益是否受到確實保障？(七)中天新聞台換照案對國家安全、產業整體發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有何利或不利之影響？(八)中天新聞台換照案就閱聽眾權益、新聞專業自主、節目品質及勞動權益有何利或不利之影響？

聽證議程長達 8.5 小時，鑑定人宣讀意見外，NCC 委員也和中天代表對話。對話中證實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旗下大將邱佳瑜雖非中天人員，卻介入中天新聞製播；廿八日，前立委黃國昌和網路媒體《沃草》揭露蔡衍明和旺中主管的微信群組對話，例如：蔡衍明說「可大批 NCC：一、無格淪為民進黨打手」，邱佳瑜答覆「今晚報和新聞龍捲風都會朝此方向執行」；蔡說「李永萍不支持韓國瑜，暫時不要上節目」，邱答「已交代下去暫不找李永萍」，更顯示中天已經淪為蔡衍明個人傳聲工具。我從資料中難作論斷的，至此趨於明朗：中天無法避免外界不當干預新聞製播（郭伶妤，2020 年 10 月 28 日；國會無雙，2020 年 10 月 28 日）。

聽證過程中，我收到多則私訊，回到家裡，更收到四方湧來的褒貶。有人稱讚我的鑑定報告「寫得真好」，有人肯定我的論證有憑有據；但也有人罵我「綠打手」、「扼殺新聞言論自由」、「東廠廠公」。辱罵我的留言從電子郵件、臉書私訊傳來，也出現在家人、朋友標註我的照片上，更傳進學校網站，還有抗議電話打進學校辦公室；我無法回應沒有論述的謾罵，決定不予理會，家人、朋友支持我，學校也決定不作回應、不轉電話。幾家媒體要訪問我，我也一概婉拒。就這樣，我一直保持沉默，盡量不受毀譽影響，照常工作生活。

二、開釗爭論

11 月 18 日，NCC 委員會議以七票對〇票，對中天新聞台做出「不予換照」處分，理由有四：一是屢次違規及遭民眾申訴，未能落實新聞專業；二是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三是新聞製播遭受蔡衍明、邱佳瑜直接間接干預，違反自訂的新聞自主公約；四是未能具體說明改善可能性（NCC，2020 年 11 月 18 日）。決議一發佈，我的手機隨即響起，有的媒體要我表示意見，有的媒體邀我上談話性節目評論，但我覺得自己想講的，都已經寫在鑑定報告中，且在聽證會宣讀過，因此全都婉拒。

我仔細閱讀各方反應，特別是反對意見。有人認為不續照是民進黨整肅異己，但如前所述，早在國民黨執政的 2014 年，中天違規紀錄就是所有新

聞台之冠，當年初審六比五反對其換照，NCC 最後也僅有條件同意換照，顯示無論藍綠執政，中天的專業表現都禁不起檢驗；有人認為中天的問題，其他新聞台也有，只剝中天不公平，但同樣如前所述，所有新聞台違規都受裁罰，只是中天最為嚴重，今年又輪到換照，其他新聞台將來換照時，同樣要接受檢驗；還有人認為科技進步，衛星廣播電視不再是稀有資源，政府不該再管，應該交由市場決定，但這是重大制度變革，利弊得失有待評估，即使要變，也要修法通過才能變。

在各方評論中，我最佩服的是長期在國際捍衛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四點聲明：（一）新聞自由並非毫無管制，新聞自由——如同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所述——是指公眾有接受正確資訊的權利，並不是指媒體擁有者能散播符合自己利益內容的權利；（二）NCC 審查中天執照符合正當性，由獨立機關對電視台進行定期換照審查，是民主政體的標準作業流程，並未侵害新聞自由；（三）不予換照是極端手段，NCC 應該提供公眾完整資料，證明其合理性，相同標準也要適用於未來不同政治色彩的媒體執照審查；（四）為了滿足公眾接受正確資訊的權利，各政黨與政府應該致力落實新聞倫理和編輯自主²。

RSF 的聲明用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來詮釋新聞自由，第十九條說：「人人有.....尋求、接收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無論是尋求消息和思想的採訪自由、接受消息和思想的知之權利、傳遞消息和思想的出版自由，都是人人擁有的；然而，很少人有足夠的時間、技能、財力來採訪和出版，公眾因此委託新聞媒體，賦予它們採訪和出版自由，換取它們提供正確資訊來滿足知的權利。換言之，公眾才是新聞自由的主人和主體，媒體及其老闆只是受委託者，老闆不能操控媒體造假謀私，喧賓奪主地侵奪公眾新聞自由。

我覺得 RSF 對新聞自由意涵的釐清、對換照標準一致性的要求、對新聞倫理和編輯自主的強調，都切中要害，因此在臉書轉貼全文，貼文很快得到 725 人按讚、35 人按怒、16 人按其他表情，還有 348 次分享、83 則留言。

² 本段為摘要，全文詳見〈RSF statement 無國界記者組織官方聲明〉，網址：
https://rsf.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18_rsf_cti_statement_wu_guo_jie_ji_zhe_zu_zhong_tian_zhi_guan_fang_sheng_ming_.pdf

留言中，有人貼圖按「Good」，有人「無法苟同您的發言內容」；有人主張「民主國家媒體的存廢應交由市場機制去決定，而非動用國家機器審判霸凌」，有人反問「當時為什麼要成立 NCC，為什麼要給他停發權力啊」；有人要求「請用同樣標準檢視三立、民視」，有人回應「其他新聞台只是還沒輪到而已」；有人質疑「贊同關中天是因為他立場跟你不一樣」，有人反擊「2014 年中天就被過半數評分不及格了，是不是也是當時的執政黨介入呢」；意見雖有不同，大致都能理性對話。不過，有人只留一句「這樣新聞學真的教得下去嗎？」，有人直接開罵「根本不配當老師」、「言論自由劊子手」，但也有人喊「老師加油！」。

三、怪奇留言

我瀏覽每一則留言，尊重批評，忍受辱罵。但有兩類留言讓我不解，一類質疑我在鑑定報告提到的延遲直播：「延遲直播另一個意涵形同言論審查，這是很駭人的法西斯思維！」、「延遲直播怎麼做不到，大陸央視都在做啊，他用共產黨的思維放在台灣，多好笑啊」；一類質疑 RSF 聲明的真實性：有人轉貼旺中集團網媒 CTWANT 題為「『NCC 並未涉及侵害新聞自由』 無國界記者組織總部未認可」的報導，質疑道：「所以是誰胡說八道咧？RSF 台灣分會等於全部？或是教大傳的老師查證不足呢？」。

可是延遲直播是美國媒體常見做法，怎會扯上法西斯、共產黨思維？RSF 11 月 18 日在台灣分部 Twitter 發表中文聲明、20 日在總部官網發表中英文聲明和新聞稿，一上網就看得見，怎會是胡說八道？我決定追查這兩類留言起源為何、如何擴散，瞭解誰在造謠抹黑。

肆、親身體驗

一、直播倒退？

我上網搜尋，很快找到質疑延遲直播的源頭。

10月26日聽證會當天，中時新聞網就發新聞質疑「延遲還叫直播」；同日，網路出現眼圖說「NCC認定的民主自由是：學中共的延遲直播？」。27日，中天新聞訪問一位資深媒體人，質疑我的建議是新聞自由的大倒退；同日，中天新聞粉絲專頁剪輯我的發言，打上「事前審查？？新聞自由倒退三十年」標題；也是同日，《中國時報》新聞說延遲直播做法「目前大陸媒體多有採用」，說我的建議引來網民噓聲。28日，中天「新聞深喉嚨」粉專用圖文嘲諷我是「天兵鑑定人」、「效法陸媒？！難道他比較想看央視...?!」、「脫節脫到火星」。此後，中天多次在新聞和節目中嘲諷我提出「很瞎」的建議（李培睿，2020年10月26日；中天新聞，2020年10月27日a；中天新聞，2020年10月27日b；朱真楷，2020年10月27日）。

我無法理解中天和旺中媒體為何如此扭曲。我的鑑定報告說得很清楚，中天若不能確保政論節目內容真實性，應該考慮減少或暫停直播，或建立類似美國的延遲直播機制，延遲直播是美國電視的常見做法，連奧斯卡獎、葛萊美獎頒獎典禮都如此（Matt Carey, 2004, February 5；CNN, 2004, February 4）；公共電視研發部早在2000年發表「Call-in節目的法律問題」一文中詳加討論（胡心平，2000年12月26日），上網檢索 Broadcast delay、Seven Second Delay、Delay-live 7 seconds，更可找到數以萬計的資料，包括延遲直播的用法、演進和技術；而且，就在11月5日，美國ABC、CBS、NBC三大電視網才因川普沒證據的指控美國總統大選舞弊，而中斷川普的直播，顯示專業電視台嚴格把關、不對謠言放水的堅持（胡夢瑋，2020年11月6日）。

延遲直播是否適宜引進台灣，當然可以討論；但要討論，就應該先講清楚延遲直播是什麼。民眾對此可能不瞭解，中天作為電視台，應該不會不知道；就算不知道，記者上網檢索一下，就能瞭解。中天為何不走正道，硬要欺瞞觀眾醜化我？

二、聲明回收？

我也很快就搜尋到質疑RSF聲明真實性的相關報導和節目。

11 月 20 日，中天「頭條開講」節目，一位新北市議員說我自己不寫文章，卻轉貼 RSF 聲明，代表心虛；他還宣稱，在我轉貼後，RSF 台北分部發表正式聲明，說 RSF 從來沒有講過這件事，這代表 RSF 已經認證 NCC 侵害新聞自由，他講話時，電視標題寫著「陳順孝教授引用無國界組織文章...製造假新聞？？」；主持人隨後秀出我的臉書貼文，說 RSF 聲明已經被打臉，我「是不是應該好好的解釋，或甚至是道歉也可以呀」（中天新聞，2020 年 11 月 20 日）。可是他們只要點進我的臉書貼文，就可以超連結到 RSF 總部官網發佈的中英文聲明³，RSF 從未收回或否認四點聲明，中天再一次散播不實謠言。

隔天，中天新聞台播出題為「瞎挺 NCC！無國界記者組織台灣分會挨轟監守自盜」的新聞，又宣稱 RSF 的聲明已被總部回收；主播還說，從 RSF「2019 年舉辦的『第一屆台灣新聞界國際會議』來看，參與討論的人就包括廖福特和陳順孝，這麼巧就是中天聽證會的鑑定人」，接著訪問前政府官員，批評我和廖福特出席 RSF 會議又擔任鑑定人是「監守自盜」（中天新聞，2020 年 11 月 22 日）。可是 RSF 的聲明，明明還高掛在官網上，並未回收；我和廖福特只是 RSF 這個國際會議眾多參與者之一，這個會議也只是我近年參加的數十場會議之一，我在這次會議之外與 RSF 並無往來，擔任鑑定人也與 RSF 無關，憑什麼罵我們「監守自盜」？

上網檢索延遲直播、Broadcast delay，會很困難嗎？點到 RSF 官網確認聲明還在不在，會增加多少工作量？這些舉手之勞，中天記者都不做，就胡亂指控、恣意抹黑；我沒有想到在書面鑑定之後，還要以親身體驗，見證中天新聞的專業淪喪、內控失守。

我不禁為那些誤信中天報導，而來攻擊我、嘲諷我的民眾感到悲哀。他們支持中天老闆操控的新聞自由，中天卻用虛假報導來欺騙他們，剝奪他們「接受正確資訊」的新聞自由。

³ RSF 中英文聲明詳見：

<https://rsf.org/en/news/taiwan-non-renewal-cti-news-channels-licence-does-not-go-aga-inst-press-freedom?fbclid=IwAR1c90DEU0t04pQIKL8LudSZXUXxdJlbIa1gQchm9M8SyftrksIROH0mzds>

三、教不下去？

此外，《中國時報》還在 11 月 20 日發佈題為「校友譴責，陳慧蓉淪負面教材；網友質疑，陳順孝教得下去嗎」的報導，攻擊我和同為鑑定人的文大新聞系陳慧蓉副教授。內容先引述一位文大校友質疑陳慧蓉「行為、立場...都是非常負面的教材」，再說我在臉書貼出 RSF 聲明後，被網友質疑「這樣新聞學真的教得下去嗎」(李侑珊，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文只引述符合旺中立場人士的片面說法和情緒用語，沒有呈現另一方觀點，純然是打擊異己的報導。

這則報導激起傳播學者公憤，中華傳播學會為此在 11 月 23 日發表聲明，強調：「媒體為社會公器，不應以政治立場黨同伐異，報導涉己事務尤需避免對持異見者進行輿論霸凌。傳播學者以其專業對傳播事務進行分析評論、及提供社會大眾專業見解之建議，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所在。本學會基於維護傳播學界擔負社會責任之應有空間與尊嚴，籲請媒體與社會各界，尊重學術專業，重回理性討論」(中華傳播學會，2020 年 11 月 23 日)。

但旺中媒體並未停止攻訐。12 月 15 日，中時新聞網又發佈題為「關台引發老翁輕生等爭議，林麗雲、陳順孝噤聲不回」的報導，說中天不續照「引發一連串爭議，其中包含七旬老翁輕生」，NCC 委員林麗雲和我卻不回覆旺中記者提問，「無視因其所引起的一切動盪紛擾」(李侑珊，2020 年 12 月 15 日)，將中天不續照、老翁輕生的原因和責任，全部推給林麗雲和我，沒有分清 NCC 委員和聽證會鑑定人的權責，更沒有反省中天違法違規、造假造謠的罪咎。

伍、展望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午夜過後，中天新聞台從有線電視平台下架；隨即無縫接軌，轉型為 YouTube 頻道，繼續在無法可管的網路平台播報新聞。中天下架前，曾向法院聲請假處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020 年 12 月 7 日)以

「新聞媒體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即社會公器，其使用及發展應受國家政策與主管機關依法監督」等理由予以駁回；中天不服提抗告，最高行政法院（2020 年 12 月 11 日）再以「對換照申請是否准許，為主管機關裁量處分，並非原則應予許可」等理由駁回抗告。中天終於為它的專業淪喪、自律失控付出代價。

經過換照風暴後，中天會虛心檢討、改進缺失，還是變成脫韁野馬、更趨極端？其他新聞台會知所警惕、提升專業，還是事不關己、依然故我？更重要的，NCC 這次換照審查樹立的四大判準：專業守法、自律內控、新聞自主、改正違規，能不能成為所有新聞台組織運作的標準，能不能在未來不同政治色彩新聞台換照時一體適用，都還有待觀察、監督。

作為鑑定人，我捲入今生最大爭議，在褒貶毀譽間，努力維持內心平靜，繼續工作生活。我生在戒嚴時代，解嚴後進報社工作，經歷黑金政治，於是用十年時間撰寫《新聞控制與反控制》一書，探討在政治、老闆、黑道干預下，如何找到報導真相的空間；2003 年接觸部落格，發現人人可以上網辦報，不必再鑽傳統媒體的縫隙，於是轉向參與公民新聞、獨立媒體、新聞創業；2016 年擔任公視董事，看到專業自主的優質新聞，收視率卻不高，因此推動數位轉型、內部創業，希望讓好新聞被更多人看見。

一路走來，我所認知和追求的新聞自由始終是專業記者的自由、不是豪強巨賈的自由，是報導真相的自由、不是造假造謠的自由，是滿足公眾知之權利的自由、不是滿足老闆私人利益的自由。我因此認為，中天換照案，不是新聞自由問題，而是專業倫理問題，也因此選擇以「中天有沒有守住新聞專業倫理底線？」作為聽證會鑑定重點，更因此認為，NCC 否准中天換照，不是侵害新聞自由，而是遏止專業沉淪。

2021 年 3 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公布世界各國人權報告，提到中天換照案，認為台灣獨立媒體活躍，言論自由不受限制，也無可靠報告指台灣當局箝制新聞自由（張文馨，2021 年 4 月 1 日）；同月，自由之家發表全球自由度調查，台灣比前一年進步一分，以 94 分名列自由國家，排名亞洲第二（中央社，2021 年 3 月 3 日）；四月，RSF 發佈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台灣排名和前一年一樣是世界第四十三名、亞洲第二名，RSF 認為台灣是區域新聞自由

榜樣，媒體很少受到政治干預，但記者身陷兩極分化的媒體環境，炒作聳動和逐利的報導，政府很少採取具體措施來提高記者的編採獨立性、提升媒體的公共辯論質量（簡恒宇，2021年4月20日；RSF, 2021, April 20）。

這些人權和新聞自由的年度評比顯示，從全球的標準來看，不予中天換照，並未侵害新聞自由，台灣媒體問題不在新聞自由被打壓，而在專業倫理、編採自主未落實。

1987年解嚴前夕，新新聞周刊創刊，我當時是大三學生，讀到它的發刊詞「自由報業宣言」，深受啟發，信奉至今：

新聞自由的目的是在於追求真相。新聞自由不止是報業經營者的自由，也是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自由，更是社會全民的自由。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全民有免於被蒙蔽真相的權利，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權利，全民有免於恐懼、暢所欲言的權利。自由報業接受公共信託，必須全力以赴，追求真相。自由報業以公是公非為依歸，要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講話。自由報業必須接受社會力量的監督。

這才是真正的新聞自由，這樣的新聞自由才能落實專業倫理、編採自主、確保公眾獲得正確的資訊。

參考書目

NCC（2020年11月18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議予以駁回「中天新聞台」衛廣事業執照換發申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取自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8&sn_f=45332

TNL 編輯（2020年10月20日）。〈中天新聞台換照案，會如上次「驚險」過關嗎？通過門檻是什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2097>

中天新聞（2020年10月27日 a）。《鑑定人提議「延遲直播」！民眾：非live 怎信真實性？》。【Youtube 影片】。上網日期：2021年10月10日，

- 取自 <https://youtu.be/Cwx3FpJTFyo>
- 中天新聞 (2020 年 10 月 27 日 b)。《這款鑑定人？台灣新聞自由倒退 30 年？》。【Facebook 影片】。上網日期：2021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751986115382714>
- 中天新聞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中天遭撤照 民眾高喊退訂第四台？危及系統業者 政府該負責！》。【Youtube 影片】。上網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取自 <https://youtu.be/PU7Vo9SVpL0>
- 中天新聞 (2020 年 11 月 22 日)。《瞎挺 NCC！無國界記者組織台灣分會挨轟監守自盜》。【Youtube 影片】。上網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6h-ud_uyDE
- 中央社 (2021 年 3 月 3 日)。〈自由之家 2021 全球報告 台灣自由度 94 分排亞洲第 2〉，《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030332.aspx>
- 中華傳播學會 (2020 年 11 月 23 日)。〈籲請媒體停止人身攻擊 尊重學術專業與回歸理性討論〉，《中華傳播學會》。取自 http://ccstaiwan.org/newdetail.asp?WN_ID=1466
- 朱真楷 (2020 年 10 月 27 日)。〈鑑定團綠油油 觀點還惹網友噓聲〉，《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027000422-260118?chdtv>
- 李侑珊 (2020 年 11 月 20 日)。〈校友譴責 陳慧蓉淪負面教材 網友質疑 陳順孝教得下去嗎〉，《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1120000504-260102?chdtv>
- 李侑珊 (2020 年 12 月 15 日)。〈關台引發老翁輕生等爭議 林麗雲、陳順孝噤聲不回〉，《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215003071-260407?chdtv>
- 李培睿 (2020 年 10 月 26 日)。〈中天聽證會 鑑定人冒出這句 網友全嚇呆〉，《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1026005277-260407?chdtv>
- 胡心平 (2000 年 12 月 26 日)。〈Call-in 節目的法律問題〉，《公共電視》。取自 <http://web.pts.org.tw/~rnd/p1/010105.htm>
- 胡夢璋 (2020 年 11 月 6 日)。〈別再說了！川普白宮談話 慘遭美國三大媒體中斷直播〉，《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21687/4993566>
- 國會無雙 (2020 年 10 月 28 日)。〈蔡衍明公然說謊！旺中微信群組唯旺董是從：證實蔡衍明介入中天、中視、中時新聞製播〉，《沃草》。取自 <https://musou.watchout.tw/read/J4EnldXrHEb0HPi3Re3V>
- 張文馨 (2021 年 4 月 1 日)。〈美人權報告：大陸意圖影響台媒〉，《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358127>
- 郭伶妤 (2020 年 10 月 28 日)。〈「蔡衍明說謊！」黃國昌爆中天高層對話，揭蔡「直接下令干預新聞」〉，《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153870>
- 最高行政法院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裁字第 2220 號抗告人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相對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間聲請

- 假處分事件新聞稿》，《最高行政法院》。取自
<https://tpa.judicial.gov.tw/tw/cp-1689-67091-9def5-021.html>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020年12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全字第43號聲請人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與相對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新聞稿〉，《司法院》。取自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8-335305-216cd-1.html>
- 劉子維（2014年12月3日）。〈台灣中天新聞台申請換照驚險過關〉，《BBC NEWS 中文》。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12/141203_taiwan_ctitv
- 簡恒宇（2021年4月20日）。〈2021新聞自由指數〉台灣維持亞洲第2名 獨裁政權趁疫情加大壓迫媒體〉，《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621085?mode=whole>
- CNN(2004, February 4). CBS to use 'enhanced' tape-delay for Grammys. *CNN*. Retrieved from
<http://us.cnn.com/2004/SHOWBIZ/TV/02/03/grammys.tape.delay/index.html>
- Carey, M. (2004, February 5). ABC to impose delay on Oscar telecast. *CNN*. Retrieved from
<http://us.cnn.com/2004/SHOWBIZ/Movies/02/05/sprj.aa04.abc.oscar.delay/>
- RSF (2021, April 20). 2021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RSF*. Retrieved from
<https://rsf.org/en/ranking/2021>

Is this a Matter of Press Freedom or Journalism Ethics? How did I evaluate CTi News and how CTi News attacked me

Shun-Hsiao Chen^{*}

ABSTRACT

I rea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pages of inform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operating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as well as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CTi News are adequate, but their actual implementation is very poor. CTi News does not do a good job of fact checking, so it often breaks the law. More penalties have been imposed by NCC on CTi News both in terms of frequency and amount, than on all the other TV stations. CTi News even erred in their own news reports. I conclude therefore, that CTi News does not uphold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ethics required in journalism.

NCC decided not to allow CTi News to renew its license. CTi News retaliated by targeting me for attack. It slander my suggestion is to imitate the CCP media, falsely claiming that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statement I quoted has been recalled by the headquarters, calling me "very blind" and asking me to apologize. I did not expect to experience personally such unprofessional and undisciplined conduct on behalf of CTi News.

Keywords: fact-checking, journalistic autonomy, journalism ethics,
journalism self-discipline, press freedom

* Shun-Hsiao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hen328@gmail.com

評析《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

胡逢瑛*

書 名：*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主 編：Katerina Tsetsura & Dean Kruckeberg

出版日期：2021 年

出 版 社：Routledge

本文引用格式

胡逢瑛（2021）。〈評析《俄羅斯戰略傳播：公共關係與廣告》〉。《傳播、文化與政治》，14:151-170。

投稿日期：2021 年 10 月 6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11 月 10 日。

*作者胡逢瑛為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助理教授，自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MGIMO)取得國際新聞學碩士和政治學博士學位。囿於自身能力有限，在豐富的俄羅斯戰略傳播文獻中蜻蜓點水，敬請廣大讀者見諒。最後，筆者要特別感謝匿名評審惠賜的寶貴意見以及編輯部同仁的辛勞。E-mail: fengyunghu@saturn.yzu.edu.tw

壹、緒論：如何理解俄羅斯戰略傳播

本書宗旨是要在浩瀚的俄羅斯傳播知識領域中為讀者打開一扇理解之窗，因此，兩位主編蔡牽拉與克魯克柏格組織這本書，是要拋磚引玉。毋庸諱言，鋪設這條羊腸小道是引領讀者探索俄羅斯的重要路徑。本書並非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也非通往俄羅斯戰略核心的康莊大道，而是嘗試透過集結俄羅斯本地學者以及從事俄羅斯研究的知識社群，以此模式來認識當代俄羅斯戰略傳播的主流思維與在地特點。因此，本書所匯聚的 21 位作者之研究成果，在此意義上具有俄羅斯在地的貼近性與就地觀察的親近優勢。如此一來，這些作者群已然做出他們在傳播領域的貢獻。不但為廣大讀者搭建了知識傳遞的橋樑與減少了溝通鴻溝，而且提供了非俄語操持研究者與時俱進的觀點，進而達到可以設定尋求俄羅斯合作的合理戰略以及依據事實基礎做出相應的理性判斷之妙用。同樣地，俄羅斯學者也經由英語世界的國際學術環境，推廣地俄羅斯文化價值和思想特徵，這樣的國際交流本身就是饒富意涵且是具有參考價值的傳播本體。

在開篇「什麼是在俄羅斯的戰略傳播？」(Kruckeberg, 2021, pp.3-11) 的一文當中，主編克魯克柏格開宗明義地指出了社會科學普世性研究的困境。誠然，人類文明在既相似又相異的歷史進程中發展，人們在不同時空背景與環境條件之下所構成的具體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其豐富和奧秘的多元樣貌是透過可遵循的社會規範得以延續保存下來。西方主導的學科範式提供了思想上的純粹性和普遍性追求，但倘若撇開文化、歷史與思想模式的文化多維向度之特殊性，則往往適得其反而增加了文化間相互理解與溝通的困難，甚至導致緊張和衝突。克魯克柏格顯然是一位長年熟悉俄羅斯研究事務的美國學者，他以一種全球性的包容思維和多元視角說明了文化間存在了文化本位的種族主義芥蒂，跨域文化理解的可能性在高築藩籬的牆垣阻隔中，使得牆外人仍然需要透過在地人來傳遞他們存有的文化潛質，方能一窺究竟。克魯克柏格認為俄羅斯人的國家認同在概念上是既統一又分歧，其組成和性格是那麼極端和不同，甚至自身都有超過 180 個族群以及領土範圍涵蓋 11 個時區

的 85 個行政區域主體，以至於探究「俄羅斯的戰略傳播必定是要立基於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之上」。

克魯克柏格認為，非俄語言說者往往難於正確理解俄羅斯，一方面由於在許多國家的俄羅斯研究屬於冷門學科；另一方面，以西方盎格魯薩克遜、特別是美國文化為傳播標竿的閱聽眾對俄羅斯的印象則深受西方媒體的新聞報導與政治宣傳的影響。在美蘇兩極對峙的時代，由於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劍拔弩張使然，西方政治傳播者把俄羅斯視為威脅所營造的「俄羅斯恐懼症」已經深深烙印在世人心。2014 年，西方認為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並且武力佔領烏克蘭東部，因此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再加上俄羅斯對敘利亞境內的出兵干涉以及美國深信俄羅斯駭客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介入操控，這些都使得全球公眾輿論特別關切俄羅斯地緣政治擴張的野心。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是行銷國家品牌的傳播大國，鼓勵外國人到俄羅斯進行投資和旅遊；致力於向友好國家輸出影音產品；同時也積極勸說廣大閱聽眾尊重俄羅斯在全球場域中的政治利益。俄羅斯近年來更擅用「公共外交」的「軟實力」來扭轉對其企圖恢復前蘇聯帝國主義版圖以及遺留前共產鐵幕警察國家中缺乏公民權利和言論自由的諸多指控。俄羅斯近年來積極舉辦各類大型國際賽事與國際性會議，不但向全世界展示團結嶄新的俄羅斯，並且呈現多元文明中的公民自豪感在減緩族群間緊張關係的具體成果。例如，舉辦 2014 索契冬奧會就是一個自我行銷的案例，顯示俄羅斯運用「關係管理理論」與致力於「行銷國家品牌」的公共外交戰略。

誠然，筆者也認為俄羅斯戰略傳播學的學術研究並非刻意要為賦新詞強說愁，主要仍在於彰顯俄羅斯族裔探索自我存在的價值體現與重新詮釋，將外來學科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語境和社會變遷當中以為所用。當代西方傳播學傳入俄羅斯是在蘇聯解體之後，關於這個學科的建立與專業教育自然有其草創發展和建立學說理論的原始過程。俄羅斯傳播學在蘇聯時期主要體現在對外關係方面，注重在與西方進行攻堅心理戰和資訊宣傳戰的外交作用上。其次，俄語的傳播與教育在文化外交中扮演友誼的橋樑角色，例如：俄羅斯世界和平基金會（Foundation Russkiy Mir）。俄語以及俄羅斯本國文化傳統成為俄羅斯軟實力的核心支柱。這些傳統並沒有在蘇聯解體之後消失，反而隨著

國家體制轉型時期的結束與多極時代的來臨，以國家戰略的面貌又再度重新回到俄羅斯戰略傳播的關鍵位置。蘇聯解體之後，傳播學融入在既有的新聞學和社會學的專業教育當中，以公共關係與廣告作為整合兩者之間共同領域，以因應市場經濟之所需。而俄語的修辭在傳播學當中突出了轉型國家發展出的外來文化、流行文化與政治文化的新特徵。「傳播」這個外來字有別於本身字義作為中介工具和運輸交通的意思，在學科當中被重新賦予新生的專業意涵，具有以大眾為導向的市場概念與民主取向。俄語中的「交流」這個字所代表的傳播意義則有歷史共性，作為語言相通和相互理解的共識基礎，投射在民族融合的統一整體概念中。根據俄羅斯世界和平基金會成立宗旨，認為在俄文「米爾」的概念中含有俄羅斯公共社群、俄語世界與終極和平的根本意涵。

關於以俄羅斯文化傳統作為建立俄羅斯思想之相關論述，在俄羅斯著名的思想家當中有鮮明的表達。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拉伯洽熱夫在「俄羅斯民族思想：介於過去與未來之間」一文中提到，民族思想有助於民族自信、自尊和歷史樂觀主義的出現，使人們能夠論述和確認國家的發展目標。他認為俄羅斯思想的提出可以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我文化認同，若干思想家在這方面具有卓越貢獻。索洛維夫在「俄羅斯思想」一文中提到：「思想，假如它不是空想，不可能有其他，正如是被賦予東西的完美實現。」別爾加耶夫：「19 世紀俄羅斯意識具有普世性、全人類性，並且普世性就是俄羅斯的傳統。」杜思妥也夫斯基：「俄羅斯民族思想是，歸根結底，只是全世界全人類的統一整體。」(Работяжев, 2018)。托爾斯泰關於認識愛的名言之：「人因愛而活；愛自己—死亡的開始，愛上帝和人類—生命的開始。」(Толстой, 1928)。俄羅斯的思想家為俄羅斯在當前國際社會中堅定立場以探索自我發展方向道路提供了自信基礎。普京總統就曾經在俄羅斯第四屆全國地區暨地方獨立媒體論壇「真相與公正」中，向與會者說明俄羅斯網路限制的思想概念，普京引用了 19 世紀的俄羅斯外交官詩人丘特切夫的經典詩句：「用世智聰明無法理解俄羅斯」，強調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道路，立基於自身傳統與歷史文化，不會照搬他國模式到俄羅斯來 (Путин, 2017)。

筆者最後在緒論中簡短概括作者群目標：本書的兩位主編蔡翠拉與克魯克柏格鼓勵非俄語使用的傳播研究者能夠擱置先入為主的成見，從美國傳播優勢與放諸四海皆標準的框架中跳脫出來，才能領略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各異其趣，這也是進行國別研究和跨文化傳播研究所需要的開闊眼界。誠如該書主編所言，俄羅斯戰略傳播作為學術探索、專業教育和應用實踐是很重要的領域，這不但對於俄羅斯學者專家、教育工作者、學生與傳播從業者深具意義，對世界亦然。

貳、「輿論戰」下的俄羅斯戰略傳播之特點

戰略傳播的過程基本上都是為了形塑民意以達到既定之效果。在「俄羅斯戰略傳播於全球舞台之上」一文當中，洛瑪-阿霍、蔡翠拉和庫加比這三位作者在導言中認為，儘管戰略傳播多數發生在西方以外的地方，但戰略傳播研究文獻主要基本上是根植於西方民主的情境（Luoma-Aho, Tsetsura, & Kugappi, 2021, p.12）。他們認為，西方文獻傾向是以負面態度來定位俄羅斯的傳播行為，並以此區隔西方與俄羅斯之間戰略傳播的差異，包括認定俄羅斯的傳播是操控、資訊誤導和宣傳。然而，洛瑪-阿霍、蔡翠拉和庫加比三位作者認為，俄羅斯的戰略傳播側重在資訊管理，廣泛運應在「公共外交」和「公共關係」當中。俄羅斯文獻主要將俄羅斯的戰略傳播定位在是一個達到政治、地緣政治和經濟目標的好工具上面。政權運用各種技巧和管道提升國家形象並且達到影響其針對之受眾所設定之目標，因此，俄羅斯的戰略傳播在政治領域中會關注受眾的理解程度，也往往具有單向傳播之政治性質（ibid, pp.13-17）。

洛瑪-阿霍、蔡翠拉和庫加比認為，俄羅斯的戰略傳播需要從深度去理解和分析，不太容易從字面上看懂。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戰略傳播不總是清楚陳述其目的，「戰略模糊」是戰略傳播的一種形式，透明度不是標準，而是測試閱聽眾態度的手段。不同的訊息往往在重要的時段進行討論，其目的是在政策形成之前掌握受眾的需求，以達政令成功宣達之效應。為了使訊息能

夠混淆閱聽眾，缺乏透明度也是傳播者掌握消息來源的價值。洛瑪-阿霍、蔡萃拉和庫加比從幾個方面來歸結俄羅斯與西方的差異性（*ibid*, pp.19-22），如下陳述：

- 第一，邏輯面：俄羅斯的戰略傳播涵蓋面較西方寬廣，訊息需要同時兼顧傳播者與接收者之心理需求，其目的在於建立各階層彼此之間所需要的信心與信任，以達穩定政黨政權、安撫民心對未來之不確定感以及度過經濟危機之需求。
- 第二，順序面：俄羅斯戰略傳播較具有隱晦性，不似西方傳播將重要訊息置首，重要訊息可能藏匿於逗號之後或是字裡行間當中，讀者往往需要在訊息當中去探索關鍵訊息之所在。
- 第三，共鳴面：俄羅斯戰略傳播者注重訊息對於不同閱聽眾之間所產生的共鳴性，訊息不像西方重視特殊受眾，俄羅斯訊息需跨越受眾以達在內部輿論所引發的共鳴效應。
- 第四，內化性：俄羅斯傳播者首先考量的是訊息在內部所產生的公眾效應，消息來源首先尋求內部的理解，對外訊息也是考慮其內化效應，將本國輿論置於戰略傳播的核心位置。
- 第五，消息源：俄羅斯首先考慮的是消息源，如果是普京總統的談話就具有權威性，倘若任何其他訊息若是與其發生爭議，則不會被放置於高度關注的位置。

自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之後，假新聞成為全球當紅詞彙，主要是川普打擊主流媒體以達穩固政權之目的。然而，美國主流媒體與川普政敵的結合，加速了美國內部社會意見的分裂與民粹主義的興盛，這反映在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以及國會暴動事件當中。隨著川普的落選，假新聞再度回到輿論戰的宣傳框架下，以負面攻擊對手以形塑民眾仇恨情緒的認知戰同樣出現在我國的傳播領域當中。英國著名的戰爭新聞研究學者羅賓森認為，政府以各種方式形塑和影響民意，在高層的外交決策的形成過程中（特別是對外宣戰，指的是發動地面部隊），媒體能夠影響政府甚微，而是加深與反映政府決策的本身，成為政府「製造共識」的宣傳一部份（Robinson, 2013）。

台灣著名的傳播學者馮建三教授認為，川普當選總統之後說道：「一切不利他的報導都是假新聞」之後，亞洲也有了川普的假新聞效應。而執政者防堵假新聞的負面衝擊太消極，應思考擴大公共媒體，使新聞從業者了解其責任與職掌，提升新聞事業的素質和新聞標準，以達媒體為公眾利益而行公

共服務之實。他認為：「假新聞的出現，若是記者倫理或素質的問題、工作條件的不合理，或是特定人或團體的政治算計所造成，就得另作因應。但無論是起源於哪一種原因，減少假新聞或沖淡其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就是擴大公共服務媒體的規模：閱聽人愈是能夠更大規模地使用公信力較高的公共媒體，假新聞的呼吸空間自然就會減少。」（馮建三，2017）。

此外，台灣傳播研究學者鄭宇君教授認為，假新聞是近幾年政治圈、新聞界與學術界最熱門的關鍵字，用「假訊息」一詞更能精確描述當前政治傳播的重要問題。從早期的戰爭宣傳研究即可見到假新聞或假訊息的蹤跡，當前以社交媒體為核心的去中心化媒介生態使得假訊息擴散的情況更勝以往，特別是社交網絡技術的能供性成為訊息操弄者的攻擊目標（鄭宇君，2021，頁 4-5）。回顧假新聞詞彙的興起與川普總統喜歡使用社群媒體-推特有關，他與傳統主流大媒體經常在公開場合中針鋒相對，他也推文點名幾家美國主流媒體是假新聞媒體。不過，美國的內部政爭才是決定媒體屬性驟然丕變的關鍵因素。社群媒體在中東的顏色革命中是推翻獨裁者專制體制的民主浪潮推手，儼然是正義的化身；到了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和川普任內，卻變成了建制精英口中的假新聞的平台，川普則反控主流媒體才是假新聞媒體。

美國前總統川普意外上任之後，就陷入了與俄羅斯勾結的「通俄門」司法調查以及和怒罵主流媒體如 CNN 等為「假新聞媒體」的唇槍舌戰的困境中。Lawfare 刊登的關於川普推文的內容涉及了俄羅斯和假新聞言論。川普在 2017 年 2 月 17 日的推文寫道：「假新聞媒體（失敗的 @nytimes、@NBCNews、@ABC、@CBS、@CNN）不是我的敵人，而是美國人民的敵人！」川普在 2017 年 6 月 27 日的推文寫道：「所以他們對假新聞 CNN 感冒了，但 NBC、CBS 和 ABC 呢？失敗的 @nytimes 和 @washingtonpost 怎麼樣？都是假新聞！」此外，川普諷刺民主黨與俄羅斯對抗是愚蠢的人。他在 2017 年 1 月 7 日的推文寫道：「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是好事，不是壞事。只有「愚蠢」的人，或者傻瓜才會認為它是壞的！」

當前，俄羅斯戰略傳播被廣泛於用政治和經濟領域當中，特別是在國際關係領域和公共輿論當中。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戰略則相當重視國際資訊的流

通、辨認與平衡能力，戰略傳播對於國內閱聽眾的影響足以危害國家安全。特是在俄羅斯認為國際安全環境惡化來自於西方試圖挑起國家間衝突以及其破壞現存安全體系（胡逢瑛，2021）。各種「輿論戰」（駭客攻擊、假新聞、資訊誤導）大體可反映在科技和心理兩個層面：前者是透過科技的方式破壞敵方的網路系統並且竊取或是竄改資料；後者，則是以不實或負面「宣傳」的方式對全球輿論和敵方國內輿論進行影響以製造恐慌和對政權的不信任氛圍，構成所謂的「心理戰」或是「認知戰」。俄羅斯與西方關係進行各種抗衡所導致的國際安全環境惡化的情況之下，「輿論戰」在數位科技和心理認知結合運用之下成為國家政府進行敵我輿論攻堅的戰略傳播前沿地帶。

自冷戰以降，美俄之間的霸權競逐並沒有因為蘇聯解體而停歇過。因此，筆者認為，俄羅斯戰略傳播以內部輿論為主，是為了有效因應西方輿論戰的重要手段。西方媒體對於俄羅斯的報導往往是固定的模式，就是先製造俄羅斯威脅論，以此為理由進行內部軍事擴編和外部結盟圍堵的安全戰略。以美國總統川普進行總統參選為例，美國建制精英與主流媒體堅信一定是俄羅斯干涉美國選舉，才導致川普勝選。然而，當川普尋求連任失敗之後，則變成是證明美國團結捍衛民主自由價值的成功體現。美國建制派宣傳「通俄門」的目的也是一種戰略傳播的手段，使美國能夠重返國際領導地位，並且趁勢發展網路系統與團結媒體。「網路安全」和「公平貿易」被美國政府喊得震天價響，則順勢用來針對中國，進行美國對中國的輿論戰宣傳。美國輿論戰這種自導自演以滿足自身政治需求的雙重標準手法，則經常運用在對俄羅斯進行戰略圍堵和經濟制裁上面製造理由。俄羅斯永遠是敵人才能證明美國文化作為唯一標準的普世性價值，也就是：在理想主義的國際建制中以人權為訴求指責競爭對手；在現實主義中尋求整軍建武和市場經濟之政治經濟權力之擴張，施以強權之軍事干涉和經濟制裁。如此一來，西方才能維繫其建立國際遊戲規則之霸主地位。對於中美俄地緣競爭，各有其戰略傳播的表達語境，構成了不同脈絡下的陳述特色，也提供了戰略傳播豐富的素材。

參、俄羅斯戰略傳播在專業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發展與運用

蘇聯解體之後，重視傳播應用之戰略的公共關係與廣告就成為新聞系所專業教育中的新興方向。當前俄羅斯把公共關係當作一個聯繫國內外各領域以達世界整體安全的專業教育，其目的在於建構一個整體空間以完成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安全之整合目標。這個概念後來結合俄羅斯傳統文化作為軟實力的資源在公共外交中確認下來，胡逢瑛和吳非在《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一書中有所論述。當前俄羅斯又進入了後疫情的傳播變革時代，全球新冠肺炎傳染方興未艾而疫苗卻仍然短缺；全球氣候變遷產生的溫室效應，零碳排放成為各國政府需要納入綠色政策的目標；美國結束長達二十年的反恐戰爭，撤軍所引發的地緣政治板塊變動，在各國地緣政治角力過程中，導致的中亞暨中東地區恐怖活動猖獗且蔓延；貧富差距擴大引起了民族主義的興起並反撲全球化，加深了文明衝突成為地緣政治擴張的鴻溝；網路駭客和不公平貿易導致的數位化科技競爭，中美試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防止核不擴散的軍備競賽、解決邊境爭議的睦鄰友好政策、以及訴諸航行自由的海權爭霸，凡此諸多新興議題都構成了在當前國際關係中大國競逐全球領導地位以謀合作解決的核心議題。

布爾林諾娃、查金娜和伊凡臣科三位作者在俄羅斯智庫俄羅斯國際事務理事會中的支持與發展社會倡議「創新外交」中心所撰寫的年度報告《俄羅斯在 COVID-19 時代的公共外交：俄羅斯 2020 年公共外交的基本趨勢與事件年度總結》中認為，隨著時代的變化，俄羅斯公共外交需要被廣泛理解，並且以作為各種機制整合的系統，其足以是建構與設定涵蓋各類項目之框架範疇。俄羅斯在數位化時代更重視對外訊息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因此，資訊科技與基礎設施的與時俱進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不言而喻的重要。互聯網中的宣傳效應成為外交前線，俄羅斯媒體在網路空間中與西方媒體並駕齊驅，以謀求在西方媒體的全球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式微過程當中站穩腳步。而布爾林諾娃、查金娜和伊凡臣科三位作者認為：公共外交結合文化、以及人道救援成為新危機時代俄羅斯戰略傳播的重點方向（Бурлинова Н., Чагина М., & Иванченко В., 2021）。

俄羅斯公共關係作為大學專業學科出現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蘇聯

解體之後，俄羅斯第一個將公共關係作為專業教育養成的大學是俄羅斯外交部所屬的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大學（MGIMO-University; Bachurina, 2021:49）。巴楚琳娜認為，蘇後的俄羅斯公共關係學有幾個發展階段：黑暗階段（1990-1995），側重商業傳播與圖像製作；前機制化時代（1995-1999），波切普佐夫介紹歐洲公共關係學到俄國；機制化時代（2000-2001），莫斯科形象聯絡公關公司的翻譯著作提供了豐富的學術研究材料；次級機制化時代（2002-2003），公共關係的應用普及化與再次通俗化。此外，俄羅斯的教育改革、參與歐州波隆納教育進程以及國外學術對俄羅斯的影響都會衝擊俄羅斯公共關係階段性的發展特徵（ibid, p.48）。巴楚琳娜認為，俄羅斯學者過去從事公共關係領域研究在國際上鮮為人知，其主因是受限於英文能力不足以及對於國際規範的不熟悉。所幸，透過俄羅斯傳播學會（The Rus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官方期刊《俄羅斯傳播期刊》（The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國際出版集團出版推廣，俄羅斯公共關係學研究才逐漸廣為國際學術社群所認識（ibid, p.55）。

卡什爾斯基與茲維列夫在「俄羅斯今日傳播作為一個領域、一門學科和一種社會機制之形式與塑造：傳播發展作為一項社會現代化的結果」一文中提及，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政府和企業都越來越重視名譽的需求，媒體作為社會的機制，成為公眾討論與形塑意見最為集中的領域。公共關係作為學術主題和專業科目成為大學傳播教育的趨勢之一。從專業科目到專業學位的承認，俄羅斯教育部於 2007 年與 2010 年分別通過了公共關係學士與碩士學位的認定。大量學習有成的公共關係專業人才進入到企業和政府機構當中。因傳播具有社會機制之功能，故有助於政府、社會和市場三者之間在公共領域當中進行互動並且達成共同目標（Kashirskikh & Zverev, 2021, p.31）。然而，卡什爾斯基與茲維列夫認為，俄羅斯的公民社會是從屬於國家的附屬品。因缺乏政治競爭和公開批評，以及行為者參與公眾意見的不平等，都使得公共領域萎縮。解決衝突過程是垂直分層結構的：在俄羅斯傳播的理論和實踐中，工具方法占主導地位；以結果為導向，而不是相互的理解。因此，作為一門學科的傳播學無法獲得教育的自主性。卡什爾斯基與茲維列夫認為，唯有強化處於弱勢者的橫向聯繫，使公民社會越有機會參與影響政治和

經濟議程的形成，戰略傳播才能在國家、市場和公眾之間作為建立關係的平台而得以確立（*ibid*, p.42）。

葛芙拉、布柯娃、多爾斯基和卡維琳四位作者介紹了俄羅斯廣告行銷市場的動態發展研究和研究機構。關於俄羅斯廣告市場的結構與動態之研究分析資訊，俄羅斯傳播通訊社協會提供相關資訊。俄羅斯專業門戶網站（sostav.ru / www.sostav.ru）則提供廣告市場的核心玩家之活動與監測廣告市場的動態發展。媒體鏡（Mediascope/ <https://mediascope.net>）則是行銷市場和媒體研究的領先研究公司，也是歐洲媒體研究組織、歐洲民意暨市場研究協會和俄羅斯市場暨輿論研究協會的成員。媒體鏡的客戶是大多數媒體和廣告市場參與者，包括：廣告公司和團體、出版社、電視頻道、廣播電台、互聯網站等，負責提供戰略行銷與促銷解決方案。ESPAR 研究公司（www.espar.ru）提供戶外廣告觀測；新服務公司（NSC）（<http://nsc.media>）分析與觀測俄羅斯電視營銷。俄羅斯國內廣告公司與國內外的客戶關係良好，提供中型企業成功的廣告營銷，佔據俄羅斯廣告營銷市場的主要份額（Gavra, Bykova, Dorskii, & Kaverina, 2021, pp.109-110）。俄羅斯傳播通訊協會則進行廣告活動的自律管理，基於國內外實踐的專業經驗，廣告在經濟危機中仍保持成長。俄羅斯的數位科技提供廣告市場無窮潛力，並使其處於全球領先的傳播態勢（*ibid*, p.116）。

蘇後的俄羅斯媒體發展大體可以分為混亂、整頓和自律三個階段。普京2000年上任初期，打擊金融媒體寡頭和奪回國家能源企業作為其施展政權的起手式，這部分筆者在《蘇俄新聞傳播史論》一書中論述了這段歷史過程（胡逢瑛、吳非，2006）。俄羅斯經歷了蘇後十年的政治經濟轉型期，自由市場成為各種領域發展的背景特徵。不過，顯然壓制媒體不適用普京強權下的俄羅斯，媒體相當於政府運行的社會機制分支，所謂社會機制也不能脫離政府預算和管理。總統是社會運行順暢的最高領導人，而非站在社會組織的對立面。普京重視國家媒體作為政府政策的協作角色，認為強力的政府絕對不是使用暴力鎮壓，而是能夠公正行使人民賦予權力的效能政府。普京也並非獨裁者，他是在歐洲選舉觀察組織參與選舉投票與開票過程中產生的民選總統。許多西方媒體已經慣用貪腐和舞弊的刻板角度報導俄羅斯任何的政治活

動，並在各種民間抗議示威活動中尋找蛛絲馬跡並加以渲染和刻意扭曲；俄羅斯的反對派也熟悉此種模式，經常自編自導而無視法律的約束，成為牢中常客。

筆者認為普京是積極和社會各界、民眾直接對話的領導人，只不過他是尋求政策被理解的強人型領導人，也努力把執政理念落實到改善人民生活水準上面。在俄羅斯為了減少官僚體系在分層領導過程中無法充分完成指定的聯邦任務，「和普京總統直接連線」成為每年民眾直接反應意見給國家領導人的最盛大且最鮮明之形式平台。一方面鞏固了總統的權威，另一方面也敦促地方政府即時完成交付任務。普京總統長期以來獲得超過半數民意支持度，主要來自於多數民眾認可普京危機處理的能力。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戰略研究與預測中心研究員、俄羅斯社會議會成員達紐克接受 RT 記者採訪時認為，在與普京總統連線三到四個小時的直播節目中，民眾不差於表達各種具體的問題，普京總統也開誠布公直接回應各類棘手問題，這樣的互動能有效幫助地方政府無法即時解決的問題當場獲得總統交付解決的承諾（Румянцева, 2021）。

美國著名的民主理論家戴蒙德在美國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沒有美國民主的世界？美國民主倒退的全球性後果〉撰文認為，今天美國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反民主運動，不僅來自邊緣極端分子組織，也來自大量公職人員。而這場運動正在挑戰選舉民主的基礎，如果趨勢持續成功，美國或將可能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失敗的先進工業民主國家。也就是說，其不再滿足政治科學家和其他民主學者定義的自由和公平選舉的最低標準。戴蒙德認為美國前總統川普敵視媒體與鼓動暴民衝進國會而首先難辭其咎，因川普不斷咒罵媒體是假新聞和絕對人渣，川普的行徑破壞了民主國家三個支柱（人民主權、自由民主和法律規範），川普對媒體的詛咒等於助漲了強人對媒體的攻擊和獨裁者的氣焰（Diamond, 2021）。此外，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中國研究中心的博士後沃爾納以拜登對中國關係為例，強調了經濟發展能包容兩國共存共榮。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認為美國正處在專制對抗民主的轉捩點上，而美國必須用民主作為典範的力量，尋求領導世界的地位，以捍衛民主價值。沃爾納認為，在外交政策上，拜登總統須證明民主不僅是強化與富裕國家的

聯盟，並非針對加深與專制國家之間的衝突鴻溝，而是改善貧窮國家的生存條件，以拔除那些不平等、排除異己和怨聲載道所賦予強化專制力量的根源。那麼，中美之間的緊張競爭關係無須進入零和遊戲當中，而是以全球強大的經濟成長力量作為容納兩國共存成功的寬廣空間。這樣一來，全球經濟成長才能作為民主化浪潮再興的條件（Werner, 2021）。

台灣傳播學者羅世宏教授認為，在新冠疫情肆虐下，中國因實施嚴厲的網路監控與防疫管制措施，使得對網路的監控措施也在防疫的名義下更加極權化；另一是以蘋果（Apple）、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和亞馬遜（Amazon）為首的科技公司，快速積累了更為豐厚的利潤和資本，全球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也因此更加惡化（羅世宏，2020，頁 230）。確實是，在防疫期間使得民眾更加依賴政府措施和網路平台，因此，科技公司更是加速發展虛擬世界的應用功能，促進了數位科技產業升級成為龐大商機無限的金礦。然而，談到俄羅斯的戰略傳播發展，普京總統則因為反恐需求與打擊反對派網路攻擊早已進行媒體控管。但這不意味著是西方媒體所指控的那樣的視角，其主要基於美俄之間傳統上的戰略競爭關係所建構的媒體論述方法。因為俄羅斯不是中國，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是以西方民主體制作為轉型的藍圖。俄羅斯經歷了十年西化的過程，政黨政治和媒體互動經驗非常豐富。在十年轉型期的俄羅斯是資本禿鷹的天下，處在自由市場邏輯思考下的俄羅斯人無法適應從穩定陷入混亂的社會秩序。蘇聯和美國是冷戰的兩極，擁有社會福利機制的俄國人民根本無法在突然進入到震撼療法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掠奪中自力更生，更遑論國家資產外流以及外部勢力伴隨恐怖主義介入領土分裂的內戰當中。倘若沒有一個有威信政府，則俄羅斯無法快速從政府失能和國家內戰的泥潭當中擺脫，國家分裂又如何能夠保護人民的最基本生存安全和存在的尊嚴價值？

筆者也觀察，俄羅斯媒體在扮演協助政府了解民意、反應輿情且傳達政令方面的角色是非常前沿和公開的。換言之，其影響是利弊互見：一方面，媒體有效抵擋了公眾輿論對普京總統個人與政府決策過程中的批評力道，專業媒體也滿足受眾知情與表達的權利；另一方面，激烈的爭辯也會引起民眾對於政治議題的極化反應現象。這樣一來，民眾在數位化時代更加尋求虛擬

世界的互動娛樂，在政治抉擇上就把信任普京當作最簡單有效的選擇。俄羅斯的公眾輿論市場比較屬於政府政策暨政治議程導向型的引導與討論場域，其目的在於透過激烈的公開辯論以期了解不同意見的陳述動機和目的，有助於了解不同意見的整體論述背景。與此同時，藉由民眾的反饋，政府可以了解受眾對於政府政策推出前後的反應和具體政策實施的效能，這樣非常有助於政府完善決策並且以解決具體問題為目標導向。由於普京執政時代下的國家媒體主要是政府與俄羅斯國營企業天然氣工業集團掌控多數股份，也因此，俄羅斯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自然形成是合作關係。媒體作為穩定社會秩序與了解社會需求的工具，而非進行不同意見爭論而導致政府失能的鬥爭場域。這樣的垂直傳播結構也自然導致了整體社會在政府不關心的領域中反映出公眾意見參與的冷感。然而，這顯示出民眾會很敏銳知道政府重視什麼議題，久而久之便擅於揣摩上意。也因此俄羅斯以國家媒體作為主流媒體所建構的傳播體系，權力者就把媒體當作凝聚社會共識並且強化政府權威的公共場域。當然，這樣的傳播結構對於俄羅斯穩定社會關係並且進行公平分配起到治理效能的結果。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局勢轉變以及新冠肺炎全球跨境傳染的危機當中。公共關係重視形象和品牌，而政府在國家安全領域中重視訊息控制以達施政威信。因此，在後疫情時代暨強權國家科技競爭的數位化時代背景下，「科技戰」、「輿論戰」、「認知戰」、「心理戰」、「宣傳戰」、「混合戰」……各種名詞的舊瓶新裝，都顯示了戰略傳播在國防軍事、外交政治、數位科技等諸多要素交疊整合出的整體作戰領域中的角色日趨重要。各國政府都出現了面對虛擬世界中的網路攻擊和假新聞威脅本國安全的危機挑戰，因而政府強化各類傳播的控管已經儼然是進入數位化時代因應全球變局之必然途徑。也因此，全世界都相當關注美國如何捍衛民主和自由的發展及其對於全球戰略傳播方向的影響。

肆、網路時代的俄羅斯戰略傳播

2021 年 10 月 5 日，美國律師吹哨人豪根指控臉書危害兒童身心健康並

且製造分歧，要求祖克伯格到國會聽證。在參議院商務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豪根呼籲臉書要透明化其如何吸引用戶持續滾動而使其成為廣告商接觸他們以提供創造充足的機會。擔任聽證會小組主席、民主黨參議員理查德·布魯門撒爾表示，臉書知道其產品會讓人上癮。他表示：科技現在面臨著重大煙癮而令人瞠目結舌的真相時刻（Shepardson & Bartz, 2021）。對於調查臉書營利模式的呼聲，顯示拜登政府非常重視科技對於教育和人權損害的衝擊，致使美國科技產業龍頭之一的臉書首當其衝，社群媒體被要求須要負起社會責任。換言之，拜登上任之後，美國民主與新聞自由首先的交鋒場域就在臉書爆發，這基本上延續臉書被指控疏於管理，使俄國利用臉書製造假帳號，引導用戶投票取向以干涉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而最終導致了川普當選總統事件的通俄門模式。從網路自由對國家安全到社會教育的衝擊，不可否認，兒童與青少年對於社群媒體的沉溺使用已經構成全球政府管理網路的攸關議題，料想天下的父母都為小孩使用手機而導致親子關係疏離甚至是緊張而感到苦惱不已。美國已經從自由媒體再度進入社會責任制的週期，這與美國在二戰之後防止蘇聯宣傳而進入麥卡錫主義的恐慌當中相似。不同的是，現在美國社群媒體已經挑戰了傳統主流媒體對於輿論導向的權威地位，其內容傷害受眾心理意識的層面更為廣泛。網路管理已然成為觀察美國民主發展動向以及解讀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要素，美國政策的轉變將對其盟邦產生深遠的影響。

誠然，社群媒體已經對於國際關係和各國國內社會產生巨大衝擊和影響。薩文與索羅夫耶娃撰文「社群媒體與俄羅斯社會」一文指出，俄羅斯網域於 1994 年開始產生，1997 年 Yandex 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門戶網站和新聞聚集的樞紐。2000 年以後，俄羅斯網路媒體發生的巨大轉變，超過八成以上的俄羅斯民眾都是網路使用者，媒體環境的轉變對於政治議程和社會關係產生了巨大影響。俄羅斯網域社群化的新時代始於 2006 年的 VKontakte（VKontakte.com）和 Odnoklassniki.ru（OK.ru）推出。VKontakte 最初旨在作為 Facebook 的俄羅斯替代品。VKontakte 是大學校友和學生的網絡平台，為用戶提供機會連接、發送消息、點讚和分享。另一個社群網絡 Odnoklassniki 推出以連接同學，但在成年人中迅速普及。爾後的十多年來，

這兩個社群媒體已成為蘇後俄羅斯暨前蘇聯地區使用最廣泛的聯繫平台（Savin & Solovyeva, 2021, pp. 167-169）。

薩文與索羅夫耶娃指出，根據全俄羅斯輿論調查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網際網路的快速流通滲透而導致 2011-2012 年間抗議運動以及公民行動主義的興起。社群媒體成為城市人進行政治訊息傳播的重要來源。2011 年阿拉伯之春後，社群媒體作為抗議專制政權行為的工具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2011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的特點被認為是選舉舞弊而廣泛受到關注，隨之而來的是要求民主化的大規模抗議。抗議者積極利用社群媒體傳播選舉舞弊訊息並且協調抗議活動。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並沒有像推特和臉書那樣形成政治化風潮，其原因有可能至少有三：（一）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主要服務俄羅斯國內；（二）俄羅斯反對派主要使用西方社群媒體作為提升其政治訴求的管道；（三）VKontakte 和 Odnoklassniki 主要在於娛樂性質，使他們對於使用者之間傳遞的政治議程缺少關注。總結來說，俄羅斯社群媒體具有習慣模式的忠誠度，構成其共同政治議程和相似認知模式的特徵。俄羅斯抗議活動後的兩年，俄羅斯通過聯邦 398 號法案，被視為政治箝制法案，開始對網路侵權問題以及以打擊極端主義為名進行網路限制，用以針對違法的示威抗議活動和反對派領袖所制定出來的法律設限。儘管俄羅斯政府成功控制網路媒體，但是對於網路媒體實際在俄羅斯政治議程中的作用仍存在知識空白（ibid, pp.171-173）。

伍、總結：俄羅斯戰略傳播的未來走向

瓦特曼和蔡翠拉在「俄羅斯戰略傳播之未來：一個基於效果為導向的路徑」一文中認為，以基於效果為導向的傳播模式可作為大戰略層級的模式，用以建構和解構不同背景下的戰略傳播。此方法也可能適用於各種組織、政府和所有行為者，有助於他們更好地理解俄羅斯戰略傳播的實踐經驗。全球訊息環境中的參與者，包括非國家和國家行為者，從激進組織、恐怖組織、再到主要國家，比如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利益相關者

所需要的直接接觸之便利性，那些能夠適應新的參與速度以及可以利用時機的參與者，顯然比那些不能或不想使用訊息權力的人，隨時能夠在訊息環境中獲得明顯的優勢。優勢者以硬實力或軟實力為主要接觸方式，軟硬實力的結合用以支持和執行其權力的角色。俄羅斯一直是許多西方戰略傳播者的研究焦點，更具體地說，是指關注其虛假訊息和宣傳活動。許多西方外交、軍事和學術資源都試圖確定俄羅斯對未來的願望和意圖，不乏眾多解釋或推測，用以了解俄羅斯欲建構自身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心態，與其使用傳播以達到其戰略目的之策略。西方關注普京的戰略目標，包括：其重拾蘇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再度被視為國際體系中的強權國家，塑造自身是一位可信賴的領導者、地區的破冰者和協調者，並對世界各國具有經濟、軍事和政治的影響力，以重新定義現行支配掌管世界秩序中自由主義者所建構的權力規則與規範（Waterman & Tsetsura, 2021, pp.221-222）。瓦特曼和蔡翠拉認為使用基於效果為導向的傳播路徑，有助於西方企業和政府了解西方暨非西方傳播模式在俄羅斯同時存在的戰略傳播意圖和目標，這是認識俄羅斯戰略傳播的關鍵點（ibid, p.232）。

蔡翠拉在總結「什麼是俄羅斯的戰略傳播」一文中援引了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一大學（MGIMO）的定義，在 MGIMO 執行的新媒體與戰略傳播計畫中，定義戰略傳播是用以建立組織（政府、政治、公共、商業）與社會之間的長期關係。戰略傳播在於形塑組織和個人的形象和聲譽，提高其競爭力 and 獲利能力，並確保其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層面取得成功。最後，戰略傳播作為「軟實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旨在解決現代國家外交政策所需資訊支援的問題（ibid,p.241）。根植於檢視專家們的討論之後，大體將俄羅斯戰略傳播歸納在三個脈絡下探討：商業脈絡、社會脈絡以及全球資訊環境暨安全脈絡。然而在俄羅斯論述中所缺乏的公民參與之公共關係就會被一些學者和專家認為是另類宣傳的花俏詞彙。蔡翠拉認為，無論如何，在全球化社會中，俄羅斯學者、教育者、學生與專家均渴望參與到全球性的適用理論、教育範式和專家實踐基準的探求進程中，而本書展現了作者們盡力為全球討論、對話和合作做出的巨大貢獻。而未來在俄羅斯乃至於全世界戰略傳播的建構仍需要透過這些不斷的探索追求，如此方是正確的方向

(ibid,pp.243-244)。

參考書目

- 胡逢瑛、吳非 (2006)。《蘇俄新聞傳播史論》。台北：秀威資訊。
- 胡逢瑛、吳非 (2016)。《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台北：獨立作家。
- 胡逢瑛 (2021年9月10日)。〈俄美地緣競逐下的戰略羈絆與圍堵困境——俄羅斯面對阿富汗變局的因應之道〉，台北論壇基金會。取自 https://www.taipeiforum.org.tw/article_d.php?lang=tw&tb=3&cid=18&id=6328
- 馮建三 (2017年4月8日)。〈馮建三觀點：說說「假新聞」〉，台灣媒體教育觀察基金會。取自 <https://www.mediawatch.org.tw/work/9275>
- 馮建三 (2018)。〈公共服務媒體、共和民主論與「假新聞」〉，《全球傳媒學刊》，3(15): 1-51。
- 鄭宇君 (2021)。〈社交媒體假訊息的操作模式初探：以兩個台灣政治傳播個案為例〉，《中華傳播學刊》，39: 4-5。
- 羅世宏 (2020)。〈免於政治極權監控和企業巨頭壟斷的網路新世界，還有可能嗎?〉，《傳播文化與政治》，12: 230。
- About Foundation Russkiy Mir. *Foundation Russkiy Mir*. Retrieved from <https://ruskiymir.ru/en/fund/index.php>
- Bachurina, N. (2021).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as an institutionalized field and as a discipline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iamond, L. (2021). A world without American democracy? The glob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mocratic backsliding. *Foreign Affairs*. July 2,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21-07-02/world-without-american-democracy>
- Donald Trump's statements on Putin/Russia/fake news media. *Lawfa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awfareblog.com/donald-trumps-statements-putinrussiafake-news-media>
- Gavra, D., Bykova, E., Dorskii, A., and Kaverina E. (2021). Modern Russian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 and advertising trend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shirskikh O., and Zverev S. (2021). The forms and shapes of today's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as a discipline, and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n Russia: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society's modernization.

-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ruckeberg, D. (2021). In Tsetsura, K. & Kruckeberg, D.(Eds.). What is (ar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uoma-Aho, V., Tsetsura, K., and Kugappi, A. (2021). In Tsetsura, K. & Kruckeberg, D.(Eds.). Russia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on the global stag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Robinson, P. (2013). Media as a Driving For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NN Effect and Related Debates.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ir.info/2013/09/17/media-as-a-driving-force-in-international-politics-the-cnn-effect-and-related-debates/>
- Savin, N. and Solovyeva, O. (2021). Social media and Russian society.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hepardson, D. and Bartz, D. (2021). Facebook 'operating in the shadows' says whistleblower, lawmakers demand probes.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acebook-whistleblower-say-former-employer-an-urgent-threat-us-2021-10-05/>
- Tsetsura, K. (2021). What is next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aterman, D. and Tsetsura, K. (2021). The future of Russia's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 effects- based approach.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Abingdon, Ox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erner, J. (2021). Does America really support democracy—or just other rich democracies? Washington's fight against autocracy will fail if it leaves out the poor. *Foreign Affai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7-09/does-america-really-support-democracy-or-just-other-rich>
- Бурлинова Н., Чагина М., & Иванченко В. (2021). Публич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и в эпоху COVID-19. Ежегодный обзор основных трендов и событий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в 2020 г.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 «Креатив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russiancouncil.ru/papers/RussianPublicDiplomacyCOVID-Report71-Rus.pdf> О вере. *Лев Толстой*.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tolstoy.ru/creativity/quotations/>
-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цитатой из Тютчева на вопрос об ограничениях в интернете. *РИАНовости*.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RZD1o-ikA>
- Работяжев Н. (29 октября 2018).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 Необходимы ответы 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 обосновах бытия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www.ng.ru/ideas/2018-10-29/7_7342_ideas.html
- Румянцева, А. (30 июня 2021).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е заявили о важности
прямой линии с Путиным. *RT*,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russian.rt.com/russia/news/880276-obschestvennaya-palata-putin-pryamaya-liniya>
- Соловьев, В. (23 мая 1888).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чн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ученное из
<https://philhist.spbu.ru/11-biblioteka/istochniki/151-solovev-v-s-russkaya-idea.html>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傳播文化與政治

no. 14/December 2021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Exploring the Cases of "Speech Crime"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in Taiwan, 1949-1992:
A study of government archives*
- *Consumption Practices of Taiwan Civic Crowdfunding 2012-2019*
- *Media Credibi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A longitudinal Study*

Research Notes

- *A Look at the Art of archiving and re-archiving*

Past and Present

- *Is this a Matter of Press Freedom or Journalism Ethics?
How did I evaluate CTi News and how CTi News attacked me*

Book Review

- *The review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in Russia—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